



中共
东昌县委
旧址（赵
以政同志
家）。

坡里武装暴动攻占教堂后暴动指挥机关旧址。



TWT 154/10

高唐红团使用的铁蒺藜锤。



金谷兰同志的旧居。

前 言

《鲁西农民暴动》，是为纪念阳谷坡里、高唐谷官屯暴动80周年而编辑整理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山东党组织依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在全省各地组织发动了多次农民暴动。1928年1月举行的阳谷坡里暴动和同年5月举行的高唐谷官屯暴动，是中共东昌(鲁西)县委、鲁北特委遵照省委指示发动和领导的在山东最早的两次著名暴动，也是鲁西北党的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两次暴动，是当时黑暗衰败的政治经济形势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所逼出来的。在暴动斗争中，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由于领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致使暴动归于失败，暴动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是，作为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伟大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这两次暴动，使鲁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初次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所树立的革命红旗，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挣脱了地主豪绅奴役、剥削的枷锁，昂首挺胸地拿起武器，英勇地投入了与反动军警搏斗的战场，充分显示了觉醒的人民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潜力，同时还强烈震撼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狠狠打击了军阀、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党的影响，也锻炼了党和群

众，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在鲁西北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这本集子里，辑录了综述材料、文献资料、回忆资料、人物简介、探讨文章、图片资料以及两次暴动前后我党在鲁西北活动大事记，力求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两次暴动的全过程，客观地评价其历史地位及经验教训，并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教材。应该说明，由于受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有关资料中，不免有些不完整、不通顺、不准确的地方。在收录这些资料时，除为避免混乱把个别地名（如谷官屯误为“古官屯”、“顾官屯”），用（）注明正字，增补的漏字用〈〉号标明，须注释的用○号标明外，其余一律保持原状，以保留史料的本来面目。还应说明，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虽然聊城地征委作了很大的努力，又得到了有关单位和老同志的大力帮助，吴银居同志还绘制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鲁党组织西北分布图，但终因间隔60年之久，仍难免有粗忽遗漏之处；有的文章提出的问题，可能在党史工作者中间认识还不一致，同志们可进行讨论，并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综 述 材 料

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一次农民

暴动——坡里暴动……………杨明坤 孟昭军 (1)

高唐谷官屯暴动……………王东升 张金洪 杨明坤 (15)

文 献 资 料

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

斗争的决议案》…………… (27)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节录)…………… (30)

山东省委关于阳谷暴动给东昌县委的指示信…………… (38)

山东省委十二月份工作总结及今后党

的工作意见(节录)…………… (41)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 (49)

给东昌信之一…………… (51)

给东昌信之二…………… (54)

中共山东省委一月份工作综合报告(节录)…………… (57)

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金谷兰遗作 (59)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 工作的报告(节录).....	(6 5)
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	(6 7)
文献资料摘抄三件.....	(7 0)

回 忆 资 料

阳谷坡里庄暴动的回忆.....	申仲铭 (7 3)
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回忆.....	张干民 (9 0)
对阳谷坡里暴动前后几个问题的回忆.....	袁 果 (100)
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	郭庆江 (105)

人 物 简 介

王寅生.....	(112)
李春荣.....	(113)
赵以政.....	(114)
宋占一.....	(116)
孙大安.....	(117)
金谷兰.....	(118)
聂子政.....	(119)
杨耕心.....	(120)
姜占甲.....	(121)

探 讨 与 研 究

土地革命初期的鲁西北农民暴动及其 失败的原因.....	刘继孟 (122)
应怎样看待坡里暴动的历史地位.....	王其彦 (133)

高唐谷官屯暴动失败原因初探·····	张金洪 (139)
谷官屯暴动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浅析·····	王新忠 (148)
关于高唐谷官屯暴动几个史实的考证·····	张金洪 (155)
坡里谷官屯暴动前后我党在鲁西北活动大事记·····	(160)

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一次

农民暴动——坡里暴动

杨明坤 孟昭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和东昌（鲁西）县委依据中央的指导方针，于1928年1月14日发动了山东最早的阳谷坡里暴动。这次农民暴动，在鲁西以至整个山东都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领导思想的错误，致使暴动归于失败。暴动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作为武装斗争的尝试，意义是深远的。

一、暴动的历史背景

鲁西北地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在整个华北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张宗昌统治山东时，在鲁西北腹地重镇东昌（今聊城）设东临道，经常有一个旅或一个师的兵力驻守。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西北处于新旧军阀冲突，明争暗夺，政局混乱的局面。土匪杂团也乘机四起，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政治、军事情况十分复杂。

由于军阀的腐败政治统治，致使鲁西北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农民纳粮数目，每亩地增到近收成的一半，在旧历年前无饭吃者已占十之七八。军阀和土匪经常烧杀抢掠，拉兵派款，贪官污吏勾结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横征暴

敛，摧毁了稳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小康生活，迫使劳苦群众颠沛流离，乞讨觅生。加之水、旱、蝗、瘟连年为害，地无颗粒，病无医药，人民群众遍地呻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使鲁西北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不断发生，暴动迭起。自1925年冬至1926年8月，在鲁西北地区的阳谷、聊城、朝城、范县等地，就曾发生过五次农民自发的武装暴动。1927年9月，冠县“红枪会”因反动军队骚扰而举行暴动，群众杀一连长，并缴获了该连士兵的枪械。10月间，冠县农民因反抗官府予征而暴动，并与官兵发生冲突。

当时，我党在鲁西一带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25年大革命时期，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共产党的号召下，聊城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的进步青年先后有四、五十人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并在那里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党从反革命屠刀下的血泊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的阳谷王寅生、聊城赵以政、聂子政和莘县孙大安以及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申仲铭（兰生）等同志，奉党的指示，回山东故乡开展党的工作，为鲁西北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决定在全省重要地区迅速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并把聊城看作工作的重点。是年秋，省委派省团委书记张干民、省执委委员王寅生等，到鲁西组建县委。10月，中共东昌县委（即鲁西县委）正式成立。张干民任书记，委员有赵以政、聂子政、王寅生、袁果等。当时省委对东昌县委的指示是：大力发展群众工农武装，领导群众举行暴动，扩大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迎

接全国革命高潮。东昌县委在聊城的三师、二中、北周店、阳谷的郭店屯、安乐镇、九都杨和博平、莘县等处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四、五十名党员，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

坡里庄位于聊城、阳谷、莘县三县交界处，德帝国主义侵略者早在1882年就在这里设了据点。1889年在这里盖起欧洲哥特式大教堂，到1909年建起了包括9个院落、5座3层碉堡楼、109间2层群楼，占地50余亩的大教堂。教堂全部垣墙和楼连接在一起，墙最高的12.5米，砖墙厚1.2米，教堂内修有地道、夹壁墙可以串通。这座教堂，是黄河北十多县中任何地主庄院所比不上的新城堡，实际上是中国势力达不到的“租界”。教堂有德国主教、神甫和修女多人，总管寿张、阳谷、朝城等处的天主教事务。这些洋人占有良田千余亩，储备大批粮食，拥有几十支洋枪和大批弹药，豢养着打手保卫教堂。他们勾结官府，挑词架讼，无恶不作。附近的豪绅地主投靠洋人，为虎作伥，横行霸道，坑害人民群众，人们对教堂深恶痛绝。在坡里庄以东郭店屯、九都杨一带，既是大地主集中的地方，也是熬硝盐的贫苦农民最集中的地方，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随着我党在坡里一带农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农民觉悟日益提高，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拆毁教堂、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要求，就在这种形势下，党发动了阳谷坡里暴动。

二、暴动的组织准备

当时坡里一带活动着一支由韩建德、曹万年领导的几十人的绿林武装，中共东昌县委在缺少武装的情况下，对这支武

装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韩建德是韩庄人，农民出身，因欠地主的债而遭受欺凌，被“逼上梁山”。他疾恶如仇，行侠仗义，打富济贫。当时韩正在徐登朝门下，徐原是北洋军阀周荫人部的旅长，他在家利用旧军官的招牌，打起了“鲁西自治军总司令部”的旗号，招兵买马，想拉起一支队伍投靠张宗昌。韩建德对徐登朝的霸道行为深为不满，便联系徐的参谋长程宗岳准备自立，另谋出路。1927年10、11月间，阳谷党支部的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党员，与韩建德表亲关系）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及时与韩联系，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动员他跟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韩建德为洗去“匪”名，欣然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表示愿跟共产党闹革命。杨耕心立即向县委汇报了韩建德的情况，并提出了把韩部争取为发动暴动的主要力量的建议，还多次带韩建德等头领与鲁西县委主要负责人张干民、聂子政等同志会面，研究争取韩建德和进行暴动的问题。一天，县委指定赵以政和聂子政二同志，经杨耕心同志引见，在阳谷郭店屯于家店和韩、曹二人接上了头。经过交谈，以政同志抓住他们的特点，因势利导，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话越谈越投机，他们问：共产党能否派代表和我们经常取得联系？以政同志笑着说：我和聂子政同志即是代表共产党来和二位协商进行起义救国这个大事的。他们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马上整顿队伍，加紧操练，准备随时听从党的调遣。为加强对韩部的工作，县委派聂子政、孙大安到韩部，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工作。

这个时期，杨耕心、聂子政、郭庆江、袁果等一批党员，还抓住广大群众要求革命的自发倾向，在阳谷郭店屯一

带大力发展农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1927年11月份，在阳谷城北的九都杨庄，召集了几十个有觉悟的革命群众大会，作了宣传。在碾房里开过党团员支部联席会议。同时，我党同志还召集了那些受徐登朝欺骗的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动员教育他们跟共产党闹革命。有天夜晚，在郭店屯的一个集会上，聂子政同志向大家畅谈了当前山东的政治形势，最后他很明确地指出：穷人唯一可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家结合起来一起干革命！集会的群众听了他的话，非常感动，满屋子发出“对呀、是呀！”等强烈的反响。党组织很注意群众的这种发自肺腑的革命激情。从此以后，党即在这一带开展组织革命队伍的政治工作，首先发动有觉悟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逐渐地形成了鲁西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当时我们的农会会员有五、六十人。为便于统一领导，将农协会员和韩的部队统编在一起”（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坡里暴动》）

1927年11、12月间，中共东昌县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坡里举行暴动，占领教堂，建立工农政权，同时发动博平暴动，联合进攻聊城。县委派张干民同志去省委汇报工作情况和暴动计划，请求指示。“到省后，与卢福坦、丁君羊、顾作霖等负责同志商议的。省委同意组织暴动，并指示要做好行动计划；暴动成功后要大力发展组织，进一步准备进攻聊城。”（张干民《1934年10月5日于吉林省粮食厅致李士钊的信》，《聊城市党史资料》第二期10页。）省委于1927年12月13日又致信东昌县委，信中指示：“一、宣传工作，公开出Cp，宣传以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与夺取政权之主张……。二、组织煽动工作。煽动群众直接行动（不必受首领的指挥）去杀土豪劣绅，分配粮食等。在群众起来之

后，我们应插入暴动群众中去，做群众的组织工作，以防首领之妥协。”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丁君羊专程来聊城了解暴动的准备情况，并亲赴阳谷与韩建德会晤。

根据省委指示，东昌县委加紧了坡里暴动的准备工作，不久在梨园设立了指导暴动的联络站，王筱湖任联络员。12月，东昌县委委员袁果来九都杨听取了杨耕心关于暴动准备的汇报，在聂子政、杨耕心的具体领导下，由50多名农会会员和韩建德的武装组成了近百人的暴动骨干队伍。杨耕心、聂子政和韩建德、曹万年等在定水镇、郭店屯、曹庄多次开会，研究暴动的计划，布置暴动分工，他们还带韩建德等人到聊城姚家园子赵以政家中（县委机关所在地）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决定于旧历腊月30日下午发动暴动，利用敌人花天酒地，人烟煊腾的时机，乘其不备一举占领坡里教堂。后为防止泄密，加之韩建德执意提前行动，所以暴动的时间又改为腊月22日。

1928年1月12日（旧历腊月20日），韩建德、宋子美等到坡里庄找到一个姓李，外号“四猫眼”的“内线”，了解了教堂的一些情况，并得知1月14日晚上教堂晚祷，9点多才关门，遂做好了暴动准备。

三、暴动的过程

在组织准备的基础上，1月14日（旧历腊月22日）下午，韩建德、聂子政率领农会会员和韩部骨干30人左右，携带18支长短枪和腰刀、标枪、木棍等武器，于郭店屯西杨家庙集合出发。为迷惑敌人，散布出要把队伍拉到莘县去的消息。黄昏时刻，队伍悄悄靠近到教堂北一里路远的金线河（现名

徒骇河)的河湾里埋伏起来，聂子政同志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韩建德即进行了具体战斗布置：由他带领十几个人组成尖刀排，扮作晚祷的模样混进教堂，然后以枪声为号，大部队迅速接近教堂。

韩建德遂率杨万奎、朱新系、刑二、宋学言、韩建春、王德五、位金锁等十几人组成的尖刀排，陆续靠近教堂大门，正好两扇偏门未关，但两名守卫不准入内，说着就要关门，被刑二一刀将一名守卫刺倒在地，另一守卫被迅速绑上塞进门楼。尖刀排一涌而进，占领了位于教堂中的二门楼，打了一排子弹，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埋伏在河湾里的队伍听到枪声，迅速冲进教堂，将大门关上，并用石滚顶住，在一片喊杀声中，教堂全部被暴动部队占领，护院、打手、教徒二三百人被集中控制起来，从地道和夹壁墙中搜出主教及修女等六人，缴获长短枪四、五十支，子弹2万余发，银元2.7万元，粮食不计其数及大批物资。曾在中国人民面前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卒，一个个狼狈不堪。

起义军占领教堂后，山东省委委员兼县委委员王寅生和东昌县委书记张干民由聊城赶到教堂，成立了“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支援暴动，加强党对起义队伍的领导，县委立即调博平袁楼党支部郭庆江、林梦白、袁敦臣、袁圣绪、袁卒绪等五位同志赶赴教堂。聂子政也在聊城北周店组织党员和农民协会成员奔赴教堂，原计划参加暴动的武装，也都很快赶到教堂集合，不几天就汇集了四、五百人。为了加强对暴动队伍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巩固发展起义队伍，聂子政、杨耕心在暴动队伍中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并和韩建德一起组建了起义队伍的领导机构，韩建德为总司令，聂子政

(党员)为政治委员,程宗岳为参谋长,宋子美(党员)为参谋主任,王志本为第一路军司令,王朝聚为第二路军司令,曹万年(党员)为第三路军司令,崔存厚(党员)为第四路军司令。司令部下设五个科:宣传科,负责人宋占一(党员)、申仲铭(党员,兼韩建德的机要秘书);谍报科,由郭庆江、林梦白(均系党员)负责;还有民政科、总务科、财务科。还有执法处,处长任振高。

为宣布暴动队伍的政治主张,起义队伍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以“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附近村庄、官道上和聊城等处张贴了“告民众书”。其大意有以下几点:①指出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洋人之下,兵匪遍野,骚扰地方,民不聊生。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挑词架讼,倚势欺压,苛捐杂税,重利剥削,贫苦人民不得活命。③兵匪骚扰,拉夫抓丁,除出大车,抬担架外,大军过境要送水送饭,要粮、要钱,甚至还霸占民房,侮辱妇女。号召贫苦大众要一致奋起反抗,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洋奴、卖国贼。④废除苛捐杂税,高租高息,减轻人民负担。⑤最后提到要建立全民选举的县政府,开放民权,使人民有真正的发言权、监督权等等。

同时打开了教堂和地主的粮仓分粮。教堂里粮食很多,在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不知几千或上万石,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肩挑车推,仅3天就分粮数百担,暴动武装不仅将教堂储存的粮食发放给群众,还组织周围一二十里内各村群众同本村的地主豪绅作斗争。起义武装借放粮之机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起来斗争。这一措施,“一则是号召广大群众跟我们闹革命,二则表示我们决不是什么打家劫舍的土匪,用实际行动表现我们是要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以便扩大我们

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农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教堂内外，四乡群众欢欣鼓舞，拍手叫好”（申仲铭《阳谷坡里暴动回忆》，山东人民出版社《光岳春秋》第30页）一些青年，也持械参加了暴动队伍。

暴动武装在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定的。反动政府和绅士慑于暴动武装的威力，企图以官禄作诱饵，玩弄起所谓“收编”的伎俩，他们先派地痞盛思本讲和，许以高官厚禄，结果在“和谈”中被韩建德亲手枪毙，他们又派杨举庄的杨万顺前来“说和”，也被杨万奎打死。东昌道尹陆春元又派警兰斋出面谈判。在谈判桌上，暴动武装的代表历陈阳谷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教堂洋人的罪恶，阐述了暴动武装的政治主张，并将准备好的评价劣绅污吏的书信交警带回。警回去以后对人说：“坡里这杆人不简单，非同小可”。为了进一步阐明暴动武装的政治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暴动武装又发布了“枪毙盛思本宣言”和“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宣言”。

在暴动武装内部，还整顿了军纪，加强了群众纪律教育。暴动武装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一天，暴动武装在九都扬没收地主枪支，发动群众分粮，一群众说他家中少了东西。对此，韩建德进行了严格追查，对这一群众进行了赔理道歉，并照价进行了偿还。

四、暴动武装反围攻

暴动的行动和声势日渐浩大，使东昌道尹陆春元极为恐慌，惊呼：“这是赤党倡乱！”他命令阳谷县长王家贞迅速处理。王家贞惊恐之极，竟从马上跌下摔死了。陆春元1月

18日调集所辖12县的警备队四五千入，于1月26日完成了对坡里暴动武装的包围。但由于暴动武装声势浩大，警备队战斗力不强，经陆春元一再督战，警备队才向坡里发起进攻。但一经反击便四处溃散，窜回青杨李。暴动武装摸准了敌人的规律，便在徐庄设伏，先后俘敌阳谷县警备队长郭敬修和敌连长两名，缴枪30余支。暴动武装还组织了七八人的突击队，主动出击，为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暴动武装派出一支部队向坡里北焦集的民团局子发起进攻。这次战斗缴获步枪8支，弹药一部。这几次战斗缴获枪百余支，沉重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暴动武装的力量。

1月27日以后，军阀张宗昌派了装备有火炮等重兵器的刑广弼（一说杨广弼）旅二千多人，配合各县警备队和大批民团武装，并得到河南督军寇英杰所派部队的增援，继续对坡里实行围攻，不时以火炮、机枪向教堂射击，有时一天连续进攻数次。面对强敌，暴动武装以教堂为核心，凭借周围的民房，沉着应战，英勇反击。1月31日，数百名敌人由南面2里多远的定水镇一带向我扑来，他们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以密集的炮火进行轰击扫射，暴动武装派出40多人的突击队，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隐蔽于一侧，当敌人迫近不到百米时，突然从敌侧后发起冲锋，敌人措手不及，仓惶溃逃。敌人又在一座土窑上构筑炮火阵地，集结兵力，准备发起进攻，暴动武装立即派出突击队，顺着一条河叉摸到了土窑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将敌击溃。在这次战斗中，双方各有伤亡。

2月7日，战斗更加激烈了。上午8时，近千名敌人从东、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我方首先是曹万年同志带领百名勇士出击，激战中有几名战士受重伤，

曹万年头部受伤，流血不止，晕倒在地，被战士救回。我方改由崔泽民指挥战斗。到上午十一时左右，暴动军及时改变战术，撤回教堂以观察敌情。敌人占领了教堂附近的民宅，但看到暴动武装众志成城，戒备森严，不敢贸然发起攻击，只好在民宅里隐蔽起来。黄昏，暴动武装凭借熟悉的地形，分东西两路发起反击，杀得敌人溃不成军，伤亡惨重，我重新控制了教堂附近的民宅。

暴动武装领导分析了所处的形势：原计划配合坡里暴动的博平暴动，由于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赶来支援坡里暴动，没有发动起来；原先联络的一些红枪会及武装群众由于基础差，缺乏党的统一领导，未来支援；参加暴动的多系农民，在教堂被围困的情况下，有些人思想动摇；敌人十几倍于我军，而我孤立无援，弹药殆尽。据此，大家一致同意撤出教堂，会合与韩建德有联系的红枪会，然后过石家庄、娘子关，到山区打游击。

傍晚，暴动武装将洋人和逮捕的恶霸地主韩丕显、韩丕厚绑在马上，将伤病员和老弱组织起来，做好突围的准备。天黑后，暴动武装派精悍小分队向敌发起佯攻，并点燃了放在铁桶里的鞭炮，一齐呐喊冲击。在枪声喊杀声中，暴动武装留二十余人坚守教堂，阻止和迷惑敌人，大部队趁着漫天的风沙，向西北方突围而去。

暴动武装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境地后，韩建德让聂子政、申仲铭等返回聊城，向县委汇报情况。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撤退。

直隶督办褚玉璞接到张宗昌的电报，对暴动武装进行堵截。暴动武装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损失严重。之后暴动武装威逼洋人，借此占领了冠县东北50余里

的甘屯教堂。因弹药殆尽，无力与敌人周旋，被迫于夜晚解散突围，起义至此宣告失败。突围以后，部分人员转入地下斗争。

五、暴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阳谷坡里暴动，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山东省委盲目地执行中央的错误方针。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号召各地发动农村武装暴动，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没有注意被掩盖着的“左”倾思想。同年10月，“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革命的进程，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敌人的屠杀政策，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提出党的总策略就是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总暴动。当时的山东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山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指导山东的革命斗争，认识不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鲁西北是末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地区，很不容易获得成功。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这段时间里，山东省委执行的是一条“无动不暴”的农运方针，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因此，在明知鲁西北党和农会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是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发动一个广大的群众暴动。当时的东昌县委，也是根据省委指示仓促发动暴动的，因此，坡里暴动的失败，从根本上讲，

是在主观指导上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

第二，反革命力量还占优势，武装暴动容易遭到敌人的及时镇压。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是发动农村武装暴动的有利时机，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机产生出来。山东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提出要利用张宗昌军队败退，国民党新军阀刚到山东的这一时机组织坡里暴动。但1927年底到1928年初，正处于张宗昌的军队退守山东，军阀战争暂停之机，张宗昌的统治还很严密，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农民暴动。因而张宗昌派了一个旅，并得到河南督军寇英杰所派部队的增援，配合大批的民团武装联合进攻坡里。我起义武装，对如此优势之敌（多于起义武装的十几倍），估计不足，未能采取战略转移的措施，而是孤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突围。突出去后，又遭直隶督办褚玉璞所派部队的拦击，不得不解散突围，终于失败。

第三，党的力量薄弱，群众发动的不广泛，不深入。当时鲁西北的党组织和党员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由于东昌县委刚刚建立两个多月，大多数党员也是刚刚入党，缺乏教育和锻炼，这与其担当的任务是极不适应的。同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西一带的农民虽曾有过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大都是自发性的，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的。到坡里暴动时，其附近只有郭店屯、九都杨几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和组织了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农民协会，但这些会员缺乏严格的思想教育，对其他的农民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得也不够。暴动起来后，起义武装几乎陷入孤军作战，得不到外面群众的支持和援助。

第四，缺少一支党所领导的坚强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作

骨干。参加暴动的除韩部的绿林武装外，皆系农会会员，武器少且质量差，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有革命热情，无战斗力，接受我党领导的韩建德的绿林武装，组织纪律也很差，革命目的不十分明确，充当不起骨干来。暴动的我党领导人只有个别同志懂得点军事，大都没有军事知识，缺乏指挥才能和战斗经验，尤其我党领导人聂子政、申仲铭等遵照省委指示，撤退中途返回聊城，使韩建德的起义武装失去了党的领导，致使在强敌追击和拦击的情况下，没有核心人物制定决策，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作为全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伟大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使鲁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初次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所树立的革命红旗，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影响。它打击了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促进了鲁西北人民的觉醒，也锻炼了我们的党，积累了斗争经验，播下了革命火种，为鲁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不能设想革命靠一次冲击就能取得胜利。

高唐谷官屯暴动

王东升 张金洪 杨明坤

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我党领导和发动的以谷官屯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是在农民自发的迷信组织——“红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打土匪、斗豪绅、抗捐税，直到后来计划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举行的暴动虽然在军阀、豪绅、地主、土匪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却震慑了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唤醒了人民群众，点燃了革命火种。

一、在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中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鲁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当时鲁西北处于蒋介石的“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对峙的局面，土匪杂团乘机四起，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高唐地处东昌道东北部（今聊城地区北部），是鲁西北著名的产棉区，历史上虽有“金高唐”之称，但绝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封建地主手中。除了地主欺压广大劳苦群众外，还有当地官府和豪绅恶霸为害。当时，在高唐有以陈裕三为首的“十虎兄弟”，他们中有省议员、县府科长、商会会长和包揽词讼的“刀笔”，还有土匪头子。这些人结成封建反动集团，为非作歹，横行一方。同时，奉系驻军和土匪李长兴等人，时而互相火拼，时

而狼狈为奸，到处拉杆绑票，草菅人命。在这种情况下，“红门”、“玄门”、“金钟会”、“铁板道”等道会门应时而起，到处设坛烧香，拜神附体。官府、“十虎”、军阀、土匪、地主、豪绅、道会门共同勾结起来，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加之水、旱、蝗、瘟连年为害，人民群众饥寒交迫，遍地呻吟，朝不保夕，担惊受怕，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高唐一带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复杂。

高唐在1926年就有了党的活动，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金谷兰。他在聊城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5年夏在南去广州参加革命的途中，返回鲁西北地区，不久即同我地下党建立了关系，进一步接受先进思想。1926年秋在高唐县城完小经杨笙甫（山东高密人，济南一师毕业，后脱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金谷兰根据鲁北县委召开的八县党的工作会议精神，以自己的家乡高唐谷官屯为活动中心，从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发展党团组织 and 组织农民武装等革命活动，大力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以迎接国共合作的北伐。中共鲁北县委负责人李宗鲁不断到高唐指导工作，并和金谷兰一起发展了小学教师徐心斋、杨厚基，农民李玉红、田义三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中共高唐谷官屯党支部，金谷兰任支部书记，田义三任组织委员，李玉红任宣传委员。支部先后发展了一些农民为党员。

正当全国革命胜利发展，高唐党的工作也顺利前进之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10日，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遵照“八七会议”的方针，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暴动。

11月，中共中央发出《山东工作大纲》通告，进一步提出要有计划地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谷官屯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大纲》精神，为武装暴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

二、宣传教育群众建立农民武装

当时，高唐城北有个带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组织——红枪会（红门），成员多系贫苦农民。他们为了反抗军阀劣绅的压迫，经常操练拳棒，同时也设坛烧香，拜神附体，搞些封建迷信活动。金谷兰认为，红枪会成员比较纯洁，有一定的阶级基础，经过说服教育，可以转变为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也拜师入坛，带上了“红兜兜”。这样他和群众的关系不但更进了一步，而且还带动了不少人加入了“红门”。这年高唐因蝗虫为害，农民生活更加艰苦。金谷兰一面将自己家中积存的一仓谷子分给了贫苦农民，一面根据党的指示，采取各种形式向红枪会会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如帮助小学教师办农民夜校，有时亲自给夜校上课，并编了“打倒南军和北军，打倒老财把地分，虎头（指高唐“十虎”）大褂子，一律都除根”等歌谣，让青年农民唱。为了壮大这支武装力量，金谷兰主张各坛口联合行动。1927年春，他根据党的指示，在城西十里铺村“十乡会”上，提出了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得到了各村的拥护，被选为十乡（十个村）的团长。从此，“红门”改称“红团”，使这支自发的农民迷信武装团体，有了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金谷兰将附近合作的红枪会编成军事性质的十数小队，以贫雇农为骨干，以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

税为口号，并进一步团结其他红会团体。如：封建反动势力为了对付红团，借“北伐军”逼境、要成立城内保卫团为由，每亩地增税二角，并派其狗腿土匪到红团逼款抓丁，遭到红团反对，全县民众也大哗。红团“直欲攻城与彼决一死战。其他红枪会皆欲联合抗敌。并在城西十里铺召集一小首领大会，我也参加。到会的人，有一百多，拿出我们办团的宗旨一演说，其他联庄会遂失信仰，只有愿意与我们合作。”（金谷兰：《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由于红团的办团宗旨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红团在原来几个村的基础上，陆续发展到阎角寺、田寨、邵庄、太平庄等20余村。

在金谷兰等党团员的具体领导下，红团逐渐克服了封建迷信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他们的活动内容由以前的设坛烧香，练武，变为镇压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和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等政治经济斗争。并先后除掉了外号“红兜肚子”的土匪头子张合、李德荣、于大妮等几股土匪，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于是红团声威大振，农民运动很快在高唐、夏津一带形成了燎原之势。

为解决红团的武器装备问题，金谷兰把自己的18亩地卖了，共得480块银元，全部用于购置武器。在济南买来400个长矛，40把大刀，他又参考古代兵器的式样，别出心裁地设计并锻造了300个叫“铁蒺藜锤”的简易武器。锤上有3排刺，每排8个，很象一个长满铁针的甜瓜；下面铸有一个铁鼻，装上一个木棒，可拴上带子背在身上。这种武器每个1.2斤，目标小，效力大，又很方便。还买了些手枪和手电筒。在金谷兰的带领下，还有些党团员和红团团员捐了钱，买了油印机、笔墨纸张等，用来武装了红团。有了这些装

备、谷官屯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红团的发展与主要斗争事迹

中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高唐县的农民运动和以谷官屯为中心的革命武装，先后派李宗鲁和省委委员李春荣到高唐指导工作。鲁北县委把进一步发动农民、教育农民，发展农民协会，扩大农民武装作为中心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28年2月，在谷官屯召开了鲁北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山东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讨论了建立农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如何将斗争引向深入问题。会上李春荣讲了话，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这次会议也受到了当时省委“左”倾思想的影响，山东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认为：“山东的农民客观上已经暴动化；”“虽群众已有十二分暴动起来的可能，而仍不敢领导的怯弱心理，实在是我们各地暴动不起来的主要原因。”要求各基层组织只要客观上可能，即便在主观上力量不足，也要勇敢地领导群众斗争。会议之后，红团得到了新的发展，并进行了以下主要斗争。

第一，扩大党和红团的政治影响。党支部组织红团团员把“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口号写成标语传单，张贴到城北各大村庄甚至县公署、警察局的大门上和县城中央的鼓楼上。这些标语口号，唤醒了群众，扩大了党和红团的影响，长了穷人的志气。当时人心沸腾，到处有催人练武的锣鼓声和号角声，

搞得反动势力惊慌失措。

第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谷官屯大地主李洪楼，平日里依仗官府，勾结土匪，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家有不少枪支，常在外绑票勒索，残杀无辜。有时把人用铁丝缠起来，活活埋掉。红团声势日渐扩大，李洪楼又勾结土匪头子、大地主李彩题（又名李九）、李长兴等反动势力密谋策划，妄图暗杀金谷兰和鲁北县委领导人，使农民运动失去核心。敌人的阴谋被群众及时发觉。根据鲁北县委指示，金谷兰于1928年3月1日带领部分红团团员将李宅包围，活捉了李洪楼、惯匪郭景芳、张麻来、恶霸张罗、彭秃子和狗腿子殷牛等6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行，然后押到谷官屯南圩子小门外，用红樱枪挑死。同时，没收了地主李重庆的枪支，把他的住宅作为红团团部。这一事件，轰动了高唐县城及鲁北地区，农民武装力量的声威进一步扩大。

镇压了罪恶累累的李洪楼等人之后，接着又打击了高唐城北苦水李庄的恶霸地主王金建和李干臣及县商会会长、劣绅姚鼎汉等，并开仓济贫。从而发展了高唐地区的革命形势。当地著名的地主劣绅大半弃家逃入城内，县反动当局慑于红团的声威，也无可奈何。

第三、抗捐罢税，杀死盐巡。高唐城北十里铺一带地多盐碱，这里的贫苦农民常扫碱土，靠熬硝淋盐维持生活。包销食盐（海盐）的官盐店，为了垄断市场，控制食盐的销售，经常雇用一批“盐巡”，查禁淋盐，或盘剥税收。“盐巡”多是流氓和兵痞，乘机向农民敲诈勒索，甚至以“砸盐池子”为要挟，有些盐民被弄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对“盐巡”无不恨之入骨。红团提出抗捐罢税的口号，盐民们积极响应，

大淋硝盐，拒不交税。于是官盐商和官府串通一气，用重金收买了李春城等几个“盐巡”，妄图以查禁私盐为由，借机到红团刺探情报，刺杀金谷兰。一天，李春城等6个“盐巡”窜到谷官屯，在南圩子门外的茶馆里，诡称有要事找金谷兰商谈，企图把金谷兰骗至茶馆，予以枪杀。他们的阴谋被红团团员发觉后，把6个“盐巡”扭送至团部，金谷兰亲自审讯，并痛声申斥“盐巡”敲诈农民的罪行。此时群众愤恨已极，齐声高喊“杀死他！”金谷兰召开了支委会，决定第二天到东十里铺盐民最多的地方开公审大会，处决“盐巡”。

4月27日上午，红团团员押解6个“盐巡”去东十里铺举行公审大会，途中发现有的“盐巡”想逃跑。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6个“盐巡”除一人逃跑外，有的被红樱枪挑死，有的脑袋被铁蒺藜砸开了花。事情发生后，高唐县府不敢去谷官屯收尸，官盐店只好用粮食赎回了“盐巡”的尸体。

通过这些行动，谷官屯一带的农民进一步被发动起来，红团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威振鲁西北平原。“铁蒺藜金谷兰”闻名于高（唐）、恩（县）、夏（津）、武（城）一带，成了穷人的一面旗帜。

四、武装暴动及其失败

1928年4月，国民党的“北伐军”抵达泰安、长清一带，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土崩瓦解，各地散兵纷纷北逃，鲁北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执委会后，鲁北县委抓紧利用张宗昌撤离，蒋介石的“北伐军”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鲁北农民举行暴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山东省委于4月28日将鲁北县委改为

鲁北特委，决定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特委建立后，立即举行了会议，李春荣作了报告，主要讲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发动起义等。同时，根据省委指示，决定红团截击溃败的散兵，收缴他们的枪支，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于5月4日举行总暴动，摧毁高唐反动势力，进而建立工农革命根据地。会上，李春荣还把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行动一一作了布置。

李春荣、金谷兰等同志反复研究了暴动方案，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思想上，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向红团团员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发动，使红团团员树立不怕牺牲、团结对敌、敢和敌人拼到底的精神；在组织上，尽量让党团员担任领导工作，并进行了组织纪律方面的教育，克服红团中存在的自由散漫现象；在军事上，一面积极进行训练，一面派出队伍到官道上截击散兵，收缴枪支，武装自己。金谷兰的妻子袁子孝精心绣制了一面党旗，准备占领高唐县城后，将它插在钟鼓楼上。在这同时，红团团员赶写了一批标语，刻印了一些传单，准备暴动后张贴。

为了暴动时便于指挥，红团建立总局，金谷兰任团长，姜占甲（高唐城北一带的红门首领，1927年在金谷兰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靳兴荣任副团长，并将25个村庄的团员编为7个大队。即谷官屯为第一大队，队长李玉红；杨庄为第二大队，队长杨斯英；阎寺为第三大队，队长赵长华；太和庄为第四大队，队长靳兴禹；三殿庙为第五大队，队长刘振江；范庄为第六大队，队长毕长祥；十里铺为第七大队，队长赵存俭、赵汉亭。每个大队还下设5个小队，人数不等。红团计划集结后，先打大土匪李九的老巢——打渔李庄，再

去占领高唐城。红团团员们都摩拳擦掌，盼望着暴动的日子到来。

反革命的力量也在聚集着。那些受到红团沉重打击或感到严重威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这时都聚集在县城里，拼凑反革命力量，伺机向革命反扑。由于红团的保密工作不周，谷官屯大地主、土匪头子李金海探听到红团准备暴动的消息后，慌忙报告了县长张振生。张振生连夜召集警备队长李长兴、土匪头子李九密谋，定在红团暴动的前夕摧毁暴动组织。

5月3日晚，李九带土匪首先包围了红团第六大队所在地范庄，并有一股经过化装的敌人进了村，通过敌人的“内线”，将大队长毕长祥骗出家中，予以扣压，然后解除了六大队的武装。

这天深夜，李洪楼的儿子李福庆和另一暴徒窜至高唐城内县立中学，将积极支持暴动的该校校长金石兰（金谷兰的二哥）枪杀在床上。5月4日凌晨，李长兴、李九带着配有马队的近千名军警联合武装，悄悄地包围了红团总部所在地谷官屯，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时，特委书记李春荣，红团团长金谷兰，副团长姜占甲等主要领导人正在团部开会，连续几夜外出截击张宗昌败兵的队伍返回刚刚睡下，已很疲劳，村里的防备很薄弱。听到枪声后，团部已被敌人包围，房顶上、街上都布满了持枪荷弹的匪兵。开会的人员迅速焚烧了有关文件，跳后窗突出团部，立即分头应变。金谷兰率人保卫特委所在地，姜占甲带领一小队人到谷官屯东栅栏去阻击敌人。几处已和敌人接上火的红团团员奋勇拼杀，用红缨枪、大刀、铁蒺藜锤和少数步枪打死打伤几十名敌人。这天适值大风飞扬，位于上风

处的邻村听不到枪声，接济不上，所以敌我众寡悬殊。敌人的骑兵在村外飞奔呐喊放枪，有些红团团员不暇集中，便向外冲，致使不能有效地反击敌人。村内的敌人放火烧了红团团部、特委所在地和金谷兰的家。

李春荣为了分散敌人兵力，掩护金谷兰和群众向北突围，决定向西撤退。他高喊着“冲啊！”带领李金亮、李瑞常向西冲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接连击毙几个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遍身是血。他顽强地支撑着，边打边退，终因伤势过重不能走路。两个红团团员就近把他背到地主郭金训的屋里，李瑞常给李春荣包扎伤口，李金亮用枪逼住郭金训，准备等敌人撤退后再转移。郭金训借口解小手溜出大门，把匪兵引来。李金亮、李瑞常带伤应战，但寡不敌众，英勇牺牲。万恶的地主郭金训用坯块猛击李春荣的头部，李春荣壮烈牺牲。

金谷兰带部分红团团员和群众与敌人一阵拼杀，终于从北门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他担心李春荣的安全，便让部属继续撤退，自己带领几个红团团员隐蔽在一所房子里，准备迎接李春荣……

田凤山、李成春、田永乐、李金山等7位红团团员听到枪声，急忙起来，拿起长枪和铁蒺藜锤，高喊着冲向敌群，立时有好几个匪兵被击倒在地上。冲在最前面的田凤山牺牲了，后面的继续往前冲。李金山受伤了，仍呐喊助威。李成春牺牲了，剩下的三个还是往前冲……

带领部分红团团员到东棚栏去阻击敌人的姜占甲，也与敌人拼杀在一起。姜占甲手使一口单刀，冲锋在前，一连杀了几个回合，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终因双方力量悬殊，姜占甲身中数弹，最后英勇战死，时年39岁。

敌人的这次袭击，使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县立中学校长金石兰、红团副团长姜占甲和团员李福胜、李金亮、刘兆全、田风山、李成春、杨金强、李长庆、赵长玉、李瑞常、杨少成13人被杀害，李金山、田勇亭、李凤春3人身负重伤。天明以后，周围村庄鼓声四起，其他村庄的红团，有的闻鼓声前来救援，有的按预定方案前来集结。狡猾的敌人闻鼓声很快撤走了。但由于暴动的领导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失去了指挥，使这次暴动归于失败。金谷兰向省委汇报情况后，回到城西袁庄开展地下斗争。

红团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教训有以下三点：一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特委认为蒋介石的“北伐军”即将到来，张宗昌的高唐县政府自顾不暇，而没有认识到高唐县封建势力相当顽固，敌人的势力还很强大。当时县大队、警备队中都有“十虎”和大地主、大恶霸的子弟充当骨干，与官府串通一气的土匪势力也时刻准备扑灭高唐的农民运动。豪绅勾结官、匪联合进攻谷官屯时，就是大土匪李彩题首先带领200余名装备精良的土匪进攻屯内，杀死我特委书记李春荣等十几名革命同志，烧毁我红团总团部的。二是暴动的准备不充分，骨干力量不足。鲁北特委只是根据省委指示，在奉系军阀撤走，新军阀到来之前这个空隙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这确实是一个很有利的时机，但对如何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却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之红团的成员多是在自发的迷信组织——红枪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不到半年时间，对革命的性质、目标还不够明确，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各大队中共党员太少，独立作战的能力较差，难以经得住严酷考验。

三是麻痹大意，消息不灵，缺乏必要的侦察组织和人员，情报不准，甚至完全没有情报。如敌人夜间袭击了两个村子，均未报到团部。加之团总部苦于没有武装斗争经验，吸收了几个旧军人到团内来，这几个人中有的两面派。他们混进了团部和秘书处。敌人暗中收买他们，探听到我暴动的行动计划，致使敌人在我暴动前突然袭击，破坏了我领导指挥机关，打乱了暴动计划，暴动队伍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解体了。

高唐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唤醒了群众、在鲁西北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意义是深远的。

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辖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份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

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 一、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
-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

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下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中共“八七”会议 告全党党员书（节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地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禁止苛约，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抗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一一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

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它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在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

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动，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一一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为左倾之宣传，然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一一说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

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呢？只要是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党的中央坚决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正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正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末，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

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有看看二十六日的议决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后，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方〔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似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动摇犹豫，完全帮忙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

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段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末，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人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武装问题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主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之观点。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能暂时与革命相伴，都是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意兵士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动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但军阀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与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作用，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时间去讨

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许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等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之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成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此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的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在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样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策略和他们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变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涵些。党的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

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间，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山东省委关于阳谷暴动给 东昌县委的指示信

××及东昌县委，

你们的报告收到，但是因纸的关系，洗不清楚，仅能看个大概。××只对于枪会首领会议的洋形〔情〕熟习〔悉〕，对阳谷的暴动则不甚详细。我们仅就报告中所能看出的及××所说的，对你们有以下的意见。若有重要〔处〕因看不出所缺少的指示，请从速来信。

一、关于红会首领会议应注意之点

（一）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认为是胜利的。一方面，K M T已受很大的打击；一方面，他们独立干，虽然这是几个首领的意见，但是已竟〔经〕比以前受K M T的指挥进了一步。我们再进一步使这〔几〕个首领所主持的暴动（不论能否起来与成功）而为以群众为主力的暴动。所以，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反K M T，以免K之再接再厉，一方面应准备去参加他们（红会首领）自己决定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暴动。在准备工作中，最紧要的便是：

（1）宣传工作。公开出C P，宣传以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与夺取政权之主张。（关于宣传工作可参看中央对山东工作大纲）。

（2）组织煽动工作。煽动群众直接行动（不必受首领

的指挥），去杀土豪劣绅，分配粮食等。在群众起来之后，我们应插入暴动群众中去，作群众的组织工作，以防首领之妥协。

(二)对K M T与李某。K M T已决然给我们告密，李某倾家败产的工作成绩为我们所破坏，亦令〔会〕对我们十分愤恨，思有以报。我们……

(五)青皮流氓。××报谓东昌县委以〔为〕红会皆青皮流氓，只知道报仇夺枪，原没想去做。这话果确，则东昌县委根本还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观点上观察事实。贫农可说是完全是青皮流氓，乡村中只有这些穷疯了去从掠，压迫急了来报仇的青皮流氓，才真敢拚命。至于自耕农以上的农民，至少是些保守者。红会之不可靠，不在其群众的青皮流氓，而在其领〔导〕权操诸豪绅地主及复辟遗老手里。我们在红会中的工作完全是要使青皮流氓的群众，脱离这些混蛋领袖的影响，而受我们的指挥。

二、阳谷暴动的准备与计划

在整个的准备与计划中，利用土匪作发动者以引起贫农群众的暴动，及分头占领重镇、缴械、分配粮食与土地给农民（看不清楚，大意是如此）等等，大体是对的。不过名义的问题，你们主张暂不拿出“农民革命委员会”来，我们觉得不甚恰当。第一，我们要注意，韩某是否真正能受我们指挥，而五百匪众是否有把握受韩的命令？倘若都无把握，则不但不能叫他们假冒农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而且〕根本便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他。第二，我们在每次农村的骚动中，

都要趁机公开出C P及农村革命委员会来，以广〔泛〕宣传。所以，这次韩某领导的五百匪徒举事，无论其能否成为群众暴动，我们〔都要〕拿出C P和农民革命委员会来，（并不是叫土匪打着C P和农民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作独立的鼓动与宣传。土匪〔若〕接受我们的主张，固效力较大；即〔使〕不接受，也坏不了我们的名义，而且会在贫农中留下些好影响。倘若能趁此鼓动起真正的贫民暴动，那便是我们进一步的胜利。

省 委

（1927年）12月13日

山东省委十二月份工作总结 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节录)

1927年12月28日

自中央清党决议到了山东，便开始进行。……省委为清党及解释扩大会决议案，派人往东昌、鲁南（鲁南巡视员之出发专为清党，因其出发尚在扩大会以前），胶东西部、鲁北等地巡视，（胶东东部巡视员一二日内即出发）。除鲁南、东昌巡视员已回省外，其余尚在外巡视，未得到整个报告。即东昌、鲁南各地党部，亦尚未完竣，仍在继续中，因清党工作原不能在最短期间企图其干干净净。惟东昌清党是在“准备参加阳谷暴动”的时期进行。结果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多半出去。所以阳谷暴动虽未成功，但与清党上大有帮助。

☆ ☆ ☆

东昌暴动有十分把握（另有计划），但因党部无领导能力不能立即实现。在平红会首领会议，我们在其中作了很好的宣传工作。阳谷党部当时则有利用土匪发动暴动的倾向，但因群众基础工作太差，终未成功（参看东昌暴动计划及《省委通讯》第三期）。



四、东昌暴动的客观环境之分析及党与农会的力量

(一)东临一带，在山东是个土地最贫瘠，农民生活最困难的区域。因此这一带的农民也较其他各地为强悍而富有反抗性。在今年去年间，东临一带农民之自发的反抗运动，至五次之多。此将其经过情形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去年二月间聊城西南乡农民抗粮的举动，号号〔召〕者是当地之破产秀才李太黑（下缺）于十二日集合，直趋县城，要求免粮，集合者四五百人，均为红枪（但非全为红枪），至城外群众（下缺）一人坐人力车入城，但当地区长已先期向官府报告，故早已有准备，李甫进城即遭击死（下缺）遂散去。

第二次是四月间朝城工会及贫农之暴动，暴动之目标，为反抗寇英杰部下薛传峰军队之骚扰，曾一度占领县城，薛部卒为驱逐。

第三次是五月间范县之暴动，其目标亦系驱薛军，县知事被逐，县城为红会及农民占据者月余，薛军经过这两次打击，遂归入消灭。

第四次是六月间阳谷之农民围城举动，其目的亦为抗粮，彼时在乡村间，突然发现一种匿名揭帖，云“于某日包围县城，不参加者即……（辱骂词句）”，至日集合者万余人，但因毫无组织和指挥者，随因道尹之欺骗而散去。

第五次是今年九月间，冠县红枪会因反抗军队骚扰，群起杀一连长，并缴其兵士之枪械。

第六次是本月间，冠县农民因反抗预征与官兵之冲突，惟旋即调和了事。

据以上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东临一带农民之富于反抗性了。可是现在他们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状其苦了，东昌也是一个旱灾区域，主要的食品收获情形如下：

- 1、麦子每亩约收三斗，每斗现价约洋一元；
- 2、高粱每亩约三斗，每斗现价约铜元二百五十枚；
- 3、谷子每亩约五斗，出米约三斗，每斗现价约洋一元；
- 4、玉蜀米、豆子、绿豆等绝无所收获；
- 5、白薯收获极坏。

北方土地因气候关系，每年只能种两季。按照今年情形则是秋季豆子、绿豆绝无所收获，白薯所收也极微，谷子、高粱之收获亦甚平常，棒子（即玉蜀米）亦绝无所收获。而纳粮数目，（下缺）一亩，截至现在已须纳一元（合铜元四百枚）以上。是则东临一带，若将人工、食料、肥料各项成本（下缺）之价格比较，不须详细计算，即可知其相差太远。是以东路各县一般情形，农民在（下缺）旧历年前，无粮吃者即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明年春间即可想见。这种生活上的困难，已使东临各县的农民，普遍具有铤而走险的决心。他们整个的脑子，已为“张宗昌、县官、豪绅及区团长的痛恨”“找生活的出路”的几种思想所占据。他们并无所恐惧。阳谷的农民，在谈话的中间都不断地提起他们围城的壮举。聊城西南乡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李太黑如果现在领着干，你看能有多少人去？”这话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现在借已无李太黑其人，另一方面是现在比二月间更难受的多了。他们又说：“李太黑太有勇无谋了，他是不应

该一个人进城的！”因为李太黑在他们脑子里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我们曾对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个领着穷庄稼人干这些事的李太黑。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有勇，而且有谋。李太黑的办没还不是铲草除根的办法。我们不要只抗粮，因为抗下这次，还有那次，将不胜其抗。我们应该永不给军阀纳粮，就是要打倒张宗昌以及和张宗昌一样的冯玉祥、蒋介石、县官以及和县官勾结的豪绅区团长等”。他们对这（下缺）十分接受的。

东临各县的农民只要有领导者，绝不须等待特别的机会，在“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分给农民”，“杀区团长”，再加以各区的特殊口号，如“为李太黑复仇”等口号之下，即可随时干起来。最近东昌曾计划借土匪和红枪会的发动鼓动一个暴动，后因土匪领袖韩某中途不干而未成，而阳谷北乡农民，无不大骂韩某。

（二）党及农会的力量。党的支部，在这个暴动中能发生作用的有六个，其所在地点是：博平之袁家楼，聊城之周家店、张庄、关帝庙、堂邑之凤凰集，阳谷之九度（都）杨。袁家楼距东昌三十里，周家店张庄各距东昌（聊城）二十五里，凤凰集约三十里、关帝庙三十五里，九度杨四十里，这些地点恰好是在二十五里以外四十里以内之距离，对东昌是一个包围式的，袁家楼现有同志五人（都能到前线）二月前决可增一至二十五人（已决于二月前有五倍之发展），周家店现有同志五人，二月内已决可增至二十五人，张庄同志三人，二月内至十五人（此地定可较决定数目加多，因已加派人去）凤凰集现有同志三人，二月内至十五人，关帝庙现有同志六人，二月前可有三十人之发展，九度阳（杨）现有同志九人，二月前可有四十五人之发展，并于以上各地成立区委，每区至少

可包括五个乡村以上，在袁家楼、周家店、关帝庙及九度阳等处，均有农会之组织，其数目（会员）在袁家楼有六十人，周家店三十人，关帝庙二十人，九度杨百人（以上数目以确能行动者为标准不甚可靠者不在内）总数约二百人，行动时可有红枪百枝，洋枪没有（因他们多无力购枪）二月前决可有十倍之发展（扩大会决议之一）

以上是党及农会之所在地，党员会员之现在的数目（党员约三十人，会员约二百人）及二月前之可能的发展，（党员百五十……会员二千）其实力党员之十分之九，会员之十分之六，决能于暴动动员令下，即刻行动起来（在未成事实的阳谷暴动中，曾下二三十人之动员令在此三十人中，党员约占十之七，会员约占十之三，党员之推诿不前者二人——已开除——会员之不前者三四人，若我们未来的暴动有了更好的准备，且在清党之后，及一度整顿农会之后举行，以上十分之九千分之六之可以上前线者当然有把握）团员在东临一带之为数约四十人农民占十之六，学生占十之四，但若与党在同一的标准之下洗团则所余定将无几，尤其是学生分子，所以团在未来的（二月前）暴动中的力量目下尚不敢估计。

（三）武装力量红会与反动：

1、红会：东临一带之红枪会，虽人数甚多，但因所在之道不同（按八卦而别），行动很难一致。所以现在他们受了冯的引诱，便拥冯，有受了张的委任的便保张。现在坎门道（约万人以上）拥冯，有不甚样之一部分拥张，但十之八是自动地反张（十二月六号曾因国民党分子之联络，东临一带，各会首曾在茌平开一大举反张会议；我们曾派同志参加，在会上宣布蒋冯及国民党之罪恶而提出打倒之口号，并

提出我们其他的主张，他们都很受影响，他们这些都一致反张是无疑的）。所以在暴动中至少他们中间的十分之二三可赞助我们，其他最低也可守中立。当然在暴动发动处和进行中，我们要充分注意到他们会中之贫农分子，使之来参加暴动（现在农会中及同志均有些在红会的）。

2、民团：这完全是豪绅阶级的武装。可是他们的力量，在东临一带大多数都微弱得很。因为农民的力量和红枪会的力量，都实在已经超过了他们。他们的驻在地，当然也就是豪绅的驻在地。县城及每县中的几个大而富庶的村镇，大劣绅（如各县之区长）及其他大绅士，平时均住城中，一方面为的是便于官府勾结，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很明显的贫农痛恨之目标而不敢家居。其家居者，则必须是该村镇有若干之武藏。所以如在阳谷方面，民团主要的是在城里，有枪九十支（在未成的阳谷暴动中，因事不秘，为民团长所知，曾亲派人送信给我们，云于我们攻城时献城缴枪，虽未必可信，但其自知力量有限，不足与民众力量抵抗之态度，已充分表现出来）。其他（下缺）镇、郭店屯、南乡之胡家楼等十数个豪绅集聚的富庶村镇，则各拥大枪十支至三十支。〔这〕些武装自然是我们在暴动之初，既应在计划中收缴的。其他堂邑、博平两县之情形亦略〔同，恐〕怕枪支更少。阳谷城里常驻警队及军队，大枪不过六百，东昌原驻有第八（？）的寇英杰部一师，实数只三团人，其最有势力之郭团（现称一旅）又在考城为冯军打散，所余之卞团、唐团实力极有限，枪支总数不过一千。其他在聊城的几个重要豪绅集聚之乡村，如沙镇、军屯等处，亦各拥有枪二三十支不等。聊城、阳谷、博平、堂邑各县反动武装大略如此。

（四）豪绅地主与贫农：乡村中的阶级分化，已渐明

显。在东昌附近各县农民对区团长之劣迹，认识最为清楚，他们每听见区团长召集会，即知又须纳粮。各县之重要豪绅及区长等均住县城内，他们不但在每次征收中，抽出他们应得的一部分，并随意挪用公款，按月享有公费。如聊城所存公款三十万吊，为豪绅区长借用，致教育费等用途无着，又向农民征收小粮一次（每亩铜元六十枚）。这些豪绅区长等也很知道农民对他们之愤恨，所以平时多驻城市，出行时亦慎重防备。此足见乡村斗争日益剧烈之一般。

（五）对东昌县委负责同志之批评：东昌各负责同志，都可以说是吃苦耐劳，忠实勇敢。因为党的历史太短，农民同志多系新分子，故七个执行委员会中，还仅有农民同志两人。可是东昌的知识分子，并不与其他各地知识分子相同，他们绝不似一般知识分子之动摇不定。但他们也有其缺点，就是他们的计划的能力比执行的能力差些。

（六）暴动区域：暴动区域以聊城、博平、阳谷、堂邑、茌平五县为中心地点，即以党及农会所在地为发动暴动之地点，同志及农会会员当然是发动暴动的中心力量。

（七）参加暴动的群众之估计：可以参加这个暴动的群众数目，当然主要地要看暴动时各方面客观的情形，以及我们主观的计划与行动而定。可是参加的群众至少不会在两万以下，这个数目是根据去年二月间的聊城西南乡的暴动参加者四五千，阳谷围城举动参加者万余人，博平、袁家楼、周家店、张庄一带之暴动因区域扩大，无论如何尚不在五千人以下。

我们作这个计划的意思，主要的是请中央审查东昌一带的客观情形及我们主观的力量，于最近期间是否能够有计划地作成广大的群众暴动。在批准后，当然还要另草一个

详细计划，以企逐步实现。苏维埃的旗帜，已经一度在广东竖起，自然这事件不只给了南〔方〕几省工农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可是这事件所给予北方工农的印象比较浅些也是事实。我们为了使北方的工农也同样地动起来，自然应该特别注意在北方来开始一个大暴动。东昌一带的党及农会的主观力量，自然是太落后，可是农民是这样地需要暴动。张宗昌的压迫远不及南方之新军阀，暴动之可能形成又是客观事实所允许，所以我们认为应于最近期间，积极地有计划地促成东昌一带的暴动。（中略）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发动农民 斗争问题的通告^①

(通告第十四号)

各县、市委、各特支：

山东的农民在客观上之已经暴动化，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可是两个月以来，我们在胶东方面、东昌方面、鲁北方面，都经过不少的努力而终于着着失败。这几个暴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我们各地党部认为我们主观上的力量太小，虽群众已经有十二分暴动起来的可能，而仍然不敢轻于领导的怯弱的心理，实在是我们各地暴动不能起来的主要原因。

山东还有很多同志认为，在山东的党未有相当的发展之前，山东的农民暴动是领导不起来的。这种观念毫无疑问的还夹杂着若干投机妥协的心理，而完全没有了解山东农民群众的实际状况。去年二月间，聊城李太黑号召的抗税举动，今年六月间阳谷农民的自动围城举动，五六月间朝城范县农民之反抗官兵举动，最近胶东的抗税举动等等，在最初的时候，都不曾有过怎样大的力量来领导，都是在行动起来以后，群众参加的才渐渐的多起来。这可见只要我们能勇敢地站在群众的切身的要求上领着干，群众之来参加是毫无疑问的，认为自己的力量不够的期待心理是完全错误的，是我们不能即刻领导着农民行动起来的主要的阻力。我们必须彻底地肃清这种新的投机妥协的心理。这并不是说无论客观和主观的情形怎样，我们总是不顾一切去鼓动广大的农民暴动。

但我们必须是只要客观上可能，〔即〕便在主观上力量不足，也要勇敢地领着群众斗争起来。这斗争也并非纯指着广大的农民暴动而言，〔还〕包括农民日常生活中一切对官府、豪绅、地主及区、社、团、里、庄长的小斗争或强借粮食抢劫集市树木、抗债等等举动。我们应该坚决地承认，山东的一切组织宣传工作只有在工农行动起来才有办法，广大的农民暴动，只有从加紧一切小的斗争中才可以发动起来。

旧历年前是最好的发动这一类小的斗争的时候，如强借粮食、抢劫集市、聚众抗债等等工作。各地于接到此通告后，必须即刻切实计划怎样来领导以上的各种斗争，并须于旧历年后，将这通告执行的情形详细向省委报告。

沈 伟^②

王以德

1928年1月10日

各地于接到此通告后，应即转录一份交C Y。

①题目是山东档案馆加的。

②沈伟（世称琛渭）系中共山东省委的代号。

给东昌信之一

东渠兄：

关于韩某率匪攻占坡里洋教堂的报告及你们参加的计划，已收到，省委对此事有以下的意见：

I、韩某的为人怎样？他为什么要联络我们？他的群众怎样？

关于这几个问题的答复，是决定我们计划的很重要的几个前提。韩某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土匪首领看，他很有些手段而且圆滑。他联络我们和他联络朱广泰等会首的目的是一样的，在消极方面，可以避免这些和他作对，在积极方面，还可以借势力用，以扩充他个人的力量，而他的目的是在造成一部分势力之后投冯，即冯不能来，投张也不见得是完全违背了他的初愿。他们群众若仅百数十人，则大部分是他多年的同伴或朱广泰等亲近的同道是可以想知的，因为在最初普遍群众是难以号召来的。我们若想进去活动这些群众是较难的。

II、怎样应付这件事？

根据以上的情形，对这件事我们不应该抱着过大的幻想，可是我们也并不是立刻要我们的群众退出而绝对不参加他们的行动，我们应当把希望借着他们的力量可以轰动起一个暴动的幻想打破而设法要他作一点有利于农民的举，如焚毁地主的契约，分散地主豪绅的粮食给贫农吃，这类的事，

除了督促他多作外，我们的群众应该认为是我们唯一的工作，在这工作中，我们应尽可能的号召贫农来有组织的分粮吃分地种，只要有些农民肯来这样做，便是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已经有了成绩，因为这样，可以逐渐的把乡村的阶级斗争掀动起来。

我们参加进去的群众不必过多，最多十数人即可，这些人要在占领某村镇的时候，首先夺些枪械并公开的要韩分些枪给我们，假设枪得不到，并焚地契，没收地主粮食的事也作不到。那我们便立刻全体退出。但在这时候我们应该谨慎他们将不利于我们的行动。退出后，假设我们自己能领导起一部分群众来，自然可以按照我们杀尽豪绅分地分粮的主张来使这个斗争扩大，如事实上不能这样作的时候，可以党的名义发一宣言，内容是说明土匪的来源，就他们的来路说应该为穷人作这些事，可是他们现在所作的完全不是这样，即如此其结果必是投冯或投张。归结到农民应该自己起来干。韩某曾一度与我们发生关系的字样，是绝对不容许露出来。在农会中也必须把我们参加这行动的意义和退出的原因给他们说明，不然他们会由不了解而以至误会的。

Ⅲ、你们现在的工作

以上的工作不过是县委临时应付的一件平常的工作，不应该把他看的过大过重要，因此疏忽了党的更重要的经常工作。就东昌的实际情形，党的经常工作应该是借抗粮抗债反对某一个豪绅地主，反对区、里、村长，或单纯的反对苛捐杂税等问题尽量的发动斗争，过去省委曾把这类的斗争也叫作“暴动”是不对的。一个暴动绝不是随时借着某一个题目号召起来的一个普通斗争，必须是经过了多少的斗争，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热烈的高涨起来，我们的主观力量足以胜过敌

人确有把握推翻其统治，（一省的统治或一县的统治都是）而代替之以苏维埃，所以一个“暴动”是一个有夺取一部政权的企图的群众的斗争，而且这企图必须在主观上（我们及群众力量及地位）及客观上（敌人的力量，群众的斗争情绪、时机等）都有实现的把握和决心。此种分别你们应立刻认识清楚并要使同志也都了解。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农村中的工作唯一的目标即是逐渐的启发农村中之阶级斗争，在一切组织宣传工作都要按照这个目标作去，即是在组织方面，无论党的农会都必须以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在宣传上要借着每一个问题或事变，来让贫、佃、雇农认识其压迫剥削者——豪绅地主、区、里、村长等——尤其在每一次农民自发的斗争或我们领导的斗争中，都要把他们引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即是毫不游移的对付豪绅地主等。

你们决不应因为参加土匪的工作疏忽了党的重要经常工作，组织宣传工作，必须按照以上的指导及作扩大会的计划切实的执行。

寄去三十元收到否？祝
礼

沈 伟
一月二十八号

给东昌信之二

东渠：

听了干民同志的报告，才知你们对坡里事变政策上根本错误，前去信所指出的几点，不过其枝节。在听了立玉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你们的文字报告后，省委已看到你们太忽略了群众中的工作，但不料你们竟不但忽略而且忘却及蔑视或不知怎样去作群众工作。常委对你们有下列的意见：

（一）政策上的根本错误——中央屡次指明土匪是土地革命的副力，前届常委接到你们韩某占据坡里之信后亦曾给信你们详细分析韩某帮匪内部组织关系及其趋势。（听干民说此信在他起行之日尚未收到）并听干民说东渠亦是决定：

“利用土匪骚扰的当儿轰动起群众来”，但这只可说你们在名词笼统的接受了利用土匪（不以他们为主力的意思）的指导，实质上还是“想以土匪（作主动者）来轰动群众……替天行道”的幻想和军事投机主义，与八七会议以前想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及国民党……及拉拢小资产阶级一样。

在坡里事变发生后，县委把同志都送到土匪队伍里去（至于一齐进去而被土匪注意单独编为一队，不能散布于土匪群众中与其下层群众接近，尚是技术上的小错）脱离群众，不站在群众方面发动至下而上的以群众为主的群众行动，而站在土匪的地位自上而下的去鼓动群众，使群众站在被动的地位；并且根本忘了鼓动群众，只是对群众表示侠义

慈悲，这与使群众盼望北伐军解除他的痛苦有何两样？县委把一切工作交到党团自己只站在旁发急，这便是无形中有个土匪政府的观念，意思是要使我们的政策——土地革命经过党团得土匪政府的同意自上而下的而施之于民众，这种作法，万分错误。

据干民同志报告，分粮所到之群众，共计不下四千，并且群情汹涌，并大声明叫分那家那家粮食，在此情形之下只要我们同志参加在分粮的群众中，领着他们自动的去分，便能使群众力量扩大，并且可以趁此杀豪绅焚地契，进一步召集农民代表会接受乡村政权，使土匪屈服或与之决裂而解决之。土匪也无如何，并且干民说土匪也不干涉。县委竟绝对注意不到此点，而只督促加入土匪队伍的同志去施舍式的分，命令式的去分。斗（发）动群众莫非还要使群众守土匪的纪律，使土匪来领导群众么？

再：你们以党及农会的名义所发表的宣言（未见原文）并未说明农民痛苦的原因及解除的方法，坡里事变中农民应自动的分粮分地杀豪绅焚地契……组织农民代表会，接收乡村政权，不能靠土匪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并公开指明土匪的危机，只是给土匪争人格当辩护士，无怪乎社会上一部分群众都说CP勾结土匪——其实若是积极的明了勾结土匪的用意则甚好，但是此次却未能如此。

（二）政策错误的影响及其危机——社会上及党内。

此次事变在社会上较有资产的人都模糊的知道CP勾结土匪而失掉其信仰。一般贫民则只知是土匪分粮而不知有CP。同志及农会会员因感觉到CP与土匪善无分别，并无解放民众之正确的出路，会趋于消极灰心。干民说××地方同志已有这种现象。这是你们的最大危机。

(三) 现在应注意的工作——

a、以东渠的名义发表一宣言，很普遍的发到群众中去。内容：民生的痛苦，坡里事件中土匪的趋势与群众应负的责任——所走的错路，鲁西战事之迫切及冯来之危险（对民众的欺骗与压迫）农民之出路——一直说到夺取政权。

b、坚决的退出——无论参加的同志能否出来，在政策上坚决的与坡里土匪脱离关系。

c、在各级党部及农会中将坡里事变中党的政策详加讨论。利用这个时机整顿及扩大党及农会组织，并确定同志对新政策的认识及扩大其在群众中的影响。

d、注意反KMT的工作——此次事变后。KMT定会趁〈机〉作进一步的反动宣传，同时，东昌KMT势力又非常之大，既能操纵当地政权，又与冯勾。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这项工作。主要的是使群众认识KMT是代表那些人的利益，切忌同他们打笔墨官司。

再：县委可暂时还设在××，可不迁移。

陈石甫

二月十号

中共山东省委 一月份工作综合报告(节录)

1928年2月8日

2、阳谷事件——十二月份报告中，已将东昌的情形详细叙述，并道及土匪首领韩某要求听我们的指挥。在当时我们即想利用他攻打坡里洋教堂，引起社会之不安，而趁此发动群众的暴动，后以受张宗昌的收买而离开我们。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竟又突然占领坡里，派人要求找人参加。东昌县委当即决定：（1）他们若能接受我们的杀豪绅焚地契分粮的主张，我们便参加，籍此以公开地作群众的煽动工作和宣传组织工作；（2）否则与之脱离。结果，分粮六次，每次到七八百人或千余人，但是处在被动的受赐的地位，杀豪绅三四人，但都是与土匪素有嫌隙者。到现在我们已与之脱离，原因便是因为他们连以上两种不彻底的工作也不做，而与豪绅开谈判与招兵买马听候招安或投冯。在此次事件中，最大的错误便是：（1）在与土匪合作的期间，我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发表，并未能充分地去发动群众，而只站在与土匪同样的地位，作悲慈事业。（2）一切工作完全委之党团，县委只在旁边发急，而不知自动地指挥同志向群众做工作，以致党团同志受了土匪的影响不接受党的指挥，竟与豪绅开起谈判来。现在土匪已招兵至六七百人，官兵急切难攻下，省委已指挥东昌县委趁此社会恐慌时候去领导群众斗争

了。此事我们虽作了不少的错误，但是一般破产农民，已经要下关东者，遇此竟延期，也可证明整个土地政策是合乎农民需要了。详情容后再报。其他方面无特别情形可报告。”

山东省委

2月8日

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

一、红团的过去

这个红团是在国共合作时候成立的，只望南军到来给我们谋利益，决不自己起来去干。至鲁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始知非自己去干不可，就开始与劣绅奋斗。虽是斗争的经过和结果不好，但是已得到民众的信仰。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民众的情形更加紧张，加以团外的拥护，所以就开始杀劣绅的走狗四人。在团团员不出官车，秘密不完粮，虽经官府屡次质问，决不相让，更得到民众的信仰。一般人渐知自己团体是有力量的。豪绅资产阶级勾结官府应付这个团体，就以败军将退，急谋敌防的名义来办城内保卫团总局，每亩地加洋二角，所招用的人全是他自己的狗腿土匪。于是全县民众大哗。我们团的群众尤其凶勇，直欲攻城与彼决一死战。其他红枪会皆欲联合抗敌。并在城西十里铺召集一小首领大会，我也参加。到会的人，有一百多，拿出我们办团的宗旨一演说，其他联庄会遂失信仰，只有愿意与我们合作。从此也就感着他们不敢办了。以上是仍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动作。后来遇着盐店盐巡到各村查私盐，各村贫农淋小盐的愤慨已极。我们团内就有些淋小盐的，就由团员捉住〈盐巡〉五人执行枪杀，并令盐店以粮食或钱赎死尸，至此始得一般贫民的信仰。鲁北改组特委后，红团即成立了总局，计划于最近成立谷官屯苏维埃。又于第四队村庄令其枪杀一村首事，

随即执行，并将其家产充公，粮食分给一般穷人。钱财充团局公费，更得到一般贫民坚决的信仰。又谋枪杀一土豪，因指挥不好被其逃脱，亦未执行团内决议政策。接续筹快枪，在本村筹得三支，到外村拿土豪，劫军队枪支，又因指挥人不好，未办到。在这工作期内，想入团的是很多的，并因豪绅资产阶级，恐怖我们已达极点，只因团内手续不好，不能领导一般民众群起开始斗争，这是过去的历史。

二、失败的经过

自杀了盐巡后，日夜放岗于村外。只因数日奔走疲乏稍解，在五月十五(三)日天明，岗已收回，敌人即袭击上来，从西北面攻击西坛口。因这个坛口人数多而勇敢，及总局别的坛口，具有快枪接住，在村外只有西北归路有人把守，别处有三十匹马队，飞奔呐喊放枪。团内群众以为是军队包围，不暇联合，三五成群纷纷向外冲出逃命。致使敌人在村内任意焚掠，枪杀十人，着伤二人，同志一人被杀，一人被伤，团友一人被杀，雇农一人被杀，其余俱是团员。别村闻变前来，死一人。在此事变发生以前，团内村庄已发生被袭两处。只因此夜风太大，传令未到，西北村十六人被掳去十四人。西村相距八里，早有风声，防守甚严，只相持半夜而已，并未怎样。大约所来人数有三百多，快枪百余支，县内马队三十匹，其余使快枪者多系土匪。其他二百人则是被压迫民众。再红枪者若能在发枪时集群众与之相持，一定不致失败，且有别村的援助。我们日夜所谋去的仇敌，得此机会何幸如之。只因我们平素的估计与事实相背，致遭此失败。不过

失败后，彼于三点后，即退出。我们团员遂即集齐，并到友军很多，未能遂即反攻，乘其不备，枪破弹尽之后，失此良机，幸掳去同志团员俱皆放。

三、失败的原因

（一）特委估计的错误。在特委会上计划布防区域时，竟以为西北敌人只能自守不能进攻，要能进攻时，只能联合城内保安队和驻防军队。几次侦探保安队情形时，认为决不会来，即来，就是亦只放手交枪。就是城内所驻军队，县长几次要求他们打，他们决不承认，况当前方军事不利，自谋脱逃不暇。后又添驻防军一团，我们疑其进攻我们，故特别注意东南方，令第三队放哨数里外，本村轮班在本村巡夜，把西北方置之不顾。

（二）农民不守纪律。农民本是整日作活惯了的，若引不起他们的革命情绪，他们是很难行动起来的。若是把他引起，他们就整日待动，三五成群聚谈不息，他们不知道不进攻即严加防守，他们以为防守是小胆，屡次告诉他们拂晓进攻是很厉害的，他们仍是夜间聚谈不息，晚岗一明即撤。因此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况敌人指挥都是军官土匪，这是农民受挫折一种通例。

（三）上下机关不能发生关系。在总局发生事件前，于半夜间已有二个村庄发生事，并无报告，西方传令，别的村听着亦未报告，实为此次失败之重要原因也。西北村十六人掳去十四人，余二人亦未赴局报告，这实是平素由于总局与各坛口未发生关系，并各坛口的关系不好。

(四) 消息不灵通。西北方敌人方面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在该村也未找出通气的来，不能不说是工作不好，该村虽是一姓，但是被压迫民众所受剥削更甚。只因其统治力量坚固，不能反抗。即各处想攻击的地方，皆不能有确实消息；并且内人听到消息，恐怕不确，不肯来报告，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原因。

(五) 本村阶级分化。在失败以前。曾有临清土豪运粮五大车。特委决议截留充作团用并分给一般贫民。致引起一般资产阶级反对。加以无产阶级的人认为是土匪行动。不甚合适。这皆由于旧礼教的束缚，顾全面子，未能执行。从此本村坛口因阶级关系日渐不融洽，不过不敢直接反对而已，故该日事变东坛口完全未动。

四、失败后群众的情绪及将来的希望

在敌人退却后，本团各队即付救应，观察各团员尚属勇敢，只因无快枪不能进攻，各队随即分配防地，以谋袭击，并到很多友军决议进攻方法，亦实无好的办法。但是民众终日盼望我们想办法，再听指挥，这是我在家时候的情绪。接续南军到来，宣传我是CP，并有赏格二千元，捉拿我。因此将友军的首领威吓着了。但是一般群众仍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对的。我在东昌住十二日，经徐同志的奔走接洽的结果，本团团员大都盼望我回去想一办法，因无人接续去干。且加本村在三四日后又被仇敌占据，纷纷往外逃出百余家。即在家者亦多老人女人小孩，东西大部分运往村外，有些积极要干的。所以据我个人主观的估计，能随着干的在二百多人以

上。如南军不能对付我们时，又有很多的友军参加行动，在最短期间，高唐就能变成赤色高唐，至能否占据，在所不计。统计起来，民众的情绪，干是要干的，因见南军的声势浩大，有点惧怕。不过他们来到催粮出车要草料拉夫，比奉军还坏，已失民众的信仰，一般人已知道他们不过是打革命的旗子，不过是自谋地盘而已。故是有希望，并加冯蒋冲突日甚，这是易于行动的要点。

五、失败后得到的教训和今后应注意之点

这回失败所得的教训有几条：

1、农民浪漫惯了不能守纪律，非失败给以打击，不知纪律的重要。

2、上下机关要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根据这次失败的经验，知道此次上下机关要有密切的关系，决不会失败。因为早知防备，不独不能失败，并且要得到胜利，致有天渊之别。

3、同志太少，不能起核心作用。又各队中有同志者很少，以致总局非独裁不可，如各队皆同志负责，各队皆能自行发起斗争而领导之，总局虽没尚能各自联络，以谋进行。现在我若不去恐不易平起，更不能得到友军的援助，这是有群众而没有同志去领导不能干起的一个教训。

4、这几次光顾执行政策，而忘了发展同志，这是很大的错误，即友军亦未打进去，真错误到万分了，特委不能不负责任，完全想不到。

5、使敌人太无地自容，只有拼命一战。我们的根基没

有树好，亦是不利。这次就是这样。在以前联合保安队尚不敢来，现在自己敢袭击，很是。明鉴

6、团员不易集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团员散于各地，集合太缓，给敌人以袭击之点，这也是今后应注意之点。加以农民又不守纪律。据我个人的意见非有人负责、日夜巡逻情形不可，往来不断，彼地发生事件，此地随即知道（下缺）非谋进攻以代防守不可。

7、农民是打胜不打败的，于此失败后，小资产阶级多半灰心。

8、农民始相信神心不足恃。在以前团员多系红枪会人，只信神力不知急谋武装。至此失败后，始知光红枪不足恃，非拿得武装不可，

今后尚有应注意者几点：

（一）应取游击战争方式，黑夜争战，将其财物令贫民自取。

（二）实行红色恐怖，威吓豪绅资产阶级的团体。

（三）召集团员全体大会，追悼死亡烈士，并抚恤之。友军亦参加。

（四）竭力谋干部人才，教农民能自己联络而领导之。

（五）多发侦探，以求消息灵道，顶好令儿童及妇女做之。

（六）宣传党军的劣迹，以打破其信仰。

以上金同志的报告文字上很多不妥处，今将原文抄上。希注意。

1928年

中共山东省委

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

报告（节录）

我们党在山东的农运工作，因为一，受了已往无动不暴的影响；二，党与各地党部的关系不密切，所以在第三次全执会时，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党部瓦解了（如东昌、德口，泰安），或者是与省委断绝了关系（如寿光、广饶、高密、莱阳、济宁、曹州等处）。所以在第三次全执会，选择可以行动的农民区域，只有高唐、潍县两处。第三次全执会，对于农民运动主要的意见是：

KMT初来山东，他所注意的还是几个重要的工商业的中心，乡村内尚非短时期内所能顾到。而旧的（即奉系的）势力又瓦解了；我们要抓住这一个机会，客观主观的形势较好的地方，积极进行乡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几个乡村割据的局面。

那未在这一个期间，在上所指定的两块地方执行这一工作的情形是怎样呢？请看：

第一，先说高唐。我们所以决定高唐为一重要区域，是因为那边有几百所谓红团的群众，在我们的指挥之下。这一部分群众，是从普通的民团分化出来的，所占的区域有二十

几个村庄。第三次全执会以前，他们就在那边干起来，已经有半年没纳粮税。县当局望着害怕，不敢去催缴。当时省委为指挥那边的工作起见，派了四个同志去，与那边红团负责同志成立了五个人中的一个特委。但因为特委的负责同志对于政治的观察与省委的不同，他们觉得KMT目前不能占领济南，就是占领济南，也不能渡河而北。于是他们的位置上，都是象经常的一样，并没有特别紧张起来。他们根本忘了这种工作一开始就是积极的进攻的，保守就是自取灭亡这个原则，所以特委成立了仅仅六天，就被反动派（豪绅地主的武装）包围消灭了。于是这个所谓农运要区，至此告了一段落。在这次工作中，我们所做的工作是：

- (1) 杀了六个盐巡，×个劣绅。
- (2) 没收×石粮食。
- (3) 发散了××份传单宣言，贴了××份标语。
- (4) 征收了×百红团团费。

他的影响是：

- (1) 周围七八十里都晓得该地穷人起事。
- (5) 一般人都知了红团是穷人的团体。

在失败中所受的损失：

- (1) 牺牲了一个很勇敢而能工作的同志一春。
- (5) 牺牲了两位农民同志×个团员。
- (3) 丧失了×枪支。

该处工作遭了失败后，省委曾同那边负责人共同讨论那边的工作。但是因为那边负责同志，对于群众的与群众武装的组织没有认识清楚，同时还存了报复的观念，及军事投机的倾向，去恢复那边的工作。至今那边的工作仍然没有头绪。

第二，再说潍县这一方面，（略）

1928年6月

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

鲁北特支：

关于鲁北工作，高唐古（谷）官屯事变之后，宗鲁、赞之两同志来济，省委已有所指示，最近竹溪及干民来省委，听了他们的报告之后，更有详细的指示告诉你们：

（一）对过去鲁北工作的批评。鲁北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塌台，这一个失败的原因，据你们的意见，只是技术上的准备不充分，所以一遇到敌人的打击，便无法存在。固然，这也是一种原因，但是除此而外还有几点是与此次“三月十五日”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的：

①特委对于政治的分析完全错误。山东省委全体执委会，对于山东目前的政治分析已指出KMT于很短的期间便有取得山东政权之可能。并决定鲁北的工作在张宗昌溃败，KMT还未来到山东之前的这一个很急促的期间，统治者的力量无力顾及乡村的时候，应立即发动并扩大农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更行开始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要利用这一个政治的转变，造成乡村中间斗争的基础，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甚而至于促成一个一乡或一县的割据的局面，这个工作完全是一个非常的。因此，省委即派于同志去组织特委。但特委成立后，关于政治的分析，完全与省委所指示的相反，认为KMT最近的将来决无取得山东的可能。特委即根据于这种分析，来布置鲁北的工作，在方式上完全偏重于保守，

只注意到怎样去布岗放哨，怎样保卫红团总部，而未计划着怎样去发动扩大农村斗争，并且根本忽略了敌人的力量。所以，结果我们不进攻，敌人也来袭击我们，“三月十五日”事变被敌人包围，因而红团的力量几乎瓦解，与我们的保守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

②没有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你们过去的工作，差不多完全只做些红团的工作，而红团在性质上又纯系军事上的东西，除去红团之外，便没有群众，红团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监督，假如“三月十五日”事变不发生，红团也会隔离群众而失败。

③忘掉了党的工作。在这一期间，鲁北简直抛开了党的工作，这也是很严重的错误。要知道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党的适当的领导，是要失败下去的。

④技术工作不好，如遇敌人消息隔离，无准备等。

以上几点，望严重注意为要！

（二）关于鲁北今后的工作，省委有以下的指示：

①原来的红团名义可不用，即行组织农协名义，号召雇农佃农及其他贫农及饥民等，以期发展广大的农民群众。但在组织的性质和方式上，都必须将以前军事性的组织改变过来，成为真正农民群众的组织。以村为组织单位，会员的吸收，男女老幼都可以，只要他能够直接在我们领导和影响之下的。这样我们才可吸收得更广大的群众，才不是单纯的武装组织。

②现在鲁北，在主观的力量和群众斗争的发展上，还没到马上夺取县政权，或割据一乡，目前的问题，我们尽力发动高唐一二十村过去在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艰苦地做小的斗争，以走入大斗争。我们更应利用各种大小的机会，提出

群众需要的实际的口号去发动农民的斗争，即如目前是收麦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农民麦荒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住时机，发动农村中广大的斗争，主要的口号是抢麦子、抗税、抗捐、抗粮、抗债，开豪绅地主的仓，把粮食分给没饭的民众吃，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来救济民食，杀豪绅地主等。

③在没有自发斗争的地方，采用农民游击战争的方法，三五个或十几个人一大队杀豪绅地主，焚烧其房屋，没收其财产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焚烧一切债券契约，缴夺地主枪支，以发动广大群众起来。这样一开始便是群众斗争，比游击队的方法更有意义。

④群众一经起来把豪绅地主杀了，即须立刻宣布分配土地，如果不重行分配土地，则封建的基础根本没有变动，一切行动都成了滑稽，而与土地革命无关，如果杀了地主，烧了房子而没有分配土地，那么，我们的行动便与流寇没有什么差别了。

⑤攻顾（谷）官屯，现非其时，因为我们主观的力量和群众都还没有一点基础，我们应在各村中尽力发动农民斗争去包围它，影响它。如果你们只是很有计划的去夺取敌人武装，那是可以的。

（三）鲁北党的组织应即改为特支，成立支执委主持工作。须负责于最近促县委成立。特支直属省委。

（四）省委已决调派一人去担任党的工作，不久即可起程。

省 委

1928年6月3日

文献资料摘抄三件

一、组织方面

山东这个期间的组织工作，主要的是扫除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奋斗的党的基础。为实现这个任务，具体计划如下：

(一) 派巡视员——鲁北、鲁南、东昌、胶东东部（潍县以东），胶东西部（寿光以西）五大区，每月省委须两次派员巡视。第一次巡视的任务，主要的是解释“八七”会议以后的各种决议案，及改组各地党部与清党。

(二)、(三)……

(四) 农村党的发展——鲁北、东昌、临沂、济宁、泰安、莱芜、曹州、胶县、高密、诸城等地为重要区域。除曹州、济宁、临沂无党的基础派专人负责发展外，其他各地党部亦派得力人员常驻工作。

(五)、(六)……

二、宣传方面

(一)……

(二) 对工农经常的政治煽动刊物——(1) 鲁北、东昌、胶县、高密、诸城、莱芜、泰安等地须各出一定期农民刊物：……。

(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17—218页1927年山东省委《山东工作计划》)

二

现时山东仅有青岛一市委。下列诸县有县委的组织，即东昌、鲁北、泰莱、潍县、寿光、淄博张、高密。青州前系县委，现改为特别区。

青岛市委工作不好，济南亦无多大工作。鲁南巡视员到各县解释“八七”会议并指挥暴动。鲁南的党现在已经清过一次。东昌亦有巡视员前去，党已经清过了一次，现在亦有暴动，并作红枪会的宣传。

阳谷：六月，农民曾自动地暴动过一次，现在亦有暴动，党命令全体同志参加，从暴动中来作清党运动。

（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31页1928年1月3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山东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三

东昌地区：属鲁西平原，是党的力量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一九二七年十月建立了以张干民为首的中共鲁西县委，领导几个县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初，曾在山东省委领导下，由地方党组织具体组织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农民暴动——阳谷坡里暴动，震动了整个鲁西广大地区。我曾代表省委去聊城了解过暴动的准备情况。

领导这次暴动的有王寅生（被张宗昌杀害）、赵以政（被国民党杀害）、聂子政（解放战争时病歿）等同志。王、

赵、聂三位同志都是山东党派往广东黄埔军校学习后，又回地方开展工作的。

我到东昌后，住在赵以政同志家里。赵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我与农民领袖韩建德（参与坡里暴动），在阳谷郭店屯附近的高粱地里见过面，谈过话。韩给我的印象不是传说中那样粗野，而是一位粗识文字，颇有头脑的农民领袖，谈话中考虑问题很细心。他对当地天主教堂剥削压迫农民有强烈的仇恨。

（摘自《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
27页。丁君羊：《第一次国共合作
前后山东党的组织状况》）

山东阳谷县坡里庄暴动的回忆

申 仲 铭

前 言

1927年(丁卯)末至1928年(戊辰)初,由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领导的地下共产党员,在阳谷县坡里庄天主教堂,发动和组织了一次武装暴动,声势浩大,震撼了鲁西北和华北平原。这次暴动历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1978年过济南,我和山东省政协几位老人谈及此事,他们要我为山东《文史资料选辑》供稿。这件事已过去了50余年,我始终是参与此事的,当时的战友除牺牲者外,现尚健在的党内同志不过寥寥数人,我是有责任写写这次事件经过的。因此,我联系几位老战友,尽可能对证材料,力求翔实。但大家都老了,记忆力衰退,难免有错误的地方;我也年过七旬,在写作时尝感力不从心,文中如有舛误之处,希望知者指正。

一、当时的革命形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共分裂。党内外一切革命群众,尤其是革命青年,无不义愤填

膺。南昌“八一”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号召，一些革命青年决心从头干起，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抓武装，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山东在武汉的革命青年，多要北返家乡，和国民党、北洋军阀进行斗争。以广东黄埔军校学生和武汉分校学生为主，都向党表示，马上回乡闹革命。我和鲁西籍的黄埔四期学生王寅生同志，当时曾与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同志面商过，表示我俩不去苏联留学，马上回乡组织武装起义。恩铭同志当时同意并转告其他有关同志。我们分头从上海、南京、河南……各自设法改装回鲁。后来听说从上海、南京北返的同志多遭国民党杀害。我是从河南开封经曹州（菏泽）步行回乡的。到1927年9月间，我和王寅生同志会了面，10月在鲁西北地区党的中心县委组织成立时，黄埔学生北返者，计有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等同志。山东省委派张干民同志为书记，加上聊城的省立二中、三师党团员同志二三十人，成立了鲁西县委代号叫“东昌县”。起初，机关设在傅家大院（聊城傅状元故居，即傅斯年的老宅。荒废不堪，仅有几间老屋和挂有“相府”牌匾的破大门一座。）还能开几十个人的小会；后来因为三师、二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干扰破坏，鲁西县委即移至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同志家。赵以政同志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常年收几个蒙童在家教四书，地点比较僻静，且有学童出入，便于遮人耳目，作为掩护。省委派丁君羊同志，常来传达文件，指导工作；我们负责向省委联系工作的是王寅生同志。组织建立后两个多月，我们就计划进行坡里暴动，并将基本武装（几十条枪，一二百人）组织成了；骨干成员是三师、二中的党团员，并在聊城、茌平、博平、平原、高唐、恩县、阳谷、莘县、朝城等地发展了些农

村青年团员，并联系了些愿意接近我们的“红枪会”首等，扩大群众影响，准备武装起义。

我们在起义之前，对当时华北特别是鲁西北的政治、军事形势，经常进行研究分析。那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军仍在继续叫嚷北伐，蒋介石、冯玉祥合作后，河南已归冯玉祥的西北军及杂牌军刘镇华管辖。冯的一部并已进入山东；北洋军阀皖系的陈调元也投靠了蒋介石；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直系联军，仍在和蒋介石的北伐军对峙；一些土著匪军，各霸一方，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当时我们认为利用这种复杂形势，可以组织武装起义。将来开展游击战争，虽无山岳湖泊的有利地形可资利用，但在这群“雄”四起，兵山匪海的纷扰中，加上各地蜂起的“红枪会”，我们可以运动自如，到一个相当时期，部队扩大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建立起工农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当时鲁西南有个土匪军头子名叫薛传峰，手下有两三千人（他吹说一万多），也冒充北伐军，要进驻鲁西北一带，独霸一方，闹得人心惶惶，聊城、阳谷一带颇为吃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在阳谷县坡里庄天主教堂举行了武装起义。

坡里庄位于聊城、阳谷交界处，北距聊城、南抵阳谷县城各有50多里。这个教堂，原由德国天主教士经营，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规模已很大，拥有良田千多亩，周围村庄多系教堂的佃户。教堂院墙高大，砖瓦楼房，十分坚固，其中饲养的牛、马、猪、羊无数，积粮如山，事实上是鲁西北唯一的大庄园主，经常雇用“护堂”打手数百人，有人估计，还藏有洋枪几百支（也有说千支不一），弹药也很多。庚子年间，有千多土匪围攻过这个教堂，始终未能入内。因此这个教堂又成了当地豪绅地主乱时避难的场

所，大小地主都巴结教堂，将教堂作为他们的靠山，教堂也就借此勾结反动官府、挑词架讼，无恶不作。一般贫苦农民受其剥削压迫，敢怒而不敢言，民愤极大。所以我们决定拿下这个教堂，放粮济贫，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心在这里起义。

二、怎样占领坡里庄教堂的

发起在坡里庄天主教堂起义的，应首推杨耕心（字一斋）同志，他作了很多工作，是他首先和农民起义领袖韩建德具体联系的。杨耕心同志是阳谷县西北九都杨庄人，原系聊城省立二中和山东大学附中学生，为人忠实诚朴，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怀有极大热忱。他和韩建德有点亲戚关系，因此联系上了。韩建德是阳谷县西北韩庄人，出身农民，他家因欠了本村地主韩某的钱，韩某强将他家一窝小猪赶走了。韩建德不服，涉讼多年，官府始终袒护地主，他愤而拉杆子为“匪”，专门打富济贫。他本人从不吸烟喝酒，尤其不近女色，在杆子中是罕见的。记得在坡里庄起义战斗中，有一士兵强拉一修女，意图无理。他得知大怒，立时将这人绑起，要枪毙，经人劝说求情，终于痛打这人一顿鞭子才罢。1927年，北伐革命起，华北大乱，韩建德决意率弟兄起义，但不知投奔谁好？适值本县有一个下野的北洋军阀旅长徐登朝在我乡拉队伍，韩盲目地就投奔了徐，做他的部下。在徐登朝部结识了徐的参谋长程宗岳（外省人），二人成了朋友。他二人对徐的作法，尤其是对徐的作风（徐有姨太太多人）深为不满。这时，杨一斋同志与他接上了关系。经杨一

斋同志对韩建德反复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韩听了很受教育，觉得很新鲜，很对脾胃，表示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像韩建德这样贫苦出身的人，又受过《水浒》故事的影响，一旦接近了党，自然而然地愿意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期间，杨一斋同志随时向聊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干民同志作了汇报，并由杨一斋同志陪同省委负责同志也接见了韩建德。对起义问题黄埔诸同学均甚赞同，经过深入工作，决定以坡里庄天主教堂为起义据点，随后韩建德又对进攻计划和兵力分配作了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动手。

1927年农历（丁卯）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正是旧俗“送灶”的日子，我从聊城骑毛驴回家，将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从道旁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着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旧历二十二）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了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在起义部队中工作。没有二话，我俩先到犁园王筱湖同志家。犁园离郭店屯一二里，离坡里庄不过八九里，地点适中，这时王筱湖同志家已成了党的联络站，王筱湖同志当时是党的得力的联络员。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王、杨二人另有任务离开教堂，各自去做党交给的工作去了。

我进入教堂，与韩建德和早已进入的聂子政同志见了面，凡是参加暴动的人，无论识与不识，都亲热异常，高兴得很。我是第一次见到韩，他是个细高挑身材，黄白净脸，眉清目秀，年约三十来岁，腮下略有点黄须。他戴一平顶灰毡软帽，身穿半旧灰长袄，平时不系腰带，也不带手枪，但

举止利落，一看就知是一个很矫健的人。他谈起话来慢条斯理，也很仔细稳重，不像是一个鲁笨人，这是出我意外的。另一位首领王朝聚，则截然不同，他浓眉阔目，身材魁伟，发言声如洪钟，干脆痛快。他身穿黑长袍，上套一件肥大的棉黑马褂，看起来年纪比韩略长（实际上比韩略小），但他经常叫韩建德二哥。老参谋长程宗岳，黄脸八字须，满脸烟气，他终日不离烟榻。后来我和他共事，发觉他思路清晰，且懂文字，他自己虽写不成文章，但善于出主意，修词炼句，几次和反动官府派来的代表谈判，和给反动官府的信札文稿，他出的主意不少，并共同作了修饰。还见到韩的一位得力卫士名唤杨万奎，年纪二十三、四岁，圆脸大眼，个子不大，但十分健壮结实。他两把匣枪不离身边，所谓“枪不离手、手不离枪”。韩建德出门，他总不离韩的身边，另一支匣枪据说是给韩建德随时备用的。另一个“红枪会”首曹万年，是一个道首，虽也有些小名气，但说话举止显得忙乱些。我要提一下引人注目的王朝聚，王是一个出名的九宫道首（阳谷县西北王泓村人），他虽是一个道首，但举止上看不到一点封建气息，说起话来，不是“瓦岗英雄”就是“梁山好汉”，在当时来说是很能鼓舞士气的。以上是我进入教堂看见一些人物的初步印像。当天晚上，一些骨干分子坐在一起，由聂子政同志提议：“要组织起来”，大家一致公推韩建德为司令，对外公开，总领一切，特别是有关军事作战的任务。总参谋长还是老参谋长程宗岳，其余各路支队司令、队长不计。经过大家公推党团员聂子政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孙大安同志为军事部主任；我被推选负责宣传，并兼作韩的机要秘书，指定我和韩在一个床上睡觉休息（当时工作很忙，不分白天和黑夜）。我们党团员都是在教堂内部工作，对

外不公开。尤其是我更要保密，因为我父亲申集盘先生是当时阳谷县民团团总，在外还带着阳谷民团跟着道尹、县长，假装着所谓“助剿”；一旦暴露我参加了暴动，在绿林军阀张宗昌当政时期，是会有灭门之祸的。

那天晚上，第一次骨干分子会议，大家都很高兴，当时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当公推司令时，王朝聚首先说：“推我们二哥韩建德当吧！他是我们的秦琼秦二哥呀！”不知谁插了一句话：“你呢？”他爽朗地答道：“我是程咬金，让我当个副的吧。”大家满堂哄笑、一致赞成。据说，王朝聚能号召“红枪会”几万人，他对这次起义，在外联系，出力很大。进入教堂后，每次出战，王朝聚督队，总是好带一把劈柴的大斧子。他胸怀坦白、快口直言，有时讲些英雄侠义的故事，激励大家，直到最后失败，他从不泄气。大家称他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大家喜爱他，我至今怀念他。（全国解放后，我于1980年秋，和聊城地、县委统战部同志，亲到他故里王泓村访问一次，始知在抗战初期，被汉奸丁某活埋死了）。

我进入教堂后，工作既忙而且紧张，无暇多问攻占教堂的详细情况，顺便和同事们谈起得知一二，大致情况是这样。腊月二十二日晚，韩建德集合了几十名弟兄，各带短枪，暗插衣内，扮做四乡教民去教堂作晚祷。当洋教士宣布开会祈祷时，韩等随众站起，几个壮汉突然抢上台去，亮出匣枪，先将洋教士绑了，宣布起义军占领了教堂！教堂内外大小门口、出口，早已派人把守，除洋人外，好百姓统统放出。接着搜查教堂，共捕有男女洋人（教士和修女）6人，一一上绑，禁闭起来。其次是搜查枪支弹药，结果大失所望，原来估计有千多支枪，实际不过几十支。我们进占教堂成功了，

这一下吓坏了官府和土豪劣绅，阳谷县及东临道（今聊城地区）的军警团队来攻打我们。这个春节热闹得很，轰动了鲁西北各县，远及省会济南及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等地。自前清以来历史上的许多“教案”，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官僚心目中余悸犹存，现又占领了教堂，绑了洋人，视为天大祸事，吓得他们惊惶失措，不知怎样才好。

三、起义军的政治措施

党派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人在起义军内工作。肩负着政治上的使命。孙大安同志是黄埔四期步兵科出身，使得一手好大枪，可惜到教堂内三天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他是莘县老宅庄人，坡里失败后南去，闽变后，在赴苏区工作途中，被匪杀害牺牲）。聂子政同志是黄埔四期政治科，聊城北周店人，身体很好，和我始终参加了起义，我俩朝夕相处，共同计议各项工作。在军事方面由韩建德负全责，大家热情很高，无庸顾虑。韩是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的，他的部下在起义过称中也表现得很好，毫无动摇现象，这方面我们也很放心。问题是我们怎样贯彻党的政治主张，具体的讲要做些什么工作来扩大起义成果，推动这次起义向前发展。

首先是发布告，来阐明我们的政治主张，记得是叫作“告民众书”（至于文字形式上究竟叫什么？现在记不准了）。老百姓则是照“义和团”、“红枪会”起事的惯例，多叫它为“揭帖”。我们用墨笔抄写了几十份，张贴在四乡通行大道上，自然轰动一时。反动的北洋官僚东临道尹陆春元，下令撕掉，并贴上他用东临道尹名义石印的大告示。我

们派人揭下来拿到教堂，内容是四六排句，工整得很，朱笔勾圈，加盖官印，自然比我们“揭帖”阔气多了。我还记得内有“查有赤化党徒，蛊惑人心倡乱”等词。我们出的第一张布告，是由我和子政同志及参谋长程宗岳，还有那位南方师爷共同起草的。大意有以下几点：（1）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下，兵匪遍野，骚扰地方，民不聊生；（2）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挑词架讼，倚势欺人，苛捐杂税，重利盘剥，贫苦人民不得活命（3）兵匪骚乱，拉夫、抓丁、出大车、抬担架、大军过境，要粮、要钱，送水送饭，甚至霸占民房，侮辱妇女。号召贫苦大众，要一致奋起反抗，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洋奴、卖国贼及他们的一切奴才走狗；（4）废除苛捐杂税、高租高息，减轻人民负担；（5）最后提到要建立民选的县政府，开放民权，使人民有真正的发言权，监督权等，我记得在序言上，为了通俗易懂，便于人民的普遍接受，还夹杂一些“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话。其实“替天行道”这个大字，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决不是《水浒》上的“替天行道”。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还不能公开打出共产党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这个牌子。因为我们那时考虑到“八一”起义后，接着广州起义失败了，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中。在华北大平原上，搞武装起义，一无山岳湖沼的地势可资利用，更无中央红军的领导，特别是我们地方党创建不久，而我们又都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经验缺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也不够，农民群众觉悟水平还不高，尤其对什么是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对他们来说是费解的，仓促提出来，会把群众吓跑，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洋学生弄得什么洋东西，不会为群众所接受。解放后，我曾和同志们谈起此事，关于

这一点，有人认为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太低，水平不高，这种批评可能是对的。

其次，我们决定在教堂开仓放粮。一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号召大家跟我们闹革命；二是表明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要以实际行动，让群众看看我们是真革命，来扩大我们军事上政治上的影响。农民是最讲实际，这一行动，广大群众非常拥护，教堂内外，一致拍手称快，四乡群众欢欣鼓舞。同时，这也引起了反动官僚陆春元的注意，他认为这决不是一般土匪闹事，而是“赤党倡乱”了。

教堂里存粮很多，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不知有几千或上万担，确数难以估计。我们将粮食用麻袋及小车运到打谷场上，鸣锣叫喊“开仓放粮”，不拘多少自带袋子或筐篓来领。头一天，来领粮的群众不多，一天只放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来得人渐多，第三天甚至拥挤起来，非常热闹。我们为照应此事，派了四、五十人经管发放，另外还派了一小队武装士兵，在场内外警戒。并由聂子政同志组织宣传员若干人，在放粮场内作口头宣讲，有的热血青年当场报名参军，效果很好。放了几百石粮食以后，我们正要继续进行，到第五、第六天，来的群众忽然减少，竟至绝迹。原来是东临道尹陆春元，对我们开仓放粮大为惊怒，赶紧调兵遣将，他调动东临道29县的军警团队攻打教堂。断绝了教堂内外交通，四周封锁，农民进不来，放粮不得不停止。于是我们就同反动军警展开了20多天的攻守激战。

四、边打边谈

我们占领教堂是智取而不是强攻，已如上述。教堂被攻

占的头二天，四方震动，官方不明真相，只觉得绑了洋人，非同小可，一时惊慌，不知所措。阳谷县知事张某，是个鸦片烟鬼，平时就多病，现在他管辖地区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加上又受了他顶头上司陆春元的斥责，一时惊慌，上马不慎，摔死在地。头几天，教堂里陆续进来了几百人，多数是杆子上的，我们鸣锣打鼓，虚张声势，号称一万，外人也多不知底细。陆春元频繁调军，又勒令各县民团助战，驻满了教堂四外村庄，将教堂团团围住，估计不下千人。过了春节，从旧历初四、五起，陆春元就开始进攻。

各县民团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由于民团中成份不一，领导层政治倾向不同，加上和教堂内起义人员的关系也各不一样，顶多起个助威作用。官方进攻教堂打前锋的，自然是阳谷县的警察大队，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有一天傍晚，警察大队冲到教堂寨边，来势颇凶，可是经起义军由教堂内突然出击，将他们拦腰截断，首尾夹击，一战而将该大队大队长某某生擒，押至教堂。起义军首战告捷，大家热烈欢呼；县队和民团闻风丧胆，便不敢靠近教堂了。

起义军首战告捷，陆春元和地方上所谓耆老绅士商议，拟以官禄作诱饵，找人游说讲和，提出所谓“收编”。于是就发生了一场笑剧，也是一个带有滑稽性的惨局。当地有个著名的青皮名叫盛思本，这人能说会道，平日跑江湖，官私广交，认识一些匪首，说票，架案什么都干。他自报奋勇，对官方说他和韩建德有旧，是好朋友，保能说他归降。有一天下午，盛思本提着点心，果匣和几条上好香烟，直奔教堂要见韩建德。事也凑巧，韩建德正在寨外道口查岗，被盛思本看见，赶忙上前，亲热地向韩说：“兄弟，难得见，我来迟了。”接着手捧果匣和香烟，说：“小意思，先‘上个

面，（黑话，赏脸的意思）吧！”韩建德为了洗刷罪名，这时他最嫌恶人说匪语黑话。盛思本此来奉命谈收编，是韩意料到的，盛的黑话更触起他的怒火，没有答话，一枪就把盛打死在道旁。能说会道的盛思本，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使命。

陆春元和一些绅士们，以为盛思本不应该把土匪说票的那一套来对待坡里暴动的韩建德，这是咎由自取。陆春元等人又商议，要另请一位负有重望的人去讲和，于是公推阳谷县教育界前辈訾兰斋先生（訾山东省优级师范毕业，济南正道中学和聊城省立二中的学监和教师）作为地方公众的总代表，率领一些谈判代表亲往坡里教堂讲和。他带有官方收编方案，但他此行主要目的，以只要不打就好，訾先生一片慈悲之心，也算是好心肠吧！先通知了韩建德他来讲和，我们是他的学生，都知道訾兰斋是位好好先生，在地方上确有多乡望，是不能和盛思本一样看待的。訾兰斋来时，韩建德亲自率队欢迎，并荷枪实弹，以示威武，这也是给敌人瞧的，在形式上，尽量做到有礼貌些。我们认为，“收编”是谈不上的，我们要借此机会公开我们的政治主张，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怎样谈法？事先已与韩建德商议好，我们是不便出面的。訾兰斋到后，由韩建德接待，王朝聚坐陪，杨万奎随侍在侧，在一张桌前大家落座，很像个样子。我从楼上窗前，曾望见訾等进教堂，看到武装列队欢迎的情景，訾兰斋显得有些紧张。他们离开时，韩又列队欢送，訾兰斋走时面带笑容，好像很满意，我就料到这场戏演的还不错。什么“和谈”、“收编”，狗屁！会上始终是韩建德在讲话，他声达户外，大骂阳谷县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王朝聚也加上一些话。訾兰斋本来口吃，是不能多讲话的老实人，官方嘱托

他的收编方案和价码，这时也拿不出来了。可是群众的呼声和起义军的声势，给警等上了一课，事后警常对人说：“坡里这杆人不简单，非同小可！”我和程宗岳在事前还准备了一篇公函，其中历举县政败坏，贪污腐化，苛捐杂税，土劣横行，重租高利，民不聊生，并指名道姓举出实例，要求清除罢免。还要求立即实行民选县长，改革县政等等。这些起码的政治要求，明知是办不到，但可以起到政治宣传作用，以表示我们是革命，至于什么“赤化”，“赤党”我们则只字不提，也不屑一辩。这个公函长达五千字，由韩建德面交警先生，他微笑而恭谨地接在手中，似乎满意地回去了。元宵节后，陆春元见收编不成，教案不能解决，加之张宗昌督责，他就请求派遣正规军相助，决定武力进剿。节后一两天，张宗昌派来装备有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的邢旅，来到阳谷。形势一天一天紧张起来，大战一触即发，空气反而更觉沉寂起来。

五、大风夜中撤出，北上打游击

这个元宵节，过得很好，因为教堂有白面、有猪肉、白菜、大葱，千多人吃不了。由于韩建德的作风好，大家从不闹酒；弟兄们有个大小病痛，教堂内还有医生给医治。这寨子就是个独立王国。但从军事形势上看，这种好景难以维持下去，教堂这个孤立的据点，被围已20多天。所谓南军北进，毫无动静，大杆子头薛传峰的匪军，声称要北上，实际仍在曹、濮及豫北滑县一带，尚无北进模样。我们虽也借用过南军的旗号，但我们是革命军与他们是合不在一起。至于薛传峰这样的匪军，我们也不能与他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张

宗昌的邢旅来聊城，增强了陆春元的力量，进剿势在必行，何况我们绑了洋人，他职责所在，岂能放过我们？我们也就拿这几个洋人作人质，使他有所顾忌，但决战的局面是定了的。衡量了这一形势，我们人少势弱，孤立无援，教堂虽说坚固，也难以持久。王朝聚、曹万年联系的“红枪会”，最初零星进来些，以后一个人也进不来了，同时“红枪会”成员都是些农民，已经加入我们行列中的，也不免思想动摇，急于想回家种地。因此，根据我们早已拟定的决策，准备拉出去打游击，不能坐以待毙。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再乘机发展。

这里我还要补叙一下杨耕心同志的任务，原派定他是在外面争取收缴地方枪支，扩大我们的政治军事影响。这位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在大年三十夜发动村内外若干贫苦农民，准备收缴他本庄九都杨庄地主富农的枪支。杨耕心同志的计划，被他父亲杨兰亭也是我们小学的老师发觉，立即将耕心同志禁闭起来，不许他出门一步，认为这是给本庄惹祸招灾，要当逆了办他。此计失败，影响很大，从此地方上大小寨子，都对我们警惕起来。耕心同志不得自由，也使我们失去一个好臂膀。

元宵节后，官兵进逼步步加紧，四、五天后，邢旅进驻东南一个小村子，不时以大炮、机枪向教堂射击，有时一天连续进攻数次，弟兄们伤亡日见增多。我曾到寨墙观察，一颗炮弹从头顶飞过，轰然一声就炸毁了垛口。又有一天上午，炮弹击中了我们议事楼上的墙壁，炸开几条大裂缝，幸未伤人。这一切固然吓不倒我们，但死守下去已无意义。在一个大风天夜晚，黄沙漫天，对面看不见人，从白天刮到黄昏，一直未停，那位南方师爷特地跑来和程宗岳、韩建德、王朝聚还有我说：“我占了一卦，今天撤出大吉。”我们这些人

都是不迷信的，微笑着没有出声，不过，在这大风夜撤出倒是个好时机。我们撤出决心已定，只待韩建德下令了。王朝聚口快，说道：“当年瓦岗寨也有这一着，我这个程咬金也坐不了几天，拉出去就拉出去吧！先拉到大名府，那儿我还有不少杆子枪。”参谋长程宗岳从他烟铺上立起，手里拿着烟枪用力一挥说：“今晚从塞北撤出去！”可惜这个日子，我再想不起来了，在寨内紧张了若干天，当时即无历书也无月份牌，谁还记得日子呢？接公历说大致应在1928年2月上旬。

教堂的地势，是东、南、西三方都有小村子，靠近教堂，北面是一片平川没有村落。敌人不敢从北面攻击我们，总是从东南方凭借村落民房的掩护，一步一步地进逼我们。起先，我们还能出寨迎击或追击，后来官军逼进，不得不转攻为守。我们为了安全撤出，作了这样的部署：首先把一切人马装备好，将洋人绑在马上，老弱由人领着，前边派出得力尖兵，稳步前进。另派一部较强的战斗队伍，乘黑夜出寨，向东南方向出击，喊声要大、枪声要紧，同时还准备了几只洋铁桶，放上鞭炮，燃着乒乒作响，与敌人机枪声，混在一起，表示我们在大举反攻。平时，敌人是白天进攻，晚上很少进犯。这次我们发动佯攻，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们全部撤走。敌人是雇佣兵，仅寥寥还击几枪，知道我们是无力大举进攻他们的，我们就在这佯攻的掩护下，大队人马从寨北撤走了。临撤时除了将洋人带走外，韩建德下令把俘虏的那个阳谷县警察大队长枪毙了。

这一夜向西北加紧急行，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县境。在途中，韩建德下马拉着我和聂子政同志说：“看来我们要长期打游击了。”他又笑着说：“你俩是不惯‘拉杆

子”的(这是他仅有的一句黑话),跟着我们都不方便,起不到多大作用,你们回去,先向聊城党机关作个报告,看下一步怎么办?”他又特别望着我说:“回去见了老伯(指我父亲),还是要照应我们,不要迫打我们就行。”我们紧紧握手,互道保重作别,我和子政同志趁夜折回,认不出大路小路,盲目地往东回走。一路上,放哨的团丁,听见狗叫,不时打枪,赶至天明,到了堂邑。这时堂邑县城,死气沉沉,什么东西也没有卖的,我们找到二中同学常尧卿家,吃了一顿早饭,中午转到聊城。聊城也是一片死寂,到姚家园子去找赵以政同志,一家都搬空了。我俩一时找不到党的机关,就各自回家休息,等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再作打算。

我回家后,村中老少也陆续“避难”回来。经过坡里大战,父亲也回到家。对我说:“陆春元亲自问我,外边传言你有个少爷在教堂里?我说:他干南军不假,去年(1926年冬)我在天津,他坐轮船从天津去上海,在吴淞口外大海里触礁沉没,早已淹死了。陆春元没再说什么,看来也是诈问,我有千把团队,他也不便对我太过不去的。”坡里暴动,吓坏了我一家人,连村子里的人都跑了,传说官军要洗烧我们村子,也累得父亲吐了几口血。父亲给我改了名字,命我即刻离家,先在四乡亲友处暂避,

不久,同志们传来党组织的通知,凡是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各自离开原地。于是杨耕心和我,趁春天大批山东难民出关外谋生的机会,一道出关。解放后,才知道张干民同志也离开山东去关外了。聂子政、孙大安不知去向。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坚持机关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鲁西剿匪司令陈以绅(谐音)捕去,壮烈牺牲。王寅生同志在坡里暴动前夕,奉山东省委调令,去济南作工运工作,在1928年济南

“五三”惨案前，张宗昌临撤退时，被张宗昌捕去，因在他身上搜得手枪，认为他是赤党分子，因而被害，

韩建德率队从教堂北撤，到达大名一带，当时直隶（今河北）督办褚玉璞，接到张宗昌电报，对韩建德进行双方夹击，韩建德部被打垮，抢去了洋人。洋人回到教堂，勾通反动官府，在阳谷大捕“赤化党”和所谓坡里“匪徒”。有个教民流氓分子名叫刘二安，一向是洋人的狗腿子，他领门指户，大肆抓捕了一些好百姓，因而倾家荡产者不少，闹得人心惶惶，闾里不安；而真正共产党人，却一个也没有捉到。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在鲁西北却撒遍了红色种子。多少年来，始终为鲁西北群众所称颂。我现在依然十分想念当时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们！十分缅怀先烈们的高风亮节！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次的革命义举！

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回忆

张 干 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从反革命屠刀下的血泊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斗争，号召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山东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决定在全省重要地区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村积极建立农民协会，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聊城是东临道尹公署所在地，是鲁西政治文化中心，因此省委把聊城看作工作的重点，要求及时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开展起来。

聊城虽是鲁西重镇，但地薄民穷，连年灾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夺。且有奉系军阀张宗昌的一个旅盘踞聊城，镇压人民群众，造成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人民的心中都埋藏着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怒火。当时这里有两处中等学校——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和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学校当局虽是保守人物但由于受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潮流的影响，一些进步青年学生产生了革命思想，如二中的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等，为了从事革命活动，毅然到南方参加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们都是下级军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分别从广州、武汉返回，经与山东省委联系回到聊城一带开展工作并发展了

几名党员。山东省委为了发展鲁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于1927年10月初，讨论决定以聊城为基地成立鲁西县委，任命我为鲁西县委书记（大革命时，我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分配我回山东搞地下工农运动。1927年8月，我回到山东济南，任山东省团委秘书长）并指定赵以政、聂子政、袁果等为县委委员，当时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同志也在鲁西县委工作，后来又增补宋占一同志为县委委员。当时，省委对聊城工作的指示是，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扩大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迎接全国革命高潮。

1927年10月，我带着省委交给的任务，赶赴聊城。那时，我是个20岁的青年，身穿一件蓝布长夹袍，打扮象一个小店员，用旧白布包袱包着两卷宣传品（中央告全国人民书等），上面盖着一件衬衣，还有8斤大厚锅饼。满怀信心地向聊城走去。途经黄河渡口，有两名张宗昌的大兵持枪检查渡船行人的物品，倘若被大兵发现包袱内的宣传品，免不掉要受到麻烦。当时真有点担心。但只有这一个渡口，冒险也得闯过去。那时，我身上带有20元的工作费和生活费，我想，万一那两个大兵真的找麻烦，可以用钱贿赂他一下，开始我从腰里掏出5元钱，又想5元钱不一定打动他俩人的心，狠了狠心又拿出5元钱，必要时可递给他俩买壶酒喝。我把钱拿在手，登上船，把包袱一扔，大着胆子招呼：“老总，看看我这个……”其实那两个大兵主要是检查行人走私，借机捞一把，而且他们不识字。其中一个兵，打开我的包袱一看，见是大锅饼，还有印字的白纸，别无其他，用脚一踢就完事了。这唯一的难关，就顺利地过去了。

到聊城后，由二中申和生同学带我到姚家园子，见到了

赵以政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赵以政同志的父亲赵子芳老先生，有点旧学问，在自己家设私塾授教，也是治家的能手，但不谈国事。赵以政从南方回来，他就感到紧张担心，怕被官府发现受连累，常嘱咐以政别常出去。这次我到他家，老人家感到惊疑，偷偷把以政找出去，追问我的来历。以政编了一番话安慰他父亲。老人总不放心，嘱咐以政：“叫这位同学住两天就走吧！”当晚，我住在赵家书房内，第二天下午，王寅生、聂子政两同志都来了，见到我，又看到省委的介绍信，高兴地跳起来，都说：“可盼来了，这就有办法了。”聂子政攥着拳头，咬着牙说：“我们有决心把地主豪绅们打垮，把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打倒！”以前王、聂两人常到赵家来和以政商谈事情，赵老先生知道他俩和以政有密议的事，这次他俩又来了，和我见面就熟，知道我们是一伙的，他坐卧不安，嘱咐以政：“千万别闹出事来，这关系咱全家的性命。”晚饭后，我们四个人走进书房里，围着一盏小煤油灯，讨论了省委的指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根据聊城的实际情况，几个同志分片负责：聊城南乡和邻县阳谷为一片。由王寅生、申兰生两同志负责；聊城北为一片，由聂子政同志负责；博平为一片，由袁果同志负责，赵以政同志协助；东平县及聊城城内，由我和赵以政同志负责，（东平县还有一位同志负责东平的工作，这个同志的名字记不清了。）临清县（住尖庄赵圈）由赵儒昌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士兵工作以王寅生同志为主，聂子政、赵以政两同志协助。对县委工作我们作了初步安排，一夜未眠。赵老先生怕出意外，给我们作了一夜的暗中警戒。第三天，袁果来了，袁果是个20岁的青年农民，很精明，也有些顽皮。王寅生同志乘落地问他：“你从家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袁果笑着

回答：“我想把地主的耳朵割几个米给你下酒喝。”赵以政把我介绍给他，他非常高兴。我随便向他打听了一些情况，袁说：“农民真苦，干一年吃不上穿不上，官家还派这个捐，那样税，小鸡下个蛋也得送给他们吃。种地主的地，不管打粮不打粮，也得到时交租。平时，地户还得给地主干零活，连地户家的妇女也得给地主家洗衣服，做针线。现在到冬天了，穷人连过冬的棉衣也混不上，有的穷人家五六口人只有两床破旧被。有的家打发小孩子偷偷到外地讨饭，还怕人笑话。也有人想到关外逃荒。我时常向他们宣传斗争，宣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地主就不敢欺压穷人。看样子他们心里倒乐意，但谁也不敢干，谁也豁不出来。这些天和我靠近的只有十几个人，发展了几个党员，几个农会会员，多数人不敢向我靠近，我去串门，他们好象怕神怕鬼似的。人穷是心要革命，就是怕事不敢干。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办法也少，工作搞不起来真着急。这回你来了，带来了省委的指示，这可好了，你去我们那里看看，给我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我能一心一意地去干，我是共产党员，能豁出来，什么也不怕……。”简单的交谈，了解了农村一般情况。然后我们五个人坐下来，宣布了省委关于成立鲁西县委的决定，五人一致同意，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鲁西县委。（时间约是10月16日或17日，成立后报省委备案。）接着就召开了县委会。首先分了工，按照省委决定，我任县委书记，赵以政担任组织工作，王寅生担任宣传工作，聂子政担任军事工作，袁果担任农运和青年工作。我们还通过了昨晚研究的工作计划，着重研究了开展农民运动问题。会后各自分头去工作。

鲁西县委的主要任务，在农村是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组

织农民协会，斗垮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权，建立以贫雇农为主的乡村政权——即乡村苏维埃，在斗争中以贫雇农为领导，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最主要的目标是开始建立小型的农民政权，继续扩大村连村，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以聊城三师、二中为主，团结进步学生，发展党团组织，成立读书会，学生会，大力宣传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争取学生、教工人员相信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散传单，张贴标语，大造舆论，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军队中，一是开展士兵活动，在士兵中发展组织，夺取武装。一是组织军队哗变。

县委机关开始设在赵以政同志家，因为以政父亲怕事，我们住了十几天后，即迁到北门里傅老九家。老九是共产党员，他是清朝宰相的后裔，外人都称他“九爷”，他和祖母两人住三间房，还有小套院，县委住一头，倒很方便，从此后它即为县委的正式机关了。在这个机关里开过多次会议，印发过多份宣传文件，接待同志来访。因当时的情况复杂，县委几个人常常开碰头会，有时也开县委会，研究的问题大半是如何发展农会组织和斗豪绅、斗地主、斗县吏、税腿子，以及宣传内容等问题，还开过两次县委扩大会，第一次，研究对标榜杀富济贫的韩建德可否拉他一下干革命，第二次关于坡里暴动，研究如何组织农民，如何组织行动，参加人员有杨耕心、申兰生、申和生等。在接待来访中，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师范的学生张廷焕。他突然闯进屋内，自我介绍，要求和我谈话。这个陌生人突然进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自称是国民党员，看到国民党陈腐守旧，讲帮派，排除异己，不是要革命，是搞政治投机，下决心要脱离国民党，参

加共产党来革命。他见我不大相信，随从腰中取出国民党的机密文件交给我，以表诚意。我看他有点可信，随告知他多谈几次，他很高兴。以后隔两天就来谈，每次都带着国民党的文件叫我看。我从侧面了解张廷焕是贫苦家庭出身，学习不错，第三师范出的校刊，每期都有他写的小品文。由于学术争论，他和国民党一些主要人意见不同，也看不惯国民党那种勾心斗角的丑事，因而决心脱离国民党。他了解共产党是革命的，决心加入共产党。这个同志后来成为骨干，担任省、县交通，无论有何风险，他都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由于几个同志分头工作的努力，各点都发展了党员，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当时党员约有四五十名，农会会员约有200名左右；建立支部的有安乐镇、阳谷、聊城城北周家店、第三师范、第二中学，还有博平的两个支部。各支部都有斗争活动，如农民向地主借粮（实际是硬要粮），和下乡催捐的税腿子吵咀打架等。11月中旬前后，我去袁家楼、安乐镇、东平等地检查工作情况，发现党员、农会会员的精神面貌和袁果同志初次与我谈话时所谈的情况有了变化，也懂得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有的农会员说：“地主怕人多起哄，过去向地主借一斤粮也不肯借给，我们多去人向他硬借，也借给了。以后还得向地主来硬的。”有的会员说：“税腿子、县衙役，象狗一样，你怕他，他就向你大叫，你要拿起棒子来，他就夹着尾巴跑了。”农民增强了同地主斗争的勇气，是一种好现象。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县委及时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提出要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高利贷和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对房屋破漏的穷苦农民，发动他们到地主家借房过冬。同时要求各地都要开展群众性运动提高群众的觉悟，长农民的志气，灭地主豪绅的威

风，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暴动，夺取地主的家园寺堂、公所，成立农村小型农民政权。县委这次工作安排，得到省委的赞同。这时三师学生也掀起了反对学校当局讲经尊孔的斗争和与国民党的组织争取青年群众的斗争，开展了“国民党是革命的，还是共产党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彻底革命的，还是共产主义是彻底革命的”辩论。当时，学生中有了分化，但向我们靠拢的还是少数。我们不断散发传单贴标语，敌人知道聊城有了共产党，因此有了警戒。我们曾设法到驻军中做工作，但一直未插进去。王寅生、聂子政两同志还提出过夺取城门站岗兵的枪，然后进入警卫班内，乘夜间熟睡时，对之全部缴械的办法夺取武器（我们当时仅有一支匣枪）。但考虑驻军夜间有巡逻队，我们夺取武器后，也无站脚之地。如果失败，工作定要受损失，不好冒险，经县委研究，就推迟了。实际上当时同志们夺取武器准备暴动的心情，是急切的。大家恨不得一下子抓到武器，夺取政权，争取全国革命早日得到胜利。

北门里傅宅是个孤零的小套院，以往傅老九和他祖母两人住在这里，来人少，县委设在这里，常有同志来谈工作，有时还召开几个人或十来人的会议，常有人出入，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有一次警察来问情况，傅老九随便应付了几句，警察也不敢多咀（傅老九是聊城世家的少爷，当时名人傅斯年是他的侄子，有一定社会影响，警察对他也是高看），但聊城三师的国民党那些坏蛋，常悄悄地来侦探我们的动静。如果他们向官府告密，我们也要吃亏。有一次，我去三师女子部找申梅贞同学了解情况，在会客室谈话。正好有临清小学时的两位同学，从室外看见我，笑着向我招手，我出去和她俩寒暄了两句，她俩顺便说：“有人说你在北门里住着，想

害你，咱们是旧同学，你还是躲躲好。”我一听，知道是那些国民党坏蛋造舆论，便心生一计，借两个同学传信向国民党反击一下，我严肃地说：“他们想整我，说不定哪天我还想要他们两条狗命呢！”从两位同学的谈话中，得知坏蛋们想对我们打主意，看来在傅家住下去不合适了。王寅生、赵以政我们商议避开这个地方，以政同志提议，干脆再搬回他家里。我们认为以政家的宅院地处城郊，又有学童出入。好遮人耳目，他父亲虽然胆小怕事，但也不会坏我们的事，以政又是家中长子，能当半个家，我们再多做些老人的工作，问题也就不大了。我们决定在赵宅住下来。隔了两天，我们卷起行李，连同油印机拉到赵家，赵老先生由于儿子关系，无可奈何地收拾出书房的里屋，正式交给我们使用，我们住下来后，赵老先生的思想逐渐有了变化，他看我们不求名利，昼夜忙碌，也有些同情，平素照顾吃喝，有时我外出几天回来，他还吩咐家人给做些好吃的。以政的爱人经常给我们送饭吃、送水喝，我们都很感激。

1928年初，农村工作逐渐活跃。农民协会，时有斗争。聊城西南乡坡里（属阳谷县）有一处外国人建的天主教堂，建有楼房，砖瓦房，并筑有坚固的围墙，其规模好似一座小城。里面住有几名洋人（据说是德国人），还有几十支快枪，雇有打手保卫教堂。这教堂霸占了几千亩土地，分租给本教的佃户种，收入很多。这些洋人及其走卒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官府，在当地作威作福，俨然是农村的“小王朝”。附近豪绅地主也为虎作伥，做洋人帮凶，欺压百姓，因而那一带农民对之痛恨极深。在教堂附近，我们建立了农民协会，由于党员宣传教育，农民自动提出来“打倒洋人”，“捣毁教堂”的要求。县委根据当地的情况研究决定在坡

里教堂组织暴动。适巧当地有一帮潜伏的武装，在那一带活动。标榜杀富济贫，领头人是韩建德。韩原是农民，是被逼上梁山的。韩与杨一斋（耕心）同志有亲戚关系。赵以政同志通过杨一斋把韩找到县委，动员其走正道，参加革命，韩同意了。以后县委派聂子政同志到韩的武装队伍里做政治工作。当地我们的农会会员有五六十人，认为可以和韩建德联合起来举行暴动，占领教堂。这个计划报告了省委。省委同意并指示一定要做好暴动计划，成功后要大力发动群众，进一步准备进攻聊城。县委下定了在坡里暴动的决心，同时指示博平也要积极准备，配合坡里暴动，然后联合起来围攻聊城。对坡里暴动的具体计划是先进入教堂，夺取枪支，开仓分粮，同时发动群众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扩大斗争面，建立工农政权。暴动时间原定腊月三十日（农历属 1927 年），乘教堂、地主闹春节联欢不防备之际，我们一举打进教堂。但韩建德一伙性急，硬要提前下手，聂子政劝说不听，不得已只好组织了农会会员和韩建德一起提前进攻教堂，先缴了教堂的枪支，把洋人关起来。进攻教堂时，农民都拿着扎枪，本打算进入教堂弄几条快枪把农民武装起来，但农民平素没有使用快枪的习惯，没有积极去抢快枪，结果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第二天申兰生同志、杨一斋同志也进入教堂，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穷人。这时地主豪绅吃了惊，有的跑去聊城报警。县委闻讯后，我和王寅生同志连夜赶到坡里教堂，这已是暴动的第三天了。走到教堂大门，站岗人看我来路不明，开口就说：“把他俩吊起来！”后经聂子政同志出来，才把我俩接进去。我们听取了情况，当即提出发动群众向地主开展斗争，缴粮缴财物分给农民，坚决缴收地主的枪支，武装农民，为了建立组织，统一领导，决定把韩建德

的人和农会会员一同编起来成立一个团，以韩建德为团长，聂子政同志为政治委员。占领教堂后，聂子政同志提出用革命名义贴出布告，号召群众参加斗争。韩建德一伙却想用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宗旨和群众见面，当时争执未决。我们去后，经过工作，达成了协议，写了布告贴出去。内容主要是：列举了坡里教堂洋人恶霸行径，以及勾结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罪行，要求群众起来摧毁这座“小王朝”，打倒地主豪绅恶霸，树起穷人的大旗，建立穷人的天下。同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为了及时发动博平的暴动，我和王寅生两人住了一天半，就赶回聊城，当即印发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告人民书”。王寅生同志赶去博平会同袁果组织暴动。在我和寅生同志回聊城的第三天，反动官僚陆春元即率队围攻坡里教堂。初战我们大胜。此后，陆春元要求军阀张宗昌支援，张派来邢旅助剿，大举围攻。我暴动人员由于寡不敌众，遂于元霄后撤出，转移到冠县、大名一带打游击，坡里暴动到此结束。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暴动给聊城一带留下的革命影响是很大的。

坡里暴动失败后，县委重新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必须进一步建立群众组织，积蓄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勇气。另一个工作重点是抓博平的工作，争取一定时间再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暴动。

1928年3月，省委把王寅生和我相继调离聊城。赵以政同志代理县委书记，从此聊城地区的工作就由赵以政同志负责，继续战斗。

对阳谷坡里暴动前后 几个问题的回忆^①

袁 果

（一）关于坡里武装起义计划

是产生于1927年10月鲁西县委成立以后。那时县委认为，在鲁西发动斗争的地区初步定为博平和阳谷。这两个地方相比较，博平的条件比阳谷好。虽然阳谷的党员和群众都不少，但与博平的环境比较起来，博平单纯。这里的斗争对象封建地主和旧军阀、国民党人等，在博平还没形成组织（那时也处于地下状态），而阳谷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已占有相当势力，因此，县委决定在阳谷、博平两地发展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我曾代表县委到过阳谷九都杨庄，听取杨一斋同志和党支部的汇报，准备联合旧军阀中的小军官也能参加在阳谷发动武装起义（因此有个叫徐登朝的人参加）^②，但当时没有具体时间。

我回到聊城，那时县委只有赵以政同志一个人在家，我们两人初步作了一下计划。赵以政也到了博平。几天之后得

^①此文系袁果1964年11月12日、22日致李士钊信的内容摘抄，题目是编者加的。

^②据考证：徐登朝未参加。

到阳谷的报告，战斗已经突破了坡里庄，县委决定调博平袁楼支部的同志去参加支援坡里的武装起义，把他留在博平筹备配合坡里的行动，兼管北线的通信联络工作。

博平袁楼党支部去坡里参加暴动，共有5位同志：郭庆江、林梦白、袁圣绪、袁卒绪、袁敦臣。

因为调走的都是博平的领导力量，兼以当时坡里的宣传工作做的很差，博平代县委作了对坡里暴动的宣传工作。

鲁西县委事先曾计划，在阳谷发动武装起义，博平配合行动。当时聊城的军阀部队正在换防，旧的反动军队已调走，新的反动军队尚未开到。再有省立二中学和省立第三师范党支部同志们为内应，一鼓作气可以成功地在聊城建立红色革命政权苏维埃。

博平的农民协会组织包括有8个庄，以袁楼为中心大约有100多人，党团员占20多人。参有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员多人。

（二）中共鲁西县委成立前后的政治形势

（1）坡里暴动之前

中共鲁西县委成立于1927年10月，当时山东系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也处于国共两党分裂的时期，在南方国民党已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共产党则由合法转入地下的革命活动。在山东的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作路线形成严格的敌对状态。但是国共两党的人都处于地下活动，我党的组织所处的地位是处于有两层敌人的形势下，中共鲁西县委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政活环境中组成的。

中国的整个形势是旧军阀正在节节溃败，新军阀国民党有代替旧军阀的趋势。那时党的公开口号是“反对一切军阀的卖国行为”。在鲁西农村号召农民反对苛捐杂税、拉车拉

夫、反饥饿的均粮斗争。上级党一再强调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和“苏维埃”，不管政权支持的长短，都可以对群众起教育作用，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鲁西当时处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旧军阀张宗昌只顾同孙传芳、吴佩孚残余联合起来，全力对付新军阀国民党的北征。对外地的政治局面已无暇管理。鲁西的地下国民党分子争取的对象，是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再就是等候他们所希望的北伐军队的到来，以图赶快步上政治舞台，当人民的老爷。我们共产党人的工作，就是利用这个形势进行大量的工作。所以能在聊城建立县委，并在博平、阳谷、聊城城北周家店、省立三师、二中两校，和莘县各处先后都建立了党支部。在博平袁楼曾召集过近百人的群众性宣传大会。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人丁君羊在会上作过报告，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7年11月份，我到过阳谷城北的九都杨庄，召集了几十个有觉悟的革命群众大会，作了政治宣传性的报告。在碾房道里开过党团员支部联席会议。中共鲁西县委成立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发动了著名的阳谷“坡里农民武装起义”。虽然坡里武装起义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完成预定要做的大量政治工作而失败了，但对鲁西的人民群众的影响很大，对党起了重大的宣传作用，使鲁西几个县，特别是阳谷县的群众，对于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坡里暴动失败之后

阳谷坡里暴动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内部组织不够纯洁，政治主张不能完全一致，军事行动迟缓，特别对政治宣传工作做的很不够，因而对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影响不大，使我们

的工作处于孤立和停滞状态之中。

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后，中共鲁西县委机关认为在聊城已不适宜，就迁往博平县西南的袁楼。省委把县委书记张干民都调往济南后，由林梦白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博平的党支部实际上执行了鲁西县委的任务，一直到赵以政同志被捕到遇难前后，工作进展不大。不是没有活动，因为我已离开聊城、博平，很多情况不详细了。那时郭庆江同志掌握鲁西县委党的工作。

（3）赵以政同志被难后党的处境

赵以政同志的被难，是新军阀国民党刚到鲁西，就以逮捕并杀害共产党人赵以政来显示他们的威风。新军阀的反动伎俩，要比旧军阀在政治上高明一些，兼以我们对他们这些人的政治情报工作做的较差，使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

聊城城北周家店的聂子政同志，因为舒连景被捕自首后，就早已逃奔到外地去了。那里的其他同志，也都及时地逃避开了。博平袁楼的郭庆江同志的家庭感到非常恐怖，被家人强行送往天津（以后他又回山东济南，在省委任交通工作，9月在高唐城西袁庄被捕）。我去鲁北工作住在禹城、平原，这时党的活动处于低潮时期，等到郭庆江和我被捕之后，党的工作更加消沉了。郭庆江在高唐被捕解放博平后，我又继续被捕，博平的党支部虽然跟中共山东省委还有联系，但工作已更加难作了。那时袁本恒同志负责那里的工作。袁现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和济南省委方面的关系还正常，直到1929年2月与省委断绝联系。（我是到东北之后见到张洛书同志，才知道省委因为王复元叛变，省委迁移所影响的。）在这以后，我以环境恶劣被迫去东北的。当我走的时候，鲁西县委的工作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候，在“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济南时期，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住在太安，山东还处于混乱时期。旧军阀刘珍年占据胶东，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

博平在张宗昌统治山东的时期，政治形势与鲁西相同。国民党来到后博平国民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因之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了国民党指导委员会，袁聘之就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博平没有国民党的驻军，只有在县政府派来几个行政人员。后来张宗昌溃逃的散兵游勇又组织起来攻破高唐，博平县政府就马上投降了。郭庆江的出狱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劫狱救出来的。博平不久又被国民党占领了，但他们的力量比聊城、阳谷是很薄弱的。

（三）博平袁楼参加阳谷坡里暴动五位同志的情况

（1）郭庆江，号荫九，60岁，高中毕业，中农，解放前教书，共产党员。

（2）林梦白，已故。70多岁，贫农。20年前已牺牲，追赠烈士。曾任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党员。因工作派回给我联系，那边退却未回去。

（3）袁圣绪，已故。80多岁。贫农，党员。住的时间不清楚。

（4）袁敦臣，55岁，党员、团员。现在东北通北县工作。贫农。住的时间不清楚。

（5）袁卒绪，已故。80多岁，农民协会委员。

（四）博平成立农民协会的庄名

袁家楼、孟庄、碱场、徐官屯、陈家铺、乌庄、刘坦、王营等。

袁楼支部所能记得起的党员姓名有：袁本恒、袁平之、郭庆江、林梦白、袁敦颐、袁习之、袁敦臣、袁敦庆、王芝瑞、王玉峰、袁春之。团员有白二、白器之，外庄都记不清了。

阳谷坡里暴动史迹片断^①

郭庆江

关于中共鲁西县委 发动的阳谷坡里暴动

关于党在坡里（暴动）的地位和影响，可以概括的说一切政治、军事的根本大权问题，都已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了。我们几个县委成员，除党内工作而外，还担任起义部队司令部关键性质的重要工作。其具体分工如下：

聂子政（聊城周店人）：总揽起义军司令部的全局，可以把党的方针政策，以非命令的方式，交总司令执行，但未发表正式职务名，实际上是党代表的身份在那里出现的。

申兰生（又名申仲铭，阳谷安镇人）：宣传科长，起草一切有关文告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文件和其他文字工作。

郭庆江：谍报科长，掌握侦察敌人情况工作，作为制定起义部队的政治和军事方针的根本。

孙大安（莘县老宅庄人）：武装大队长，即第八大队长。后来孙因事（病）退出，由聊城北周家店的某农民协会会员同志担任。

①此文摘自郭庆江1964年12月6日致李士钊的信，

题目是编者加的。

宋占一（聊城张炉集小张庄人）：参加宣传科的具体工作。

林梦白：参加谍报科的具体工作。

关于阳谷坡里农民武装

起义总司令部和机构简介

一、起义部队的总司令部：

总司令：韩建德，负责指挥全局。

副总司令：王朝聚，协助总司令，必要时代替总司令指挥全局。

总参谋长：程宗岳，协助总司令筹措各项事务，并代替总司令下达各项指示和命令。

总指挥：王志本、崔泽民，在总司令的领导下，指挥作战以及其他事务。

中共鲁西县委委员聂子政同志，作为党代表参加总司令部的领导工作。他可以通过会议形式把党的意图发表执行，也可以不通过会议直接交总司令办理。

二、起义部队的武装组织：

第一大队长：杨万奎

第二大队长：王德五

第三大队长：杨××

第七大队长：霍 然

第八大队长：孙大安（党员，莘县人，一九二五年由聊城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校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回山东工作）。

三、起义部队的工作机构：

宣传科：申兰生（党员）、宋占一（党员）

谍报科：郭庆江（党员）

民政科：郑××

总务科：曹万年

财务科：×××

军法处：徐××

关于阳谷坡里农民

起义武装与武装斗争

在起义农民武装开始于郭店屯集结，向德国天主教堂进发之前，据说只有不到100人。武器除一两支手枪之外，另有六七十支红缨长矛。攻占坡里教堂之后，俘获步枪四五十支，手枪10余支，还有步枪子弹10余箱。以后经过几次战斗（详后）又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到2月7日撤出坡里时为止，总的人数不足300人。武器方面有步枪70余支，手枪

10余支，长矛六七十支。

坡里农民起义武装在被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围攻之前，主要经历了三次对敌的武装斗争，现分述如下：

（1）坡里南面定水镇的奇袭战斗。我农民起义武装在攻占了坡里之后，阳谷县的地方反动武装“警备队”约有100多人，即在××庄集合，准备向我进攻。当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七八（十）个人的突击队，采取了隐蔽方式，从几个方面逐步向敌人接近。当他们已进入敌人身边近距离发动猛攻时，1支刺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象晴天霹雷一声响，吓得敌人只顾逃命，因之我俘虏敌人的队长、勤务兵各1人，步枪、手枪各1支。只有片刻的时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这一段记得是据别人传述的，从略）。

（2）九都杨庄的奇袭战斗：九都杨庄在坡里东边10里聊阳大道西边。是负责阳谷党的工作杨耕心同志的家。这里共有3个圩子，东西排列，建筑都很坚固。九都杨的头号大地主，同时又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杨耕心同志的父亲杨兰亭，他还是阳谷崇实小学的校长，因而他又是阳谷县有名的劣绅之一。……当我起义武装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的地主以杨兰生（亭）为首，便自动纠集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阴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的设防；并想凭借这3个土圩子不分昼夜地轮班守卫。……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所筹划的罪恶勾当，他是完全知道的。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我去的人带回来。

根据杨耕心同志的书面报告，我起义部队为了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凶焰，准备给他们当头一棒。他们准备在阴历元

且夜晚设防，我们必须走在他们的前头，于是我们就在元旦的凌晨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我进攻部队分成3个进攻队，每一个队担任攻击一个土圩子同时进攻。就在地主阶级冷不防的情况下，我军的枪声一打响，3个土圩子同时被攻破，使地主们吓的各自奔逃。这一战斗，我军共俘获步枪13支、弹药百发、银元108包，……

(3)对××民团局所的进攻及成果：在坡里北面的焦集，有一处民团局子，大约有20多人配备有步枪和弹药。我侦察人员汇报情报后，起义部队立即在正月××日，向这个民团局所发动了进攻。我军本来打算要进行一次试验性的攻坚战，以便在战斗过程中锻炼战斗意志，并进一步积累作战经验，但当我军迫近该局所时，该局所的头目和士兵，都惊吓的成了一群呆子，他们派人迎来，要求我军无须向他们进攻，他们情愿献出步枪8支以及适量的弹药；他们还承认不对我方进行抵抗，并在相当时期之内，听从我军的调遣。这当然是假的，但为我方开辟了一条敌人自动来归的新途径，验收了他们交来的枪支，就胜利而归了。

(4)对敌人大规模围攻的反击战：当时的聊城是鲁西的政治军事中心，统辖12个县^①，反动的“东临道尹公署”就设在这里。由于我起义部队在几次战斗中表现了闪电战的形象，使得敌人东临道尹陆春元大为震惊，他立即调集了12个县的警备队来，对我军进行作战，陆春元曾调来一个久住聊城地区的奉军守备队(旅)，约有2000多人，并配备了迫击炮、重机枪等有力武器，加上各县的警备队，共有3000多人。敌军于2月29日(正月初七日)在西面的沙镇集结

^①据考证东临道辖二十九个县。

完毕，又由陆春元作了统一部署，1月31日（正月初九日）向坡里附近进军，并进一步完成对我军的包围圈。从此开始，直到我军2月7日（正月十六日）全部撤出坡里天主教堂，大约前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双方连续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战斗。

如前所述，我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和敌人相比是非常悬殊的，在兵源（力）上敌人多于我十多倍，武装配备也相差多少倍。看来我军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内，是无法继续作战的。但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战士，都具有坚强的斗志，他们个个都能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经过多次战斗，我军连续重创了腐败透顶的敌军，使他们的伤亡惨重；而我军则始终士气旺盛，前后如一。最后，由于弹药用尽，死守据点无益，终于退出坡里天主教堂，向西北方向转移。兹将战斗情况及经过分述于下：

敌军在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之后，经常用迫击炮作掩护向我方发动进攻，其中要主要而又激烈的战斗有三次。

第一次，敌军数百人由坡里南方向我扑来，他们依靠炮火强和人数众多的双重优势，在前进中只要一发现我军的影子，就连发密集的枪弹，向我军疯狂扫射。我军只用了三四十人除步枪之外以长矛为主，对来犯的敌人反击。我军用避开敌人的正面，在敌人前进的斜角方面，选择有利的地形隐蔽起来。任敌方炮声隆隆，枪声（弹）如雨，但我方并不还击，等敌人迫近到一百码时，我英勇战士即由敌人侧面亮出长矛，发出震耳的喊杀声，向敌人扑去。敌人立即仓皇溃散，各自逃命，最后被我方生俘1人，并获步枪1支，而我军则无任何损失。

第二次，敌人选择坡里东南方向的一个土窑作为炮兵的掩体，先在土窑后面集结，然后准备在这里发起进攻。这种情况被我侦知后，立即组成了近20人的突击队，采取隐蔽方式，向土窑行进，最后我勇士们从土窑顶上压下来，使敌军立即溃散。

最后一次战斗，在我方临撤退的一天，这一次的战斗最激烈。上午8点敌人选拔了800人，以东南两个方向向我进攻，炮声、枪声密集响成一片。我方首先是曹万年同志要求领兵出击，因他执意要出战，就由他带领20几个人，进行出击。在战斗中有一个战士脚部受伤，接着曹万年同志头部受伤。由战士们把他救回来的。我方改由崔泽民指挥战斗，到上午11点左右，敌军已和我军迫近，我方考虑，在这种形势下，如采取以前的方式，向敌人冲杀是不利的，即撤回固守，察看动静。

敌军进攻坡里，由于我方守卫坚固，无隙可乘。敌人并无办法，终于分散到民宅里隐蔽起来。就这样，他们一直隐蔽到夕阳西下。当时，我们认为时机一到，就发起一次百人的反扑(出击)战斗，所持武器如前。我方敞开北门，百多名勇士涌出来，分东西两路向敌人展开包围式的肉搏战，敌人又是惊慌失措，鬼哭狼嚎的逃命都来不及了。这次战斗，敌军伤亡很重(无调查数字)，但我方考虑到弹药已尽，固守无益，就乘此大胜之际，敌军不敢追击的时刻，安全地全部撤出坡里天主教堂。

王寅生

王寅生（1905—1928），山东省阳谷县安乐镇南街人，幼年在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读书，后考入聊城省立第二中学，是当时聊中同乡会的会长，也是最早接受“五四”新思潮的青年之一。1925年10月，他联络组织了一些进步青年，南下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山东发展党的组织，迎接国民革命的北伐，并到家乡发展党员，次年返回黄埔军校。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调武汉工作。同年“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革命后，奉党中央的指示又返回山东，协助邓恩铭组建新的山东省委和组建地区党委，9、10月间被选为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一面在济南工作，一面不断来往于聊城、淄川、博山和鲁南各地，组建党的各级组织。同年10月他和张干民一起组建了中共东昌（鲁西）县委，以阳谷，聊城、博平为基地，并在聊城的三师、二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同聊城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底和1928年初，王寅生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失败后，调回省委机关工作，到胶东、掖县一带指导过农民运动。1928年四月下旬在济南不幸被捕，即被杀害，时年23岁。

李春荣

李春荣（？—1928），胶东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山东省省委委员。

一九二七年金谷兰同志在高唐县城北，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并组织农民革命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这支农民武装，就派省委委员李春荣前来指导工作，从此谷官屯地下党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杀贪官、砸盐巡，镇压土匪及恶霸地主，使党的工作在高唐城北一带打开了新局面，并在此改组了中共鲁北特委，设立了特委机关，李春荣任书记。1928年5月，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由李春荣领导，在谷官屯举行农民暴动，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但由于暴动计划被土匪头子李采题得悉，并组织了反动地主豪绅武装及反动军警包围了谷官屯村。李春荣、李金亮、李瑞常三人被包围在指挥部。当时金谷兰已带领部队往北撤了，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李春荣决定往西撤。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春荣打死了几个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地主郭金训用坯块猛击头部，壮烈牺牲。

赵以政

赵以政（1904—1928），1904年3月5日出生于聊城东关姚家园子街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刻苦读书，富有正义感。1923年秋考入聊城省立二中，吸收共产党人的进步思想，积极投入反帝斗争。1925年秋，他和聂子政、王寅生、孙大安等人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聆听了恽代英、肖楚女等政治教师的讲课，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同年10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以后分配到北伐军第三路军担任过排长和工兵连长等职，于北伐前线江西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赵以政在武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关押，在狱中靠谷糠充饥坚持和敌人斗争，经组织多方营救获释。1927年秋，他和王寅生、聂子政、孙大安等人，受党中央军委委派，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到鲁西北聊城一带，发展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10月初，他们已在聊城第三师范、城北周店、博平西南袁楼、阳谷城北郭店屯等处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在鲁西北的第一个领导机关——中共东昌县委，赵以政任县委委员。这时期，由于他的忘我工作与联系，使聊城的共产党员能经常读到《向导》、《布尔什维克》等党刊以及《创造与改造》、《语丝》等进步期刊。他积极从事群众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和武装力量，是坡里暴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坡里暴动失败后，任东昌县委代理书记，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叛徒出卖，

于1928年6月8日不幸被捕，在敌人高官厚禄引诱和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威武不屈，在狱中题下了“爱国本无罪，革命岂有辜”的题壁词。是年6月19日，英勇就义，年仅24岁。

宋 占 一

宋占一（1906—1931），聊城西小张庄人，1906年10月2日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五四”运动前入聊城道立模范小学，1923年夏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1925年“五卅”惨案后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并组织了“爱国十人团”，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补选为中共东昌县委委员。

宋占一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红色团体，发展党团员，他是著名的坡里农民武装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坡里暴动失败后，他在省委宣传部从事地下工作，兼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参加了邓恩铭为首的狱中党组织领导的狱中斗争，屡受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的家信及血书，充分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崇高政治节操。1931年4月5日，宋占一及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22名革命同志惨遭枪杀。临刑前，宋占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时年仅25岁。

孙 大 安

孙大安（1906—？），莘县城关老宅人，青少年时代在聊城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25年到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间随军北伐，转战江西各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南浔惨案”，此时，孙大安由部队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入伍生第一队党员大会上作了“蒋介石指示倪弼枪杀陈赞贤”的报告。1927年秋，国共分裂后，孙大安返回聊城，与黄埔同学王寅生、赵以政等在鲁西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是坡里暴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因病被批准回家休养。1928年2月，孙大安又去南京黄埔军校学习，1930年10月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二十六军三师七团任少校团副，并兼该团二营营长。1931年12月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率本部官兵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间，在福建省闽侯县一带做地下工作，同年秋失踪于此。

金 谷 兰

金谷兰（1904—1938），字贻溪，1904年12月21日出生于高唐县谷官屯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聊城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由杨笙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他的家乡谷官屯为中心，在高、恩、夏、武一带，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并创建了高唐县最早的地下党组织——谷官屯党支部。1927年冬，任中共鲁北县委委员。他根据党委指示打入带有迷信色彩的“红门”，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发展了地下党员，将“红门”改名为“红团”，并任团长，将自己的18亩地变卖全部购置武器，公开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等口号，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李洪楼等人，杀死了敲诈勒索的盐巡，劫获了土豪的粮车。金谷兰是著名的谷官屯暴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准备举行的暴动失败后，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9月不幸被捕。1935年出狱后，以家庭教师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七·七”事变后，组织了高唐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军，后又到范筑先之政训处（共产党掌握）做敌伪争取工作。1938年2月，金谷兰在清平县金郝庄做争取伪军工作时，被暴徒杀害，终年35岁。

聂子政

聂子政（1904—1949），原名秉贞，又名志超，1904年12月19日生于聊城周店一个中农家庭。1922年冬毕业于聊城县立高等学校，1923年春入聊城省立二中，1925年秋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参加北伐。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受党的委派于1927年秋返回鲁西北聊城一带，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发起武装暴动，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曾任中共东昌县委委员，是坡里暴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作为中共县委代表，在坡里暴动中起了决定性的骨干作用。坡里暴动失败后，他长期亡命在外，和党失去联系，后又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1945年10月，参加了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部队“邯郸起义”，后任“民主建国军”副师长、师长等职。1946年春以“民主建国军”赴延安参观团团长身份率16人赴延安参观，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延安参观后的我见》一文，高度赞扬了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很快就重新参加了共产党。不幸于1949年8月14日病逝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临时军医院，卒年45岁。

杨 耕 心

杨耕心（1900—1944），字一斋，阳谷县九都杨人，生于1900年1月19日。少时从父读书，1922年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1926年夏入济南山东大学附中高中班。他追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地下组织，1926年秋经王寅生、关向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假，在家乡建立了阳谷县第一个党支部——九都杨支部。1927年春毕业前夕，被学校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开除学籍。回家后，积极发动组织贫雇农，反对地主封建势力，先后在九都杨、宋堤口建立了农民协会，在本村杨广居家创办了阳谷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参与发动了5万农民围困阳谷城的斗争。他是争取韩建德、举行坡里暴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坡里暴动失败后，由于受到反动当局通缉，流亡哈尔滨，以佐坊为掩护积极为党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家乡，先后在阿城和安乐镇小学任教，领导建立了“安乐镇中心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领导建立了“阳谷县抗敌后援委员会”，冬，受党的指示到国民党26军孙连仲部做策反工作，由于叛徒出卖遂告失败。后辗转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党留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作军运工作，曾任国民党29军第6师简报主任，因共产党“嫌疑”被审查关押数月之久。1943年秋在中日鄂西大会战中被俘，残遭日寇杀害，时年43岁。

姜 占 甲

姜占甲（1889—1928），生于高唐县姜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时好习武，勇于救人之危。清末民初，华北一带战乱，高唐盗贼蜂起，土匪猖獗，官匪联合欺压百姓，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姜占甲在原义和团骨干董武起的帮助下，成立了“红门”，坛口设在姜庄，姜占甲任场子的师傅。为团结劳动人民，抵抗地主豪绅的压迫，“红门”先后除掉了姜庄附近的几股土匪。1927年共产党员金谷兰根据党的指示，积极组织群众准备举行鲁北农民暴动，姜占甲积极响应，将自己领导的“红门”合并到红团，并任副团长，使这支自发的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明确的奋斗目标，他的政治觉悟也迅速提高。他带头张贴标语，进行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宣传活动，领导农民展开了打土豪运动，大长了穷人志气，大灭了地主劣绅威风，农民运动在鲁北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是年，由金谷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4日凌晨，与进攻谷官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英勇战死，时年39岁。

土地革命初期的鲁西北 农民暴动及其失败的原因

刘 继 孟

土地革命时期的鲁西北，主要指现在的聊城地区和德州、泰安西部的一些县份，以及河南、河北的一少部分。在这里，不仅是我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农民暴动次数较多，影响较深的地区之一。现就土地革命初期鲁西北的社会简况，几次农民暴动的概况及其失败的原因，试作一简单地记述和不成熟地分析。

一、当时的社会简况

土地革命初期鲁西北所以发生接连不断的农民暴动，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现就当时的政治形势、群众情况和我党状况作一介绍。

鲁西北地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在整个华北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聊城又是鲁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激烈的地方。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整个鲁西北处于蒋介石、冯玉祥的北伐军和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一时对峙的局面之下。一些土著匪军也趁此各霸一方，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当时我上级党

组织和许多党员都认为，在鲁西北可利用这种复杂形势，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将来建立起工农政府和革命根据地。

其次，由于当时军阀统治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加之地主富农土地兼并厉害，租重利高，致使广大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东昌一带又遇旱灾，收成不好。而当时纳粮数目，每亩地截止阳历12月底已纳到近收成的一半。“是以东路各县一般情形，农民在旧历年前无饭吃者即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明年春天即可想见。这种生活上的困难，已使东临各县的农民普遍具有铤而走险的决心。他们整个的脑子，已为‘张宗昌、县官、豪绅及匪团长的痛恨’、‘找生活的出路’等几种思想所占据。他们并无所恐惧”（1927年12月28日《山东省委十二月份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11页。）当时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成为鲁西北农民暴动迭起的根本原因。

再次，1925年秋天大革命时期，聊城的省立第二中学和第三师范的进步青年，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共产党的号召下，先后有几十人去广州进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技术，并在那里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陆续回到聊城，积极发展党员，开辟革命工作。1927年10月，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决定在聊城地区建立鲁西县委，辖聊城、博平、阳谷、莘县、东阿、东平等县，由当时的团省委秘书长、临清的张干民同志任县委书记，省委委员阳谷的王寅生、聊城的赵以政、聂子政、博平的袁果等同志为县委委员。1927年冬，省委委员李春荣到高唐地区

指导工作，在高唐建立了中共鲁北特委，辖高唐、恩县、平原、禹城、夏津、武城等县。由李春荣同志任书记，金谷兰、李宗儒、于赞之等同志任委员。在党的组织题导下，鲁西北暴发了阳谷坡里暴动和准备着的高唐谷官屯暴动，无论就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前几次自发的农民暴动。

二、几次农民暴动的概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从反革命屠刀下的血泊中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号召革命人民继续斗争，号召农民举行武装暴动。由于鲁西北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在这之前自发的农民暴动已达七次之多。因此，省委把鲁西北看作工作的重点，指示鲁西县委和鲁北特委，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1925年冬至1928年6月，在鲁西北地区的阳谷、聊城、朝城、范县等地就曾发生过五次农民自发的武装暴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28年上半年又连续发生了数次农民暴动，兹简述如下：1927年9月，冠县“红枪会”因反抗军队骚扰而举行暴动。群众杀一连长，并缴获了该连士兵的枪械。（1927年12月28日《山东省委十二月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10页）。

1927年10月间，冠县农民因反抗官府予征而暴动，

并与官兵发生冲突。（1927年12月28日《山东省委十二月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10页。）

1928年初，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著名的阳谷坡里暴动。坡里地处聊城、阳谷、莘县三县界首，建有德国天主教堂。他们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独霸一方，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对其深恶痛绝，恨之入骨。1927年冬，党在坡里附近的郭店屯、曹庄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党支部。由于不断宣传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在农民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自动提出“打倒洋人”的口号，要求拆毁教堂，分地分粮。同时，在阳谷郭店屯一带，原有一批遭受地主压迫剥削而被逼上梁山的潜在的农民武装，其中为首的是韩建德和王朝举等人。他们经过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及党员杨耕心的争取与说服工作，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1928年1月14日（农历丁卯年腊月二十二日）晚，韩建德与聂子政带几十人，扮成教徒做“晚祷”，迅速占领坡里教堂。县委即派孙大安、申仲铭同志进入教堂掌握暴动武装。暴动武装组成“农民自卫军”。韩建德任司令，王朝举任副司令，程宗岳任参谋长，聂子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孙大安同志任军事部主任，申仲铭同志担任宣传兼韩建德的机要秘书。暴动武装发布文告，揭露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出开放民权、民选政府的要求。同时开仓放粮，将教堂里储存的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坡里暴动给反动军阀的震动很大，东昌道尹兼东昌道警备司令陆春元调动12个县的民团千余人攻打教堂。张宗昌还派去配有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等重武器的邢光弼旅二千余人协助攻打。暴动武装顽强敌抗，坚守教堂25天，终因寡不敌众，于2月7日（农历正月十六

日)夜突围撤出坡里。后转移到冠县一带游击,最后被直隶督办褚玉璞部消灭于河北大名。自1927年冬,中共鲁北特委建立后,利用并发展高唐一带的红枪会,掌握了这部分武装,还把它改组成“红团”和“农民自卫团”,准备进行武装暴动。1928年5月4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根据中共鲁北特委指示,原定当天有25个庄的农民自卫团到谷官屯集合举行武装暴动,并计划先打高唐城北打渔李庄的恶霸地主李彩题,然后再对付全县的封建势力。由于农民自卫团的保密工作不周,事先被故人侦知,恶霸地主李彩题等勾结高唐县警备队长李长兴带着配有马队的近千名武装,在5月4日黎明包围了谷官屯,袭击了自卫团团部。农民自卫团团团长金谷兰带领大部分群众冲出,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自卫团副团长姜殿甲等16位革命战士壮烈牺牲。其后,国民党高唐县党部、县政府和县法院等机关,又于192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密谋逮捕了金谷兰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

虽然以阳谷坡里和高唐谷官屯为代表的农民暴动失败了,但在鲁西北广大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影响。它打击了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促进了鲁西北人民的觉醒,也锻炼了我们的党,积累了斗争经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以后鲁西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暴动失败的原因

鲁西北农民暴动的失败,在客观上是因为革命敌人的强大,新老军阀、反动地主的力量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革命

力量；在主观上，则是由于当时的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一条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没能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和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及任务。自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发展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增长的“左”倾情绪，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在革命的形势问题上，过分夸大了敌人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武断地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说什么“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暴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此，在斗争策略问题上，他反对有组织的退却，主张继续进攻。当时的山东省委忠实地执行了这条路线。在明知鲁西北党和农会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是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发动一个广大的群众暴动。如1927年12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十二月份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中讲道：“苏维埃的旗帜，已经一度在广东竖起，自然这件事不只给了南方几省工农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可是这事件所给予北方工农的印象比较浅些也是事实。我们为了使北方的工农也同样地动起来，自然应该特别注意在北方来开始一个大暴动。东昌一带的党及农会的主观力量，自然是太落后，可是农民是这样地需要暴动。张宗昌的压迫远不及南方之新军阀，暴动之可能形成又是客观事实所允许，所以我们认为应于最近期间，积极地有计划地促成东昌一带的暴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14页）。据原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同志回忆：当时鲁西县委也是在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产生盲

动思想。县委的工作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夺取武装，占据城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色苏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聊城市档案局，聊城市档案馆编印的《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史料》第3页。）鲁西县委领导的坡里暴动和鲁北特委领导的谷官屯暴动就是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在鲁西北地区的贯彻执行的结果。这不仅将刚刚发展起来的鲁西北大好形势打了下去，而且使原有的革命组织和同志也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和残酷镇压。

2、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同时领导不力，指挥失当。毛泽东同志在论证红色政权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最重要的条件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928年10月5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时鲁西北的党组织和党员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由于党组织刚刚建立，大多数党员也是刚刚入党，缺乏教育和锻炼，这与它担负的艰巨任务是极不适应的。在阳谷坡里暴动和高唐谷官屯暴动前后，整个鲁西北只有几十个党员，鲁西县委和鲁北特委及一些党的支部也刚刚建立不久，这样在领导农运指挥暴动时就难免出现计划不周，顾此失彼的现象。金谷兰同志在谷官屯暴动失败后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讲到，失败后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同志太少，不能起核心作用。又各队中有同志者很少，以致总局非独裁不可。如各队皆同志负责，各队皆能自行发起斗争而领导之，总局虽没尚能各自联络，以谋进行。现在我若不去恐不易于起，更不能得到友军的援助。这是有群众而没有同志去领导不能干起的一个教训。”（1928年《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471页。）金谷兰同志还检讨说：“这

几次光顾政策，而忘了发展同志。这是很大的错误。即友军亦未打进去，真错误到万分了，特委不能不负责任，完全想不到。”（1928年《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471页）。1928年6月3日《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中，批评得更为严厉，说他们“忘掉了党的工作。在这一期间，鲁北简直抛开了党的工作，这也是很严重的错误。要知道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党适当的领导，是要失败下去的。”（1928年6月3日《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310页）。

3、群众发动得不广泛，不深入。毛泽东同志在论证红色政权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时讲到，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革命播下的种子，为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相比之下，由于鲁西北地区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较小，那么建立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的群众条件就差些，这就要求鲁西北的党组织必须加倍努力来做群众的发动、组织及教育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党组织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但距离建立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和建立一支足以保卫红色政权的革命军队所要求的群众条件还相差很远。坡里暴动前，其附近只有郭店屯、九都杨一带村庄所组织的五六十人参加的农民协会。谷官屯暴动前，也只有高唐城北一带村庄所组织的1千多人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其他地方，在博平有以袁楼为中心的8个庄的农协组织，约有100多人，在聊城城北、东阿、东平一些地方有少数农协会员，但整个鲁西北农协会员不过2千。在当时，不仅参加农民协

会和农民自卫团的群众占鲁西北农民总数的比重很小，而且教育不够，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和组织纪律等。金谷兰同志在总结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就谈到：“农民不守纪律。农民本是整日做活惯了的，若引不起他们的革命情绪，他们是很难行动起来。若是把他引起，他们就整日待动，三五成群聚谈不息，他们不知道不进攻即严加防守，他们以为防守是小胆，屡次告诉他们拂晓进攻是很厉害的，他们仍是夜间聚谈不息，晚岗一明即撤。因此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况敌人指挥都是军官土匪，这是农民受挫折一种通例。”（《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469页）。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在分析“三月十五日”谷官屯暴动失败的原因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批评鲁北特委“没有广大的群众的基础。”（1928年9月3日《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310页）。

4、革命武装掌握不多，重视不够。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要革命就只能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2页）还说，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便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就不能造成长期的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当时真正由鲁西北党组织自己掌握的武装很少。坡里暴动除了受我们直接领导的五六十个农会会员外，大部人马是我党联合或说借用的一支没有改造好的自发的农民武装，这支农民武装有其独立性，它不受我党控制和调遣。原鲁西北县委书记张干民

同志在《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中就讲过：“暴动时间原定腊月三十日，乘教堂、地主闹春节联欢不防备之际，我们一举打进教堂。但韩建德一伙性急，硬是提前下手，聂子政劝说不听，不得已只好组织了农会会员和韩建德一起提前进攻教堂。”（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山东人民出版社《光岳春秋》第24、25页。）“占领教堂后，聂子政同志提出用革命名义贴出布告，号召群众参加斗争。韩建德一伙却想用杀官济贫、替天行道的宗旨和群众见面，当时争执未决。”（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山东人民出版社《光岳春秋》第24、25页）。直到张干民、王寅生同志于暴动第三天闻讯赶到后经过做工作，双方达成协议，才写了布告贴出去。当暴动失败，起义军撤出坡里后，“到冠县一带打游击，后来和县委失掉联系，政治方向不明确，内部发生矛盾，闹不团结，指挥不统一。韩建德不遵守纪律，给群众要吃喝。后来，我们的党员和农协会会员陆续撤出，韩建德一伙又去过他们的流寇生活了。”（1976年3月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聊城市档案局、聊城市档案馆编印的《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史料》第69—70页）。张干民同志回忆当时县委总结坡里暴动的教训时就指出：“一是对韩建德的武装未能统一领导起来，几乎是分头作战，因而影响了以后的行动，闹成分裂。二是过分相信了韩建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结果靠不住。”（1979年3月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聊城市档案局、聊城市档案馆编印的《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史料》第69—70页）。张干民同志还回忆起当时农会会员不知道掌握武器的重要性，他说：“进攻教堂时，

农民都持着扎枪，本打算进入教堂弄几条快枪把农民武装起来，但农民平素没有使用快枪的习惯，没有积极地去抢枪，结果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张干民《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山东人民出版社《光岳春秋》第24页）。谷官屯暴动失败后，金谷兰同志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也讲到：“在以前团员多系红枪会人，只信神力不知急谋武装。至此失败后，始知光红枪不足恃，非拿得武装不可。”（1928年《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471—472页）。

引证与分析中错误肯定很多，望批评指正。

应怎样看待坡里暴动的历史地位

王其彦

中共鲁西县委领导的坡里暴动已经60年了。这次暴动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开始进入低潮时期举行的，也是在华北平原地区独立地领导革命、创建革命武装和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可贵尝试。本文就坡里暴动的历史地位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正确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也是我们缅怀先烈，共同纪念这次武装暴动的最好形式。

阳谷县坡里暴动，在革命低潮时期我党领导的二百多次起义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坡里暴动是我党在华北特殊条件下领导的一次暴动，表明我党在落后的北方也战斗起来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变，标志着大革命最后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在其所辖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奉系军阀与之呼应，也在北方残酷地镇压革命。全国各地的工会、农会被摧残，工农领袖、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大批的被监禁、被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进入低潮。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首先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对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个极大鼓舞。随后“八七”会议又制定了以土地

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中共党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暴动的重点地区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北方各省与南方相比，条件差，不是起义的重点地区。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聊城籍共产党员张干民、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和教员申仲铭等，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回家乡闹革命的号召下，先后回到鲁西北聊城地区，并于1927年10月，建立中共东昌（鲁西）县委。县委建立后，按照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积极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

属于华北的鲁西北，当时与南方相比，有它的特殊性：一是没有经受大革命的锻炼。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孙传芳在南方已被打垮。因此，大革命失败后，南方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而华北是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的联合，继续所谓“北伐”。进攻老军阀奉系张作霖。冯的军队从西、南两个方面，部分进入山东后，新旧军阀战争又出现暂停状态。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和河北褚玉璞，组成直鲁联军，与新军阀蒋、冯的所谓“北伐军”对峙着，随时都有爆发新战争的可能。这种状况对革命有利的方面是：新旧军阀都在秣马砺兵，准备在新的战争中打败对方。这就分散了奉系军阀在山东的力量。但也有对革命不利的一面，即军阀战争暂停，使张宗昌有喘息之机来镇压革命。二是阶级矛盾复杂尖锐，而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张宗昌在东昌（聊城）设东临道尹公署和东临道警备司令部，常驻一个旅的兵力，由道尹陆春元管辖。陆的军队已被冯军打散，力量更加削弱，已控制不住形势。鲁西北形成土匪蜂起，各霸一方，还有遍及各地的

红枪会。山头林立，纷争不息。这些政治势力，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支付费用和享乐，经常拉夫派捐，抢掠民众，直闹得人心惶惶，岁无宁日。这是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三是群众的反抗斗争，彼落此起，连绵不断。1926年至1927年，鲁西北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六次大的反抗斗争。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群众经受了较大锻炼，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在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下，阳谷群众又提出了反压迫、反洋教的战斗口号。这是进行革命有利的群众条件。四是天灾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生活。鲁西北土地贫瘠，正常年景收成就不好。1927年又遇大旱，麦季歉收，秋季近于绝产。而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春节前，70—80%的民众无饭吃。春节后的生活更不可言状了。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具有铤而走险之心。总之，华北地区的鲁西北是新旧军阀斗争与阶级矛盾激化的主要地区。这样的客观条件，对发动革命战争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除此之外，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举行武装起义前，都有自己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中共鲁西县委也有一支可借用的武装力量，但还不算是人民革命军队。

就在上述形势下，1927年11月中旬或下旬，中共鲁西县委就研究举行阳谷县坡里武装暴动问题，并于1928年1月22日（即农历12月30日）举行了暴动。一举取得暴动胜利，逮捕了德国天主教教士、修女，收缴了教堂的武器，完全控制了坡里天主教堂。把农会会员和韩部按军事性质进行了整编。（这说明，参加暴动的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但如何把暴动武装力量彻底改造成人民革命军队，还是个新课题。他们没有拿出有效措施），以革命政权的名誉张贴了布告，打开教堂粮仓，把粮食分给四乡广大的

贫苦群众。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坡里暴动以实际行动表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更没被杀绝，不仅在南方已起来进行斗争，而且在北方也战斗起来了。

2、坡里暴动是我党领导的在北方比较早的一次暴动，它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根据“八七”会议制定的总方针，在北方举行早的武装起义，主要是1927年10月杨静宇领导的确山（在河南南部，也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武装起义，1928年7月刘志丹等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其他各省党组织领导的起义很少，而且较晚。“八七”会议后，中共山东省委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虽然于1927年10月决定在全省主要地区组织领导武装起义，但是，城市武装暴动未能形成，又在农村确定暴动区域。鲁西北党组织根据山东省委指示，于1928年1月领导了阳谷坡里暴动。5月，又领导了高唐县谷官屯武装暴动。坡里暴动在山东为最早（1927年11月，胶东虽有红枪会等暴动，但不是我党领导的；同年12月，山东省委领导的陵县暴动未进入暴动阶段就失败了），在华北也是属于早的，是党在鲁西北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领导的暴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失败了，但它暴动在农村，战斗在农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当时讲，坡里暴动为后来的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复兴，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是明显的。

3、坡里暴动是对革命道路的大胆探索，它在客观上低制了当时的部分“左”倾思想。坡里暴动是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举行的，暴动后，既没进攻阳谷县城，也没按省

委指示进攻聊城（这个指示是“左”倾盲动主义的）；撤出教堂后是准备到北方广大农村打游击，以求在新旧军阀的争斗中得到存在、壮大和发展。因此，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了当时省委的“左”倾错误。虽然由于敌众我寡，缺乏新区群众的支援，又没山岭湖泊的有利地形作掩护，加之张宗昌的统治处于暂时相对稳定时期，能够迅速抽调军队镇压，暴动部队最后失败了。但这一实际行动表明，在农村起义，在农村打游击，没有山岭湖汊的地区也是难以成功的。这就从反面证明，毛泽东率领起义军进军井冈山的道路是正确的。当时的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鲁西北的共产党人也在探索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才能胜利的问题。

另外，坡里暴动的整个过程，完全不同于“城市中心论”；从时间上看，坡里暴动是在省委贯彻中央“左”倾指导思想前，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的，而不完全是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发动起来的。坡里暴动震撼了反动政权，打击了反动军警和地主豪绅，壮大了党的声威，锻炼了人民群众，意义是巨大的。

但是，也要指出准备坡里暴动的中后期，是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的。如1927年12月13日《山东省委关于阳谷暴动给东昌县委的指示信》，就有暴动后，“分头占领重镇”等“左”的倾向。12月28日《山东省委十二月份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工作意见》，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研究鲁西北的工作，指出了有利的条件，也指出了鲁西北党组织“无领导能力不能立即实现”暴动，农会组织“自然是太落后”。这本来符合鲁西北实际情况，是正确的，但还要“于最近期间，积极地、有计划地促成东昌一带

的暴动”。这无疑是有“左”的倾向，也是在主观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举行坡里暴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中共鲁西县委本身也有“左”的情绪，如只有几十个党员，农会很少，农会会员只数百人，不顾本地区反动势力暂时强大，就决定组织坡里暴动。另外，缺乏组织领导和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一支正规的革命军队，群众发动的不广泛，不深入，对攻防、进退、回旋余地、设法生存等问题考虑的不周密，暴动后没向临近的大峰山区进军而向西北平原地区退却等也是致使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们应努力象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起义的态度一样。在起义前，提出起义条件尚不成熟，劝其领导者不要举行起义；起义爆发了，则千方百计使其胜利；起义失败了，既如实地指出它的缺点，又不苛求，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探讨革命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力求正确估价坡里暴动的历史地位。

高唐谷官屯暴动失败原因初探

张金洪

1928年5月，由中共鲁北特委领导的高唐谷官屯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继阳谷坡里暴动之后，发生在山东境内较早的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在反动奉系军阀政府及豪绅武装、土匪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这一壮举点燃了鲁西北革命斗争的烽火，为我党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因而，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今天我们总结这段历史，剖析其失败原因，对于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防止“左”倾错误；对于播扬光大革命前辈的斗争精神，激励后人献身四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已掌握的有关资料，在简述暴动经过的基础上，对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作以浅探。

一、暴动的社会背景

高唐地处鲁西北平原、聊城地区东北部，县境东部有徒骇河、西部有马颊河贯穿南北，两河之间土地肥沃，是鲁西北著名的产棉区，素有“金高唐”之称。1927年奉系军阀张宗昌蹂躏山东时，高唐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最大的地主是尹集郝家，他一家就占地190多顷，并在地多处设有钱庄和当铺。高唐二号地主是双庙刘家，他一家仅放出的高利贷就达30万块银元。再举谷官屯一村为

例，当时该村有60顷耕地，而几家地主就占去40顷，贫富极为悬殊。

高唐的广大农民受着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还受着豪绅恶霸的欺压。民国初年，在高唐有以陈裕三为首的“十虎兄弟”（指高唐十个豪绅），他们当中有省议员、有县府科长、有商会会长、有包揽诉讼的“刀笔”，还有土匪头子。这些人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反动集团，为非作歹，横行一方，不但劳苦大众受他们的压榨，就连高唐的每届县长也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摆布。那时流传的“做官不做官，要问陈裕三”两句讽刺高唐县官的民谣，生动地刻画出官绅串通鱼肉百姓的情景。

除贫富悬殊，政治黑暗外，当时高唐旱蝗灾害也频连发生。据民国志记载，1927年高唐受灾面积达1015平方里，占总面积的27%，受灾村庄190个，受灾人数达44515人，平均秋收为三成。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广大农民过着忍气吞声、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迫切要求革命。这些客观因素，使高唐地区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巨大潜流。

1926年，高唐建党以后，共产党员金谷兰奔走城乡，传播进步思想，开展农民运动，使高唐的民众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金谷兰受中共鲁北县委（鲁北特委的前身）的指示，在城北谷官屯一带发动农民、组织暴动。为了组织一支队伍，他打入到活动在高唐城北一带的民间迷信组织——“红门”中去，做争取改造工作。不久，将红门改造成党领导下的“红团”武装。从此，红团很快发展到25个村庄，红团团员千人以上。在改造“红门”的同时，他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这年秋，以谷官屯为中心，创建了高唐第

一个党组织——高唐党支部。党组织的建立、红团队伍的发展以及武装斗争的兴起，预示着—场震惊鲁北大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二、红团暴动的经过

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团开展了“打虎除霸”的运动，揭开了谷官屯暴动的序幕。他们首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李洪楼和惯匪郭景方、张麻来，接着又打击了高唐城北苦水李庄的大地主李干臣和高唐商会会长姚鼎汉，枪挑了五个盘剥贫民的盐巡，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到达泰安、长清一带，张宗昌在山东的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中共山东省执委第三次执委会后，鲁北县委决定利用张宗昌撤离、蒋介石的“北伐军”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谷官屯一带的红团举行暴动，建立谷官屯苏维埃。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根据省委指示，鲁北县委改组为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李宗鲁、于赞之、金谷兰、张干民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谷官屯。为了暴动时便于指挥，红团设立总团局，金谷兰任团长，姜占甲、靳兴荣任副团长，并将25个村庄的团员编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5个小队。计划7个大队的团员到谷官屯集结，先打大土匪李采题的老巢——打渔李庄，再去占领高唐县城。

由于暴动计划事先为敌侦知，5月4日拂晓，高唐奉军政府联合城西北大土匪李采题，突然包围了暴动地点谷官屯。谷官屯大队的红团团员们，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结果，我特委和团局机关很快被敌人占领，特委书记李

春荣、副团长姜占甲、团员李长义等十一人先后英勇牺牲，田勇亭等三名团员身负重伤。特委、团局悉被敌人烧毁。

天明后，周围村庄鼓声四起，我其他村大队的团员闻讯前来救援，并有部分友军前来助战，狡猾的敌人闻讯后很快撤走，因为领导机关被破坏、失去指挥，致使这次暴动尚未充分发动，就被敌人镇压下去了。

三、暴动失败的原因

党的“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发展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增长的“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的问题上，过分夸大了敌人统治的危机，否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武断地认为“中国革命无疑是在高涨，”党的任务是把各地工农兵力量汇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在斗争策略问题上，他们反对有组织的退却，主张继续进攻。因而，终于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谷官屯暴动时，“左”倾盲动主义虽然在中央已基本清算，但在山东的实际工作中并未结束，谷官屯暴动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加之当时暴动的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导致了这次暴动的失败。具体说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暴动的条件尚不成熟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缺乏广泛的群运基础。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是农民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最高形式，它的发生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缺乏这种必要条件，就不会成功。党建立后，中国革命是先从南方开始的，由于孙中山实

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因而，农运首先在广东开展，而后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使湖南、湖北、江西等南方省区的农运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形势，就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南方举行暴动并获得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工农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而地处鲁西北的高唐，从1925年到1928年5月，一直是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反动统治下，没有直接接受过大革命的影响。高唐自1926年建党以后，党组织又偏重于做争取红团的工作，因而到准备举行的暴动前夕，只有少数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仅有几百人，这就很难适应斗争的需要。除此以外，农会会员入会时间短，对其教育很不够，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金谷兰在总结暴动失败的原因时曾谈到：“农民不守纪律。农民本是整日作活惯了的，若引不起他们的革命情绪，他们是很难行动起来的，若是把他引起，他们就整日待动，三五成群聚谈不息，他们不知道不进攻即严加防守，他们以为防守是小胆，屡次告诉他们拂晓进攻是很厉害的，他们仍是夜间聚谈不息，晚岗一明即撤，因此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以下简称“史档选编”第一辑第469页）。在群众没有广泛发动的情况下，单纯利用红门这个农民迷信自卫团体暴动，是难以取胜的。暴动失败后，中共山东省委在分析原因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批评鲁北特委“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红团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监督，假如‘三月十五日’（公历5月4日）事变不发生，红团也会隔离群众而失败”。（《山东省委致鲁

北特支的信》，《史档选编》第一辑第310页）。

其二是党组织力量极为薄弱。毛泽东在论证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当时党组织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谷官屯暴动时，高唐仅有一个支部、数名党员，且党组织建立时间短、党员又多是入党不久，缺乏必要的教育和锻炼，有些人对党尚缺乏认识，还没有树立远大的目标，与它担负的艰巨任务很不适应，这就难于领导农民开展有效的斗争。暴动失败后，金谷兰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讲道：失败后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同志太少，不能起核心作用”，“各队中有同志太少，以至总局非独裁不可，如各队皆同志负责，各队皆能自行发起斗争而领导之，总局虽没 尚能各自联络，以谋进行。现在我若不去恐不易干起，更不能得到友军的援助，这是有群众而没有同志去领导不能干起的一个教训。”（《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史档选编》第一辑第471页）。省委对之批评更加严厉，说他们“忘掉了党的工作。在这一期间，鲁北简直抛开了党的工作，这也是很严重的错误，要知道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党适当的领导，是要失败下去的。”（《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史档选编》第一辑第310页）。

其三是没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这就是，共产党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否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谷官屯暴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参加暴动的红团是在民间自发的迷信组织红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农民出身的红团团员，虽有反封建的意识，却很不彻

底，并且受迷信思想薰染很重，后来他们虽然接受了党的领导，但时间很短，并没有真正从单纯复仇的狭隘思想境界中解脱出来。这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以“防匪保家”为宗旨的农民自卫团体，尚没有进行根本改造，就想利用它来进行武装暴动，既使不在暴动之前被镇压下去，也很难达到目的。

另外，从红团的装备来看，也是极为落后的。红团发展起来以后，由于领导人对武装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放松了抓装备建设。到暴动前，全团只有五支手枪，一支长枪，团员们大都是使用大刀、红缨枪、铁蒺藜锤，所以，当敌人来袭击时，只能用这些原始的武器来对付装备优越的敌人，其失败是可以想见的。金谷兰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讲道：“在以前团员多系红枪会人，只信神力不知急谋武装，至此失败后，始知光红枪不足恃，非拿得武装不可。”（《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史档选编》第471—472页）

如上所述是导致谷官屯暴动失败的远因。

（二）错误地估计了敌情

暴动前，鲁北特委对敌情是有个分析的，他们把主要危险放在奉军政府方面，但认为经过前段几次较量，他们都吃了败仗，决不敢来，即来也只有放手交枪，就是城内所驻军队，县长几次要求打，他们决不承认，况当时前方军事不利，北伐军即将到来，自谋脱逃不暇，无力对付农民武装。没有认清奉军高唐县政府是当地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更加当时的县警备队中是“十虎、”大地主恶霸的子弟充当骨干，为“十虎、”大地主恶霸所操纵，高唐红团的举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他们必然会勾结反动政府采取对策，所以，奉军县长张振声在随褚玉璞撤退的前夕，仍组织县警备队并

联合城西北大土匪李采题等，去围剿谷官屯红团。

再者，特委没有认清大土匪李采题的反动本质，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因而，在设防上，只注意东南方县城之敌，而把西北方置之不顾。李采题是城西北一带的大地主，又是高唐的三番头子，此人奸诈狡猾，野心很大，从青年起，就购枪置炮，收罗土匪、流氓、组织庄团，掌握着一支有百余支枪械的土匪武装，高唐、夏津、平原等县的大土匪有的与他勾结，有的直接归他指挥，而他的老巢——打渔李庄，当时是一个近四百户人家的大村，该村的劳苦群众全被李采题统治着，位置又处在谷官屯村的背后，在红团发展前段，有些事情李采题曾和红团联合，但这是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谷官屯一带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以后，打土匪、斗豪绅、砸盐巡，直接危害到他的切身利益，所以时机一到，他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1928年5月4日拂晓，就是他勾结反动奉军政府，组织高唐、夏津、平原等地的近百名土匪，强征二百多名群众，从西北方向首先攻入谷官屯的。

（三）麻痹大意，让坏人钻了空子

为了搞武装暴动，总团曾吸收了几名兵痞到团里来，有的担任了大队的领导，有的在红团秘书处任职。这些人都和大土匪李采题暗中通气，不但不为红团出力，反而从中破坏，据当时参加谷官屯暴动的红团团员陈汝方回忆，暴动前夕，为了筹集枪支，团局派混入秘书处的红团秘书王京昌（彼时尚充敌县警备队书记），带他和几名队员，去城北郭老庄一户地主家取枪，赶到这个地主家时，他们很容易取到了枪，事成后，本应迅速撤离，但王京昌却以找饭吃为名磨蹭时间，以至当 they 要撤离该村时，这个地主已暗中纠集十余人将其包围，截回了枪支，他们只好空手而归。

更为严重的是，暴动的前一天，豪绅突然派人来谷官屯领取被红团镇压、准其以高粱三十石来赎的盐巡尸体，并请求红团秘书王京昌同来，但来时并未携高粱，由王京昌保证其领尸后交来，特委认为其决不敢爽约，故让其领走。但在次晨拂晓，红团总局所在之村谷官屯，即为反动红会警队，及张宗昌将退走的装备精良的三百督战队（总数不下千余人，手提机关枪及匣子枪）所包围，我们则毫无准备，致死团员十数人，特委书记李春荣被杀，红团长金谷兰逃出，枪声起后，与李春荣同榻之红团秘书王京昌已不知去向，始知其与豪绅所勾结。以至暴动因计划泄露，遭敌袭击，而没有发动起来。

（四）组织松散、消息不灵。

5月4日以前，红团对于敌人的行动计划，基本一无所知。事变当夜，“已有两个村发生事，并无报告。”西方击鼓传令别的村听着亦未报告。”“西北村（指位于谷官屯西北约三里的范庄）十六人掳去十四人，余二人亦未赴局报告”。金谷兰认为，“这实是平素由于总局与各坛口未发生关系并各坛口的关系不好。”说明红团虽有组织，但非常松散。经不住敌人打击。

金谷兰还谈到，西北方敌人（指位于谷官屯西北约五里的打渔李庄的李采题反动土匪武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在该村也没找出通气的来，不能不说是工作不好。该村虽是一姓，但是被压迫民众所受剥削更甚，只因其统治力量坚固，不敢反抗。即各处想攻击的地方，皆不能有确实消息，并且内人（指自己方面的人）听到消息，恐怕不确，不肯来报告，也不能不是失败的原因”。（《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史档选编》第一辑第470页）。

以上所述是导致谷官屯暴动失败的几个近因。

谷官屯暴动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浅析

王 新 忠

1928年，中共鲁北特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山东省委的指示，在高唐县谷官屯组织农民革命武装暴动，试图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农村武装割据的局面。准备5月4日举行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鲁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纪念这次暴动60周年，本文试对这次暴动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作些浅显分析。

谷官屯暴动，作为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伟大尝试，其历史地位是不能抹煞的，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它作为全国武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扩大了我党在鲁西北的影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在“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引下，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共发生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谷官屯暴动的准备工作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利用张宗昌军溃败，国民党军还未到达山东的急促期间，统治者的力量无力顾及乡村的时候，发动农村土地革命，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土地，造成乡村中间斗争的基础，甚至促成一乡或一县割据的局面，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暴动是同全国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遥相呼应的，它是全国武装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

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此外，党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烽火遍及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河南、安徽、山东、四川、江苏、河北等省。准备谷官屯暴动和1928年1月的阳谷坡里暴动，是山东省委领导的两次比较重大的武装革命斗争，它同全国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一样，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新旧军阀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方面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8年春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高唐县谷官屯一带的农民革命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红团遍及25个村庄，团员发展到一千多人，革命声势日益壮大。红团先后镇压了恶霸地主李洪楼，打击了被称为高唐县“十虎”之一的商会会长姚鼎汉和大地主李干臣，把太平庄恶霸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枪挑了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盐巡”，狠煞了封建地主豪绅的威风，不仅红团所在区域内的恶霸地主席卷而去，整个高唐县境内出名的劣绅、大地主也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弃家逃匿。县警备队的二三十名军警慑于红团的威力，不敢到红团所在村庄抓人。谷官屯暴动同发生在我国南方各地的革命武装起义相比，规模、范围都不算大，并且未举行暴动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是在封建统治力量强大、在敌人的腹心地域进行的，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华北各地的土豪劣绅对此呼号不已，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舆论见诸报端。它不失为是对封建反动统治的一次冲击。

大革命失败前后，金谷兰遵照党的指示，在高唐、夏津等县，创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农民运动，大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先后发展了一些觉悟的农民和小学教师加入党组织。到1927年底，仅谷官屯一带就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数

十名，以“练拳习武，健身保家”为宗旨的民间结社组织“红门”（红枪会），也被改造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武装团体“红团”。中共鲁北党组织在准备组织谷官屯农民暴动的过程中，大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铲运贪官污吏”，“打倒新旧军阀”、“平均地权”等政治主张，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共产党人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鲁西北各地，高唐、恩县交界处的郑官屯、北镇一带也建立了红团组织，高唐、夏津、恩县、武成等地的农民群众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团当作革命的一面旗帜。

其次，谷官屯暴动教育了群众，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引导群众走上了自觉反抗封建统治的道路。

在共产党组织的教育下，农民群众日益觉悟起来，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发斗争发展到同军阀、地主豪绅的自觉斗争。过去，鲁北各地的“红门”等组织具有严重的迷信色彩，虽然有时也进行抗粮、抗税、抗匪的斗争，维护团民的部分利益，但这种斗争是自发的、消极的，并且这种组织容易被官府和豪绅所利用。鲁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为了在农民中扩大党的队伍，发展武装力量，改造“红门”，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对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教育，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如，在高唐县三殿庙“十乡会”上，金谷兰提出“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各村农民群众的一致拥护，他也被公推为十乡（十个村）的团长。在党的教育下，谷官屯一带自发的农民武装团体“红门”接受了党的领导，开始自觉地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农民群众在抗暴除霸的斗争中，增强了团结，显示了农民阶级反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正象金谷兰在《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鲁北第一次代表大会

后，就开始与劣绅斗争，得到民众的信仰。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民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杀了劣绅的四个走狗，同官府相抗，不出官车，秘密不完粮，更得到民众的信仰，一般群众渐渐知道自己团体是有力量的。各乡的“红门”组织都愿意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团合作，联合进行抗敌。当红团打击了土豪劣绅、枪挑“盐巡”之后，农民群众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纷纷报名参加红团。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农民群众从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信赖共产党，仇视军阀的反动统治。面对暴动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农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人人义愤填膺，主动掩护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和红团骨干，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在国民党军悬赏捉拿共产党员的情况下，“一般群众仍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对的”；认识到国民党军“比奉军还坏”，“他们不过是打革命的旗子，不过是自谋地盘而已。”（金谷兰《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第470页）。

再次，谷官屯暴动还为以后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抗日游击队的较早成立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党就能够在谷官屯一带建立冀鲁边抗日游击大队，这与1928年的暴动是有密切联系的。暴动播下了革命火种，造就了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唤醒了农民群众。所以，在关系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党能够领导抗日游击队较早的成立和发展。

尽管如此，准备举行的暴动终究是失败了。暴动的失败给山东省各地的党组织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金谷兰《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和《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曾经分析了暴动失败的直接原因及教训。我们今天研究、探讨谷官屯暴动失败的教训，不仅应该分析当时准备暴动的主

客观条件，还要看这个时期鲁北的整个形势：不仅要看到各级地方党组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还要和全国其他武装暴动成功的地区作些比较。这就需要以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原因的论述为理论指导。对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关于农村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的分析。我认为谷官屯暴动失败主要教训有这样几点：

1、农村武装暴动应以农民运动的充分发展为基础，谷官屯暴动缺少革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9页）鲁北地区从1925年到1928年初一直处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反动统治下，没有直接受过大革命的锻炼，革命的群众基础薄弱。党组织1927年下半年才在农民中开展革命发动和教育工作，并且主要是依靠改造“红门”来进行暴动准备，因而暴动发动工作不够广泛，广大农民群众对革命的认识程度还不高。党领导红团抗霸除暴，把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教育和团结了农民群众。但是，没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土地依然掌握在少数豪绅地主手里，农民还没有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封建的基础没有根本变动，因而暴动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2、农村武装暴动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容易获得成功，谷官屯暴动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首先，奉系军阀和地方豪绅在鲁北的统治相对稳定。尽管准备暴动时处在张宗昌军溃退时期，但就局部而言，敌人的

力量仍然很强大，仅在暴动中心谷官屯的周围就有装备精良的县警备队和土匪、豪绅武装上千名，而红团枪支、弹药缺乏，主要装备是“铁蒺藜”、大刀、长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武装暴动容易遭受敌人镇压。假设暴动预期举行，攻占了县城，也难以占得住脚，仍然难免在强敌联合进攻下失败。其次，旧军阀撤离，新军阀未到来的时机极其短暂。1927年奉系张宗昌与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在津浦、陇海两铁路线进行拉锯战，1928年4月，蒋桂冯阎联合“北伐”进攻张宗昌。中共鲁北特委计划利用奉军撤离，国民党军未到来的时机，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但是，这一时机极其短暂。暴动又没有利用好时机，认为奉系军阀溃败，高唐县内所驻奉军“前方军事不利，自谋逃脱不暇”，忽视了敌人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对国民党军迅速占领山东估计不足，当重新集聚力量，准备进行反攻时，国民党军已经控制了局势，继续镇压革命运动，使我党最终失去了在谷官屯地区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时机。

3、农村武装暴动要有共产党正确路线政策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强有力的领导，谷官屯暴动党的力量薄弱。山东省委虽然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暴动，但在主观指导上受到了当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各级领导人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对发动农民暴动的主客观条件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只强调抓紧暴动和进攻，不讲究革命斗争的策略，不注意积蓄和保存革命的力量。这是导致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准备暴动时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红团中党员很少，除总局外，各队都缺少党员，领导力量不足。另外，组织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李春荣、金谷兰等，虽都

是我党坚定的革命者，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是缺乏革命的实践经验，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锻炼和军事训练，缺乏军事指挥才能，所以当敌人突然袭击时，整个指挥系统失灵，疲于应付，遭受失败。

4、农村武装暴动需要有相当力量的革命武装作支柱，谷官屯暴动缺少革命武装力量和科学的军事指导工作。毛泽东曾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页）。谷官屯红团，是由“红门”改造而成的，而且是在没有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未接受过工农群众民主影响的基础上建立的，还不是正式的武装力量，它在同土匪、豪绅武装的斗争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同正规的敌军作战就难以对付。加之红团存在着农民团体的散漫性、非纪律性的弱点，如团员夜间聚谈不息、没有严格的岗哨制度和及时报告情况的制度等，给敌人偷袭以可乘之机。另外，暴动前缺少军事工作的周密计划，如总团局与各队没有切实的联络方案，彼此消息不通，暴动总指挥部没有必要的防卫措施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注意保密工作与防奸工作，过早地将行动意图暴露给敌人等，这些都是造成暴动失败直接的指导技术上的原因。

关于高唐谷官屯 暴动几个史实的考证

张 金 洪

高唐谷官屯暴动距今已有60年的历史，但已发表的文章记载和现在的老同志回忆，对高唐谷官屯党支部成立的时间、暴动组织的名称、金谷兰入党地点、红团建立时间等几个史实的说法不一。本文就几个史实作一些考证。不妥之处，请读者同志们指正。

一、金谷兰入党地点是

高唐县城文庙小学

据金谷兰的族侄金维祥（字瑞堂，1926年在县城文庙小学任校长）介绍，金谷兰的入党介绍人杨笙甫，因娶高唐教育界名流杜友棻（高唐南街人）的长女杜淑时为妻，因而，在平原县职业学校任教期间，经常到高唐南街探亲。由于杨与金维祥系省立一师的同学，为此，杨笙甫每逢来高唐，总要到文庙小学造访。此时，金谷兰进城也经常到县城文庙小学落脚。因此，杨笙甫与金谷兰得以有机会在学校邂逅相遇，经过几次接触，杨笙甫即发展金谷兰入了党，至此，金谷兰入党之谜终被揭开。

二、红团建立时间是1927年春

而不是1927年初冬

金谷兰所作的《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中，在回顾红团过去时说道：“这个红团是在国共合作时候建立的，只望南军到来给我们谋利益，决不自己起来去干，至鲁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始知非自己去干不可，就开始与劣绅奋斗”。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红团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并在第一次鲁北代表大会以前建立的。据查，鲁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召开的。这与老红团团员李金莪等人提供的“金谷兰入党后，从1927年春即打入红门做争取改造工作，不久，‘红门’即改称‘红团’的建团时间，大体是吻合的。因而，红团应该建立在1927年春。

三、党支部建立在1927年秋，由三人组成

据李金莪、金维骝等人回忆党支部建立时，记得红团已建立了四个多月，地里还长着高粱，从季节看，是个秋季。这个支部共有三人，支部书记是金谷兰，两名支委，一名是田益之，一名是李玉红。当时，金谷兰经常与他们两个在一起开小会，商量事情。从分工看，田益之常找人谈话，好象搞组织工作的，李玉红常带领人，趁夜晚出去贴标语，侧重搞宣传。支部由三人组成，还可以从历史文献上得到证实，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中，1928年省委对山东各地基层组织所作的统计所列，高唐1个支部，3名同志，因此，历史文献所载与李金莪等人所提供的支部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四、“红团”未改称“农民自卫团”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篇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一是暴动失败后，金谷兰对省委的《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该报告多处提到红团，通篇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农民自卫团这个名称。二是暴动失败后，《山东省委致鲁北特支的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中，除多次提到红团外，更明确地指出：“原来的红团名义可不用，即行组织农协名义……”，因此，“红团改称农民自卫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五、红团成立的是总局，而不是总团部

金谷兰在对省委的《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中写道：“鲁北改组特委后，红团即成立了总局，计划于最近成立谷官屯苏维埃”。他在分析暴动失败原因时还写到：“上下机关不能发生关系。在总局发生事件前，半夜间已有两个村庄发生事，并无报告……西北村十六人掳去十四人，余二人亦未赴局报告，这实是平素由于总局与各坛口未发生关系……”。

从以上文献看，关于红团成立总团部的说法是不对的。

六、是陈裕三，而不是陈友三

陈裕三是高唐“十虎”之首。1985年，我们有幸在济南找到了散失50年的民国年间编的《高唐县志稿》，其中记载：“陈裕三，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员。”“裕”“友”字音相近，“友”系“裕”字之误，因采访欠实所致。

七、下令镇压谷官屯暴动的县长是张振声

为了查清下令围攻我红团的敌县长是谁，我们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除与当年参加过红团的李金莪、郑继广、陈汝芳、田勇亭等人座谈外，还先后走访了30多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时，高唐的县长更迭极频，数月一换，很少超过半年。1928年前后，先后换过几任县长，记得其中有个叫王乃栋的，另外还有一个姓周的、一个姓范的、一个姓张的，至于谁先谁后，记不清，后经朱学温同志提供线索，我们找到了1928年在县警备队当过勤务的王建功。据他回忆，谷官屯暴动时，任职的县长姓张，好象叫张连生。王建功所提供的情况虽较为可信，但因系孤证，仍无法定论。

1986年，高唐县志办公室在济南找到了散失50年的民国年间续编的《高唐县志稿》，其中写到：“张振声，长清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任高唐县长，贪污搜刮，尽其能事……联庄会（即红团，一一编者注）因抗不出车，振声深衔之。又时方奉省令植树，振声以贱价购买垂死之枯树株，分发之时，尽成干柴，而仍迫令每株纳洋1角。致人民情愿纳钱，不受其树，振声尤以为恨。旋以革命军（指北伐军一一编者注）将至，振声随褚玉璞军，弃城夜逃。临去时，下令（所部匪化军队即刻动员 剿灭联庄会，因而谷官屯被攻破。而中学校长金石兰在校被刺杀。此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公历5月4日）夜间事也”。据此可以断定：镇压谷官屯暴动的罪魁祸首就是张振声。

八、金石兰是金谷兰的二哥，不是大哥

金谷兰的父亲金玉相，先后娶了两个妻子。前妻生一子，名叫金×兰，后妻生四子，长子石兰，次子奉兰，三子佩兰，四子谷兰。按次序看，石兰排行二。因此，金石兰应为金谷兰的二哥，把金石兰作为长兄是错误的。

坡里、谷官屯暴动前后

我党在鲁西北活动大事记

一九二五年

六月 聊城爱国师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 上海“五·三十”惨案发生后，聊城山东省立二中、三师的师生，配合全国展开的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怀着满腔怒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学生赵以政（聊城人），在街头演出反映当时农民贫苦生活的活报剧，围观的群众被感动的痛哭流涕。王寅生（阳谷安乐镇人）于暑假期间，在安乐镇庙会的戏台上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

夏 金谷兰同我地下党建立关系 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本科毕业的金谷兰（高唐谷官屯人），约几个同学一起南下广东参加革命，路上彼此政见不和，中途返回家乡。不久，金谷兰即同我地下党建立了关系，接受了先进思想。

夏 张存礼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存礼（临清人，又名张干民，现名赵文栋）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夏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济南进行学生运动。

秋 王寅生等四五十人赴广州学习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

私費无籍等
当时无等

下，聊城省立第三师范、省立第二中学的进步学生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聊城人）、孙大安（莘县人）等四五十人，先到开封找关系，然后经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王寅生、孙大安、聂子政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底 中共鲁北县委建立 在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地区性党的组织——中共鲁北县委，领导平原、禹城、恩县、夏津、齐河、高唐、陵县、德县、清平9县党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

三月 山东省委和济南团委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 会议确定了以后农民运动的具体方针。

七月 济南团地委派员负责东昌工作 济南团地委派李登元为东昌通讯员，负责发展团组织。

七月 冠县建立团组织 济南团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中提到：冠县于1926年7月之前，就已发展团员6人；成立了20余人的儿童团，归团组织领导。负责人齐辉蕴。

七月 王寅生奉党的指示回山东从事党的军事策反工作
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后，王寅生奉黄埔军校党组织的指示，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山东从事党的军事策反工作。这期间分别在济南高中和家乡安乐镇介绍杨耕心（又名杨一斋）、朱华亭（又名朱庆荣，女）入党。1927年春王寅生返武汉向中央请示工作。

七月至八月 张干民利用暑假开展党的工作 暑假期间，张干民以共青团山东区委秘书长的身份发展邻村（赵圈）

同学赵儒昌（赵亮）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干民在临清城南朱庄沈廷渠家邀集进步青年沈廷相、沈廷梅、沈廷彬及长工张敬文等，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他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并把所带的《苏俄访问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短裤党》等书留给他们。此举引起该村国民党员朱辅臣的注意，并对张干民进行反动说教和威吓，妄图使张干民放弃革命。张与他进行了说理斗争。

张干民在母校临清第一高级小学与校长潘子灵、教师崔子平、郑宝泉、李维周相会时，张向他们讲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工农运动情况、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立场。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此很不满意，并进行反驳。张干民据理相击，驳斥得崔子平理屈词穷。事后，张干民还把带来的《向导周报》、《少先队报》、《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书刊留给他们。

秋 金谷兰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杨笙甫（济南“一师”毕业，山东高密人）介绍，金谷兰在高唐城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遵照党的指示，在高唐酝酿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活动。

秋 杨耕心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 杨耕心在家乡阳谷县九都杨、宋堤口、郭店屯、邵楼一带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杨耕心发动贫雇农和有正义感的中农，并在杨广居家成立了政治夜校。

十一月 毛泽东发出对山东农运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应当采取集中的原则，指示山东的农民运动要“注意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十一月 赵以政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以政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在北伐进军途中的江西前线，由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兵大队长（姓名待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冬 九都杨党支部建立 根据党的指示，杨耕心回家乡阳谷建立组织，在九都杨先后介绍杨保善、宋励华等五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我区第一个党支部——九都杨支部，杨耕心任书记，隶属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

下半年 张廷焕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廷焕（临清人）入聊城山东省立三师学习并任校刊主编期间，在去济南开会时，接受了省立一师学生李恩孝（跨党之人）的共产主义宣传，并跨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夏 金谷兰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 金谷兰和进步知识分子在高唐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打倒大褂子客”等口号。

一九二七年

初春 省立三师建立党团组织 张廷焕、李建华（又名李成连）在聊城省立三师负责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晋陀（夏津人）负责建立共青团组织，短时间内发展到二三十人左右，成立东昌省立三师党团组织（又称东昌支部），并曾在深夜于学校举行党团会议。1927年下半年，三师党团员发展到50人左右（其中团员略多些）。到1928年夏，由于国民党军的北进，党团员陆续离校，三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团员转入隐蔽活动。

春 郭庆江等入党 杨耕心在济南上高中期间，发展同学傅弼巷（聊城人）、郭庆江（博平袁楼人）入党，并建立党小组，组长杨耕心。

春 杨耕心被开除学籍后从事党的工作 因宣传马列主

义，杨耕心在济南高中被开除学籍，他按照党的指示，往返于济南和聊城省立三师、二中之间，从事党的工作。7月，杨耕心先后在阳谷县九都杨、七级、安乐镇等地发展党员数名。

春 鲁西北党组织大发展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山东区委在鲁西北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其中阳谷、临清、东昌党支部，为中共山东区委直属支部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七月十五日 大革命失败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这时，聊城地区已建立党团基层组织三四个，党团员（不包括在外地学习和工作的）已发展至五六十人。

七月 郭庆江回冀豫 党派郭庆江从济南高中回博平袁楼，发展党团组织。

秋 王寅生等回聊城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南方的王寅生、赵以政、聂子政、孙大安（皆系黄埔军校第四期），奉党中央军委指示，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先后回到鲁西北聊城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八月七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八七”会议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八月 张干民回山东任共青团山东区委秘书长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的张干民，奉党的指示回山东做工农运动

工作，任共青团山东区委秘书长（书记顾作霖）。

八月 山东区委召开平原会议 会议决定邓恩铭任山东区委书记，丁君羊负责组织工作，王元昌负责宣传工作。

八月 袁楼党支部建立 郭庆江在家乡发展袁果、袁本恒、林梦白等七八人为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博平袁楼党支部，郭庆江任书记，袁果、袁本恒任委员。党支部成立那天，王寅生、杨耕心参加。

秋 金谷兰回家乡谷官屯办农民识字班

秋 聊城北周店支部建立 聂子政从南方返回家乡后，在本村北周店先后发展小学教师刘文著和农民王清泗、聂有良等9人入党，遂成立聊城北周店支部。同时，发展一批农民协会会员，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秋 高唐谷官屯支部建立 金谷兰入党后，在高唐积极开展农运工作，并在鲁北县委负责人李宗鲁的帮助指导下，发展谷官屯村小学教师徐心斋、杨厚基及农民李玉红、田义三等入党，建立中共高唐谷官屯支部，金谷兰任书记，初属鲁北县委，后归鲁北特委、特支。

十月 中共东昌（鲁西）县委建立 根据省执委指示，团省委书记张干民赴聊城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组建县委。经与王寅生、赵以政等研究确定，于中旬在聊城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家中正式建立东昌县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聊城、阳谷、博平、临清、莘县、东平等地党的工作，张干民任书记，赵以政负责组织工作，王寅生负责宣传工作，聂子政负责军事工作，袁果负责农运和青年工作。县委成立后，即着手发展农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十月 袁楼党的工作迅速发展 袁楼党支部这时已有近10名党员，袁楼支部改为博平区委，郭庆江任书记，袁

果、袁本恒分任宣传和组织委员。博平党组织发展的同时，组织了农民协会、青年团、儿童团，农会会员约有百人以上，分布在袁楼邻近的七八个村。

十月 赵儒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干民将由他发展的共青团员赵儒昌转为中共党员。

十一月 中共中央发出《山东工作大纲》通告 指出：要把“八七”会议以来反机会主义的精神和这次中央扩大会议的各项决议，立即传达到各党支部全体党员。还提出，省委必须认识目前山东的环境，有计划地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还提出，尤其要领导鲁北近三十万灾民，把当地的豪绅官吏杀个干净，并没收其财产救济饥荒等。

十一月 中共东昌县委在阳谷郭店屯一带组织力量准备暴动 书记张干民和县委委员王寅生、赵以政等，在阳谷郭店屯一带，组织起农民协会和武装力量，计划进一步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占领阳谷、聊城两县交界处的德帝国主义分子盘踞的坡里天主教堂，作为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工农革命政权的根据地。

十一月 博平区委组织力量准备暴动 博平区委组织袁楼及附近七八个村的农民协会及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准备发动武装暴动，以便与阳谷的农民起义军会合，进攻聊城。同时，在袁楼举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群众大会，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前往参加，丁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响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自卫军和工农革命政权”等政治口号。

十一月 中共东昌县委在阳谷梨园设立坡里暴动联络站 杨耕心通过县委将在聊城二中读书的王筱湖调回家乡阳谷县梨园，让他做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信联系助手，不久在

王筱湖家设立了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

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山东省委就坡里暴动问题给东昌县委发出指示信 就“关于红会首领会议应注意之点”、“阳谷暴动的准备与计划”等问题作了指示。提出我们应准备参加红会首领发动的暴动，在暴动中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组织群众杀土豪，分地主的粮食。信中还提出要“利用土匪作发动者”，依靠他们进行暴动；要向群众宣传我党的主张，以“鼓励起真正的贫农暴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山东省委就十二月份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党的工作意见 “总结”就东昌暴动的客观环境及党与农会的力量、红会与民团的力量及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东临一带要组织以聊城、博平、阳谷、堂邑、茌平五县为中心的暴动区域。东昌县委在省委的号召下，积极准备组织农民武装暴动。

冬 中共鲁北特委加强对高唐工作的领导 为加强对高唐工作的领导，特委负责人李宗鲁不断到高唐指导工作，帮助金谷兰发展党的组织及发动群众工作。

冬 金谷兰奉党的指示加入红枪会 为便于发动群众，组织和掌握农民武装，金谷兰经党组织同意，也拜师入坛，加入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红枪会（即“红门”），一面将自己家中积存的一仓谷子分给了贫苦农民，一面采取各种形式向红枪会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基础上，将附近合作的红枪会编成军事性质的十数小队，以贫农为骨干，以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减租减息为口号，由于得到红会的拥护，金谷兰被推选为“十乡”（十个村）红枪会的团长。从此，这支自发的农民团体有了党的领导。

冬 中共东昌县委争取韩建德 中共东昌县委通过杨耕心和阳谷县的农民绿林武装领袖韩建德、曹万年进行了接触，张干民、赵以政、聂子政等也多次和韩、曹会面，使韩、曹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在济南聚仙街张玉堂栈房，上级党组织召集发动坡里暴动的会议，到会的有杨耕心、聂子政、王寅生、郭庆江、宋孟川、袁果等。省委同意了县委的暴动计划。

冬 丁君羊代表省委到聊城了解坡里暴动准备情况 丁到聊后，先住在赵以政家里，又到阳谷郭店屯，于夜间在郭店屯附近地里与韩建德会见。

一九二八年

一月 党及农会发展情况 此时，聊城北周店、张庄、关帝庙、博平袁楼、堂邑凤凰集、阳谷九都杨、高唐谷官屯都建立了党支部，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农会组织，计农会会员人数为：袁楼60人，周店30人，关帝庙20人，九都杨约100人，不包括谷官屯，总数约200人。

一月 中共中央致信山东省委 信中批评山东省委不了解“八七”会议及此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及其精神，依然在旧的工作基础上辗转。要求省委必须派一部分同志、学生到工厂、军队和农村中去，全力加强工农兵群众工作。表示不同意省委扩大会议为改组省委所提的名单，提出要在新的省委内，工农分子占半数以上，常委三人中须有一个是工人。

一月 中共山东省委向各县、市委、特支发出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的通告 通告中继续以“左”倾的观点看待当时山东的农村形势，指出：山东的农民在客观已经暴动化；群众已经有十二分暴动起来的可能，而仍然不敢轻于领导的怯弱的心理，实在是我们各地暴动不起来的主要原因。要求

各基层组织，只要客观上可能，即便在主观上力量不足，也要勇敢地领着群众斗争起来。

一月 鲁北党组织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为宣传发动群众，鲁北党组织在高唐、夏津等乡村、集镇、车站，大量张贴标语、传单、歌谣以及广州暴动宣言等宣传品，在民众方面已引起注意，尤其为官府所重视。

一月十四日 坡里暴动爆发 这天，韩建德、聂子政带领几十人扮成教徒趁“晚祷”之机，占领坡里天主教堂。缴长短枪数十支，子弹2万余发，银元2.7万元，粮食不计其数，搜出德国教士、修女等6人。随后，中共鲁西县委派聂子政（已在韩的部队）、宋占一、郭庆江、孙大安、申仲铭、林梦白、曹万年等人进入教堂掌握暴动武装。暴动武装由韩建德任司令，程宗岳任参谋长，聂子政为政治部主任，孙大安为军事部主任，申仲铭担任宣传兼韩建德的机要秘书，宋占一管宣传，郭庆江为谍报科长，林梦白在谍报科做具体工作。暴动军以“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张贴了“告民众书”，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自卫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等政治口号和“实行民权、民选政府”的政治主张；将教堂储存的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消灭了敌民团武装，袭击了阳谷县警备队，又与军阀张宗昌派来镇压暴动的部队激战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于2月7日夜被迫突围，坚持了25天的暴动归于失败。

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山东省委就坡里暴动给东昌县委发出第一封指示信 指出：群众工作应该认为是我们唯一的工作，应尽可能的号召贫农有组织地分粮吃分地种，这样可以逐渐把乡村的阶级斗争掀动起来；一个暴动绝不是随时借着某一个具体问题号召起来的一个普通斗争，必须是群众的革命情绪

已经热烈地高涨起来，我们的主观力量足以胜过敌人确有把握推翻其统治（一省的统治或一县的统治都是），而代之以苏维埃，所以一个“暴动”是一个有夺取一部分政权的企图的群众的斗争；现在农村中的工作唯一的目标即是逐渐的启发农村中之阶级斗争，一切组织宣传工作都要照这个目标去做。

年初 高唐“红团”发展壮大 中共山东省委依据“八七”会议精神，指示鲁北特委：将红团改为农协，号召雇农、佃农及其他贫农和饥民等参加，以期发展扩大组织。在此基础上，设立总局，分为两个团，共1000余人，直属中共鲁北特委领导。第一团设在谷官屯，共600余人，金谷兰任团长，姜占甲、靳兴荣为副团长。下设7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玉洪（谷官屯）、第二大队长杨斯英（杨庄）、第三大队长赵长华（阎寺）、第四大队长靳兴禹（太和庄）、第五大队长刘振江（三殿庙）、第六大队长毕长祥（范庄）、第七大队长张存俭、赵汉亭（西十里堡），每个大队下设五个小队，人数不等。第二团设在高唐、恩县交界的郑官屯，北镇一带，共有500多人，团长郑安吉，副团长许传孟。

年初 中共鲁北县委迁到谷官屯 书记李春荣，委员李宗鲁、金谷兰、王旭鹏、于赞之、张干民（到职较晚）。高唐的党组织壮大，由原来的七八人到30—40人。

二月一日 中共山东省委第二次会议在坊子召开 会议作出了《接受中央对山东工作指导的决议》，表示接受中央对山东工作的批评。会议决定对全体常委给以严重警告并撤销吴芳、王寅生省委委员职务。指出省常委提出把流氓、地痞、无赖等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之一是错误的。会议于2月1

日结束。

二月八日 中共山东省委作一月份综合报告 报告指出：鲁北只有高唐、平原、恩县等8县有组织。东昌支部的同志们工作积极。还指出：在坡里暴动事件中，最大的错误便是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发表，并未能充分地去发动群众；一切工作完全委之党团，县委只在旁边发急，而不知自动地指挥同志向群众做工作。

二月十日 中共山东省委给东昌县委发出第二封指导坡里暴动的信 指出：省委已看到你们太忽略了群众中的工作。同时就政策问题、应当注意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

二月 鲁北县委扩大全议召开 李春荣在高唐县谷官屯金谷兰家中，召开了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禹城等县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抗捐抗税”等斗争口号。

二月 中共东昌县委分析形势准备新的行动 坡里暴动失败后，县委重新分析研究了聊城地区的形势，认为必须进一步建立群众组织，积蓄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勇气。县委决定把群众工作重点放在博平袁楼一带，争取时间，再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暴动。

三月 高唐红团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根据党组织指示，金谷兰于1日带领部分红团战士镇压了恶霸地主李洪楼、惯匪郭经芳、张麻来、恶霸张罗、彭秃子等，接着又打击了高唐城北恶霸地主王金建、劣绅姚鼎汉等，并开仓济贫。从而鼓舞了这一带群众的斗争情绪，发展了高唐地区的革命形势，当地著名的地主劣绅大半弃家逃入城内。

初春 中共东昌县委易人 坡里暴动后，省委把王寅

生、张干民、袁果、宋占一先后调离聊城，赵以政代理县委书记。

四月 王寅生牺牲 20日，张宗昌部撤出济南北渡黄河。张宗昌撤退前，王寅生在济南鲁丰纱厂附近被捕，被杀于千佛山下。

四月二十七日 高唐红团杀死“盐巡” 在党的领导下，红团处决了带枪下乡逼盐税的盐巡胡景春、李春城等5人，扩大了红团的影响。

四月 高唐积极准备暴动 中共山东省委第三次执委会后，指示鲁北特委抓紧利用张宗昌撤离，蒋介石的“北伐军”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组织鲁北农民举行暴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把鲁北县委改组为中共鲁北特委，李春荣任书记，委员有金谷兰、李宗鲁、于赞之、王旭鹏等，省委还派张干民任组织部长。特支机关设在谷官屯。特委改组后，立即举行了会议，决定于5月4日举行暴动，进而建立工农革命根据地。会上还对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和暴动后的行动进行了布署。

五月四日 敌人围攻谷官屯 由于红团的保密工作不严密，暴动日期被敌人侦知。凌晨，敌高唐县警备队和豪绅土匪等武装包围了谷官屯，袭击了红团团部，经激烈战斗，中共鲁北特委书记李春荣、红团副团长姜占甲等十人牺牲，金谷兰带少数人突围出去，准备举行的暴动随之失败。

五月 金谷兰向省委写出《关于高唐红团工作的报告》

内容有五大部分：一、红团的过去；二、失败的经过；三、失败的原因；四、失败后群众的情绪及将来的希望；五、失败后得到的教训和今后应注意之点。“报告”认为谷官屯暴

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委对情况估计的错误；农民不守纪律；上下机关不能发生联系；消息不灵通；本村阶级分化。

五月 中共东昌县委改组 省委派马守愚，在堂邑城东北的凤凰集举行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改组东昌县委，并把县委机关由聊城迁到博平城西南的袁楼村。东昌县委改组后，根据当时中央“知识分子不能担任书记”的规定，县委书记改由博平袁楼的农民党员林梦白担任，袁本恒任组织委员，郭庆江任宣传委员，赵以政、宋占一、袁平之、孙大安任县委执委。会后，郭庆江去省委请示汇报工作，被留在省委工作未回。

五月至年底 鲁西北党组织的活动进入秘密状态 4月，国民党新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张宗昌。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屠杀我国人民的“五·三”惨案。在此后一个时期内，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新军阀、奉系军阀残余三者统治山东的局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由于鲁西北党组织还不善于做秘密工作，加上受“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如周廷选（临清人）、哈相越（聊城人）叛变，张干民、赵儒昌遭到通缉，张干民被调回济南从事反日爱国运动，赵儒昌被迫转移到驻河南开封冯玉祥西北军军校学习，6月8日，赵以政被捕，19日被敌杀害。7月间，东昌县委两次派袁本恒去济南找省委汇报请示工作。此时不少党员外出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有的处于瘫痪状态。9月，金谷兰、郭庆江被捕，金谷兰被辗转押送到山东省模范监狱，郭庆江出狱后外逃东北。鲁西北的党组织进入组织分散，秘密活动，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阶段。